

# 国是

Vol. 14

政策工具视角下多元福利有效运转的逻辑研究

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的“认知内卷化”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PM2.5治理困局及对策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

2016年5月

博学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明德

奋进

2003

SJT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和谐

# 国是

## 【顾问】

钟 杨 曹友谊

## 【名誉主编】

吴建南 章晓懿 彭 勃  
樊 博 谢 玮

## 【主 编】

王云芬

## 【副主编】

李锦红 卢少云 黄超芸  
隆添伊 阎其凯 张嫣婷

## 【美术编辑】

杨树飞

## 【编 辑】

樊佳慧 胡柯科 黄姣姣  
李利文 林裕静 刘凤丹  
刘青琴 吕立远 潘 阳  
任小龙 谭新雨 杨树飞  
杨文婷 余红霞 张嫣婷  
张 莹 周裕祺

## 卷首语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副书记 章晓懿

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刚刚热烈而隆重地度过了120周年校庆。作为一名在交大学习工作了三十五年的老交大人，见到了历届返校参加校庆活动的国务学子，听大家畅谈走出校门后的经历，对社会管理实践的体会，以及对人生的感悟，感慨万千！总之，离开校园方知青春年华的宝贵，进入社会倍感在交大学习机会的珍贵！借本期《国是》卷首和在校的同学们分享一点体会。

今天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共管理既面临严峻挑战，又充满机遇。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管理面临全球化和信息化巨大挑战；对中国而言，又同时存在市场化、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沉重压力。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中产生了许许多多重大的实际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强化国家治理、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立足于我国现实的重大经济社会政策问题，重点关注转型期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利益多元化、人口、资源与环境限制等多重约束条件下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所面临的挑战，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估和判断。因此，希望大家利用在校学习的宝贵年华，打好扎实的理论基础；并且深入社会，积极参与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全身心投入到应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科学研究中去，充分利用《国是》平台切磋理论，交流思想，擦出智慧火花，让《国是》真正成为同学们的学术之家、精神之家。

衷心祝愿《国是》越办越好！



# 目录

## 治学

厚积薄发，砥砺前行……1

张录法

谈谈如何治学的一点感想……3

顾建光

读书与研究……5

张学昆

## 洞见

政策工具视角下多元福利有效运转的逻辑研究  
——以川北 S 村互助式养老为个案……7

王辉

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的“认知内卷化”  
——以上海 XH 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21

李利文 申彬 彭勃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36

郭俊华 孙泽雨

中国 PM2.5 治理困局及对策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理论视角的分析……46

吕守军 沈星迟 张晓敏

## 开卷

《剩女：性别不平等在中国重新抬头》……56

沈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演变分析  
——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58

卢少云

真实世界中的“货币战争”  
——读 Jonathan Kirshner 著作 Currency and  
Coercion ……61

李晨阳

比较政治学家的人生经验  
——读《比较政治学中的热情、技艺与方法》  
……63

宋明思

## 有感

新旧……65

丁玗

亲爱的，愿我在你身旁……67

潘倩倩

一人一狗……69

方圆圆

## 分享

从 SJTU 到 UCSD  
——我的美国政治学博士申请之路……71

蒋佶颖

细节践于行，大道记于心  
——辅导员经历给我的成长启示……73

洪风波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受全球治理的中国力量  
……75

阎其凯

不忘初心，不负光阴……78

程雅青

捕捉光影，御梦前行……81

姜子禹

公共管理前沿理论梳理……82

政治学前沿理论梳理……84

速览 ……87



## 厚积薄发，砥砺前行

张录法

**人物小传：**张录法，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卫生政策与社会保障。

记者：张老师您好，很荣幸邀请到您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了解到您在SSCI上多次发表了高质量的文章，十分敬佩您的高效和才华。我们也希望在研究生阶段能够写出一些好的论文，但现在仍然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有句话说：“辛勤的努力离不开正确的指引”，您能否不吝分享一些治学创作的宝贵经验，让我们在学术科研道路上学习借鉴？

不管是写论文或是做事想要高效首先需要有一个计划。计划需要有可行性和激励性。也就是要制定一个既对自己有约束又可以使自己感觉通过一定的努力可以完成的计划。有了规划后就需要严格执行。我们常常很容易想出一个计划，但在执行的时候，如果没有外界的监督，自己往往容易懈怠，陷入“今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状态。这样今天如果没有执行计划，那么对于明天计划要做的事就有了影响，所以现在我们会说“拖延是个病。”为什么说它是个病呢，因为它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一环接一环地影响所有的计划。更重要的是，拖延一次以后，人就会想拖延第二次，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制定好的计划并严格执行是高效治学的第一步。

其次思考非常重要。信息获取的低成本和容易性给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太容易获得之后就会使人缺乏思考，成为“拿来主义”。所以，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自己首先要进行独立思考，然后再阅读文献进行第二次思考，进行归纳总结，这样就会找到所谓的“创新点”。在此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大量阅读，要有积累。我们常常说隔行如隔山，一开始所有东西对于你而言



都是新的，但是等有了积累和思考，就会慢慢地知道这个领域的重点，此时再阅读文献就能一下找到重点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其实在今天仍然很适用。

第三点就是动手能力。一定要做，这一点很重要。说很容易，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只有变成纸质版或电子版他人才能获取你的想法。因此一旦脑海中有了想法，就一定要变成文字。这样每次有了灵感就记录，每隔几天再进行回顾，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形成初步的文稿了。然后让同学老师提出建议，再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就能写出好的论文。

记者：您认为研究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学术素养？

首先要有基本功。与本科生不同，研究生要具备最基本的专业基础，否则很容易陷入“坐井观天式”的创新，你以为这个观点是你想出来的，殊不知在以前的文献当中别人早就有了类似的论述。因此我们需要阅读本专业最核心的课程，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作进一步研究，否则就是无源之水。

其次，具备了基本功只是一个基础，第二点就需要选定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方向的确定是相对的，并非确定这个方向后就可以对其他知识视若无睹。举个例子，我们常说“中西合璧”。也许你想盖一个中式的房子，有了这个想法等于有了一个主心骨，但这并不代表你因此就可以漠视西式建筑。



因为如果你对于西式建筑有了一定的了解，那对你盖中式房子就会有启发，你会更明白在盖的过程中要规避什么，或是可以吸取哪些好的方面套用在你的中式建筑上面。所以我们说确定方向的目的就在于使你有一个聚焦点，侧重点，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但于此同时也要适当关注其他领域的知识。

选择了方向之后，第三点就是前面也提过的要有大量的积累。要从最基本的读到最前沿的，这一点无人可以替代你去完成。所以只有有了积累，再加上思考再与同学老师不断交流，研究生的学术素养才能不断得到提升。

记者：张老师，您虽然是理工科出身，但熟悉您的人都知道您有非常好的文采，可谓文理兼修。您是如何变得这么优秀的？

其实现在我所写的一些东西大多也都是我学生时代积累的知识。在我读书的时候，我的确很喜欢一些诗词。那时候我通常都是在晚上完成学科作业后，抽出一些时间去图书馆去阅读一些诗词，遇到好的词句就会记下来。一周总会抽出那么几天来阅读古诗词。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一个“数据库”。这样有时候看到景物或遇到事情，就会想到一句相似的古诗词，其实也只是借用古人的框架来作一些打油诗罢了，只是现在的人不常这么做，才会觉得有文采。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积累是很重要的。另外，读书要选择一个好的场所才能更高效。我们当时网络不发达，就会更多去图书馆度过，图书馆的学习氛围用管理学的话来说就是能形成“横向监督”，对人形成外部的激励，因此往往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

同时，我觉得要有时间管理意识。时间管理，总的来说分为三个8。第一个8也就是睡觉的8个小时，一定不能透支，否则生命的长度一定会受影响，第二个8，是正常学习的8个小时。一定不可能事半功倍，千万不要一边听这个老师上课一边做另一个老师的作业。否则大学只要两年，研究生只要一年就可以了。因此唯一控制的就是剩下的8个小时，去掉吃饭时间，还剩下的6个多小时，在这6个多小时中，如果能真正确定出半小时做自己喜欢的事，几年坚持下来，

一定可以做得很好。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无法坚持。另一个时间管理方法就是分周期做事，每个人最清醒的时间点不一样。最清醒的时间就要做最重要的事情，其他时间则可以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懂得合理安排时间，可以使我们更优秀。

记者：在您的带领下，由我院六位本科生组成的“老年打工族”团队经过14个月的实地调研，撰写出了《多元化动机与单一化社会支持：上海市老年打工族现状扫描》，并依此获得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社科组一等奖，这次创作成功的背后，是大家付出的巨大努力，您能谈一谈这次经历的感想吗？

首先是敢于挑战。尤其对我们交大来说，理工科很强大，但对文科来讲，在挑战杯上没有经验。挑战杯既要有科研体现，也要和实践结合，要体现出大学生这个群体的阶段特点。我们只有一年的时间准备，而很多学校的师生往往有两年的时间来准备。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很没底，我们当然可以放弃，但很多事总有第一次。在选择逃避和选择担当之间，我们选择了担当。人生是一个愉悦自己的过程，要勇于挑战自己。

其次，在挑战杯准备期间，老师既要上课又要搞科研，同学们也都有课业压力，因此往往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每个人在此过程中也都有各自时间上调整的困难，但最终都克服了，每个人都把挑战杯放在第一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团队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巨大努力，实现了自我的升华。即使是一个小的措辞也会讨论很久，很多次都讨论到凌晨才结束。战胜自己已经比对手领先一筹了。

最后，我们说结果虽然不重要，但既然选择了，谁都希望有更好的结果。PK的过程是一个优中选优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尽可能好，因为我们不了解对手有多强大，我们控制不了别人，只能控制自己。我们不断请专家假想各类刁钻问题的就是为了尽可能消除所有可能的隐患，只有自己无懈可击，才能以不变应外变。过程非常艰难，但我们尽可能在时间和精力上做到了极限。也因此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 谈谈如何治学的一点感想

顾建光

**人物小传：**顾建光，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区域发展战略与管理。

由于商业化文化的盛行，社会似乎越来越多人谈论如何追求严格艰苦治学的精神了。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似乎可以简易地从互联网上获取海量信息，许多年轻人尤其是沉湎于简短、片段网络信息的世界。“做学问”这一概念成了渐渐被大家遗忘的名词，“做研究”也就是所谓文字数量的堆积和发表文章数量的测度。

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我们是否还需要真实地做学问，扎实地治学？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一个没有治学精神的民族，一个没推崇学问的国度，将是没有希望的。他不可能走到世界文明的前列。因为整个文化都将是追随之性的。

那么，如何能够在青年学子中形成推崇学问和崇尚治学的态度呢。当然这涉及到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的问题。“夫学需静也，才需学也。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一古人训诫，仍然可以做为今天的座右铭。也就是说，做学问是需要立志的，因为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为了一个领域的卓越成就，甚至需要付出毕生的努力。这与急功近利的商业价值是不相同的。所谓需要“吃冷猪肉，做冷板凳”的功夫，也就是要有事业精神，要有耐得住寂寞的态度。举凡人类史上成就学问的大家无不有这样的治学志向。所以立志是治学的前提条件。因为，学问不是简单信息的堆积，也不是肤浅知识的堆砌。学问是博大精深知识和智慧的结晶，它对人类文明的进

步有着重大的贡献。

当然具有这样的治学态度和能否成就具有重要价值的学问还是不能画等号的。因为治学还必须具有科学的方法。首先是应该采取科学实证方法。也就是要有实事求是治学方法。应该在相关领域中取得大量的一手知识和材料。不能迷信从哪里二手转载的材料。

但凡大学问家都是博学之士。成就学问者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广阔的视野。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才能避免囿于孤陋寡闻。就研究方法来说，科学的治学态度应该是“博”与“

专”应该是相互贯通的。如果研究的方向过于分散，没有聚焦，人类积累的知识已经达到了无涯境界，很难形成专门突出的成就。学有专攻是现代学术研究的特点。像古代先贤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这样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已经不大可能了。但是，这并不排除

学问家仍然具有广泛的知识背景和学科基础。

现代的治学是需要考虑方法的科学性的。仅仅采取古代传承哪种考究方法，或者说“述而不作”的方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的了。现代已经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方法，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以及研究目标采用合适的方法。这里诸如：数理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归纳分析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历史比较方法，以及模型建构的方法，等等。在很多情况下，合适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就将决定研究所能取得成果。比如，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完成他的旷世巨著《资本论》，全





赖于他对辩证方法的精熟掌握。所以，我们的青年学子们应该在年轻的时代学会掌握集中必要的研究方法。

创造性治学的关键之点还在于创新的态度。治学不仅仅是去描述或者总结前人的成果，年轻学子应该有雄心抱负去站到巨人的肩膀上，以便获得更高的研究成果。学术研究也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基本路径的。哪怕是还不很成熟的结论也不要紧，可以在后面的磨炼中逐渐地改进和成熟。一种新的学术理论总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另外，学术研究总要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的。这样的学术研究才能后生后浪推前浪，广阔并推进繁荣的学术的前景。

另外，应该知道，学术与治学果然会寄托着学者个人兴趣和个人风格，但是，还是

不要把自己的治学完全看作满足个人自我欣赏的艺术品。尽管我们要避免古人那种“书中自有黄金屋”和“读书做官”的激励机制，也要避免现代人商业包装和炒作的浮夸作风。学术和治学的态度就是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精神。但是，个人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个人的价值也体现社会的价值，我们目标是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成果和作品。但凡具有永恒价值的学术成果，伴随而来的总是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要求青年学子都能够形成传世佳作，做学问是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的，很多人并不一定成就大业，但能够成为治学路上的一块基石，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

青年学子们需继续努力啊！

# 读书与研究

张学昆

**人物小传：**张学昆，北京大学法学（国际关系）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研究领域：**美国的亚太战略、中俄关系、欧盟邻国政策。

读书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对于研究生来说，这句名言很是适用，我们应该热爱读书、勤于思考，在充满书香的校园里不断进步。然而，网络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一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这给我们的传统阅读提出了一些挑战。每天都有无数的信息通过网络冲击着我们的视觉、听觉，不但改变了我们通过阅读书籍来获取知识的习惯，而且还能使我们很容易地就在优劣难分、真伪难辨的信息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以至于更加难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健全的知识结构。

作为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应该始终专注于阅读专业著作和期刊论文。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多数专业书籍和论文，不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是较为平庸的作品，因为创新很难，精品从来都是很少的。可以设想，如果每年出版的数不胜数的各类专业书籍和期刊论文都具有创新性、都能对人类知识的增长做出贡献的话，那我们生活的社会和世界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国际社会的战争与冲突将大为减少甚至消除，国内社会的福利和文明程度将大大提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心灵的关系都将更加和谐美满。可是，现实世界向我们展示的并非这样的图景。

事实上，知识，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其增长从来都是非常缓慢的，革命性的创新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自以为提出了一些新颖的思想和观点，其实很可能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就有先贤哲人提出过了，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掩埋被遮蔽而不被我们所知而已。可以说，信

息化的时代并非知识爆炸的时代，爆炸的是信息而不是知识。这就给我们的阅读选择指明了方向：作为研究生，我们应该重点阅读那些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经典书籍和文章，而不是不加选择地广泛阅读。就拿笔者所学的国际关系学科来说，把古今中外囊括在内，真正的经典书籍也就 10 本左右。对于这些书，国际关系的研究生应该反复地精读，不止一遍地细读，因为它们才是知识的结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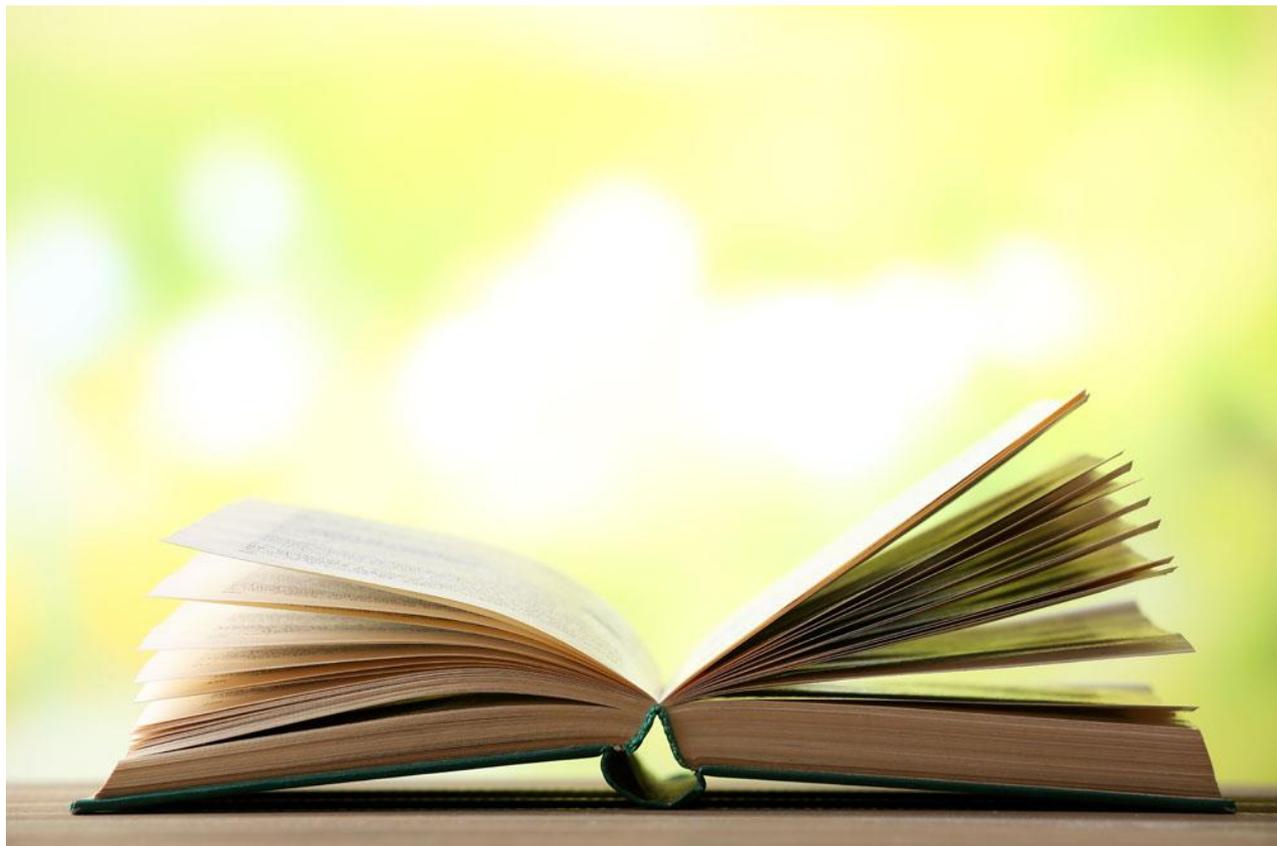
本科、硕士、博士是高等教育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学习目标和学习要求有很大的差异。本科阶段强调通识教育，通过让学生综合、全面地了解人类知识的总体状况，培育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以造就广阔的知识视野和养成健全的人格。硕士阶段则强调专业性，学生应该认真研读所学专业的全部经典书籍，注重理论知识和方法论的学习，在阅读和学习的过程中构建起坚实、完整、系统的专业知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有所创新。博士阶段则强调知识的创新，这是首要的目标，通过选择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对之展开为期数年的深入研究，来实现知识的创新，力求对人类知识增长做出贡献。显然，基于不同的目标，各个阶段有不同的阅读要求，本科阶段强调广博性，研究生阶段强调专业性和理论性。对于研究生的阅读，一是要有选择，重点阅读那些已被证明是经典的文献，不要在那些不值一读的文献上耗费时间和精力；二是经典著作应该精读、细读，同时带有批判性地阅读，对其观点也不能不加思考地、简单地一概接受。值得指出的是，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文献都是外文原版，中文译本大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而且翻译的版本通常晦涩难懂，所以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最好直接阅读原版，或者中英文译本对照着读。



对于研究生来说，在专业学习的基础上，还要尝试有所创新。当然，哪怕是微小的创新，就值得大加称赞和喝彩了。这意味着首先要确定一个有意义的、尚未有人研究过的新问题。问题怎么来呢？至少包括以下两种途径：通过阅读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问题，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敏锐观察来提出问题。提出问题之后，可以遵循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一种是基于历史的、哲学的、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另一种是基于比较案例的、统计分析的实证研究，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传统方法更具有深刻性、本质性和宏观性，实证研究则更具有精确性、科学性和可证伪

性。选择哪一种方法，应视具体的研究问题和个人所长来确定。不管怎样，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证研究的方法在当前的学术界更为盛行也更受鼓励。研究的结论应该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经验上的有效性，这就要求我们平时要注重逻辑思维的训练，养成探究因果关系的习惯。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们应习惯于提出为什么的问题，习惯于包含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句式表达，培养抽象思维的能力和对经验现象进行概念化的能力。

以上是我对研究生读书与研究的一点粗浅看法，希望能对同学们有所启发和帮助，那样我就会甚感欣慰了。



# 政策工具视角下多元福利有效运转的逻辑研究

## ——以川北 S 村互助式养老为个案

王辉<sup>1</sup>

**摘要：**多元福利供给是破解我国福利短缺难题的根本之道。然而，怎样使多元福利运转起来，形成有效的供给网络却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通过文献梳理指出政策工具能够被解构为福利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接着以 S 村互助式养老实践为个案，通过深描的方式，阐释了多元福利有效运转的逻辑。多元福利供给运转的动因来源于政策工具之间的压力与引力，运转的中介在于信息引导类工具的运用，运转的路径遵循了强制类工具出现促进了自愿类工具的增加，运转的结果编织了密集的政策网络。研究能帮助理解在人口空巢村不同政策工具的配套使用如何连带性动员多元福利供给的内在机理。文章也力求走出个案，对政策工具的操作化、多元福利模式的本体化以及政策移植的条件进行分析与归纳。其局限在于未能选择其他类型的农村社区进行对比研究。

**关键词：**政策工具 多元福利供给 运转逻辑 农村留守老人 互助式养老

（备注：本文在《公共管理学报》2015 年第 4 期发表，且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制度》2016 年第 1 期全文转载）

### 一、问题提出

作为一种流行的学术理论和分析框架，产生于西方的福利多元主义犹如一幅万灵药，近年来被国内学界广泛地运用到养老、医疗以及社会救助等福利事业的研究中。<sup>[1]</sup>学界的引介与应用，既反映了该理论自身的学术解释力和操作性，又体现了当前中国急于动员各方面力量弥补福利供给短缺的社会现状和迫切心理。总而言之，学界对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既强调政府的福利干预，又注重家庭和传统社区的回归，还要发挥市场机制，带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然而，福利多元主义在中国场景下应该进行哪些调整、多元福利供给如何运转、运转产生了什么结果等问题却没有得到学界深入的研究。鉴于单纯以社会福利为视角的研究难以走出循环反复的窠臼，本文拟以政策工具为主要研究视角，以四川省南充市下辖的阆中市 F 镇 S 村留守老人的多元福利供给为个案来对上述问题予以研究。作为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背景下产生的一个弱势群体，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着生产重担、生活失靠、情感孤独，甚至失养、自杀等社会病症。相对而言，他们的福利供给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和复杂，迫切需要学界的持续关注和深入研

究。本文正是在对以上理论迷思和现实问题的相互关照下提出分析问题和展开研究的。

以政策工具为视角对福利主体的互动展开研究，具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现实可行，从建构论视角看，“整个政策过程实际上就是主体之间的对话过程，政策工具则蜕变为政策主体间进行对话时所采取的行动”<sup>[2]</sup>。换言之，政策工具是政策治理主体进行互动的方式，政策工具的合理运用促进了多元福利供给的良性运转。其次是理论需要，政策工具的互动和配套是其选择和运用的重点，然而学界对此研究还不够深入。本研究希望在展现怎样使多元福利供给运转起来的基础上，也兼论政策工具的配套运用逻辑。文章研究思路大体上遵循了在深描基础上的定性研究范式，即在全面把握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反观理论，从而对经验和理论进行双向阐释和建构，而不是以理论对经验进行盲动框剪。

文章选取 S 村作为个案，不仅因为该村互助式养老作为一个成功典范受到政府和新闻媒体的持续关注报道，还因为该种养老方式的实践演变展示了多元福利供给方式与政策工具的契合性。具体来讲，笔者于 2014 年 8 月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来该村养老实践进行了前期实地调研。基于研究需要，又于 2014 年 11 月和 12 月多次以电话访谈形

<sup>1</sup>作者简介：王辉，上海交通大学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与社会政策。

课题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进人的城镇化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14AZD025）阶段性成果。



式对相关问

题进行了追踪和挖掘。调研的问题涵盖了互助养老中心的发展动因，日常工作，运行方式，老人满意度，以及参与互助养老中心后，老人与家庭、邻里社区、朋友、社会慈善主体之间关系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展现的主体间良性运转和有序互动逻辑是基于乡村福利的微观治理和具体实践，而不是宏观层面上的立法者、政府、利益集团和老年群体之间的互动博弈过程。

##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基础：福利多元供给与政策工具

### （一）福利多元供给

福利多元供给与福利多元主义直接相关。后者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为了缓解福利国家所造成的沉重福利负担和社会危机，而提倡市场和社会也应当积极参与福利的筹资、生产和递送，进而导致福利的共同提供和共担责任。罗斯<sup>[3]</sup>提出福利三角理论，认为福利供给主要来自国家、市场和家庭，福利服务总量（TWS）= S（State）+M（Market）+H（Household）。然而，在此分类中罗斯忽略了社会第三部门对于福利供给的重要作用。约翰逊<sup>[4]</sup>在罗斯的基础上，将提供社会福利的部门分为4个部分：国家、商业部门、志愿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商业部门提供的福利主要包括职业福利和商业保险。志愿部门包括自助、互助组织，非营利机构，压力团体等。非正规部门包括亲属、朋友和邻里。亚伯拉罕<sup>[5]</sup>将福利多元主体归纳为以权力为基础国家，以资源为基础的市场和以社会团结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然而，无论是福利的三分法、还是四分法，究其实质都体现了“福利的规则、筹资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门共负责任，共同完成”<sup>[6]</sup>。

本文在借鉴罗斯和约翰逊分类基础上，将家庭和社区分离开来，这不仅是细分非正式部门的需要，还是契合中国自身社会文化特征的需要。家庭主要指直系亲属，尤其是指子女。中国代际关系呈现为一种“反哺”<sup>[7]</sup>模式，即在人年幼时接受父母的抚养，当父母年老时便通过反哺的方式对父母进行赡养，这与西方“接力”模式的代际关系不同。虽

然当前“反哺”关系有所松动，但是家庭纽带和代际关系仍然是中国人主要的社会关联。它不仅体现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之中，也体现在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之中。因此，在中国场景下，家庭成为最主要的福利主体。社区是人们的生活领域，它涵盖了具体的地域范围和抽象的社会纽带两个层面，后者的获得可能建立在前者基础之上。社区作为社会福利主体，主要指邻里、朋友间社交网络。家庭和社区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支持方式在心理慰藉、情感满足、生活照料等方面发挥作用。因此，中国老人的多元福利供给主体涵盖了政府、商业部门、社会组织/福利服务机构、家庭和社区共五个部门。

综上所述，中国现阶段社会福利的多主体供给与西方的福利多元主义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都表现为福利供给都由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和家庭等多主体共同完成。不同点表现为：（1）背景不同。西方国家的福利多元主义或福利混合经济是在“经济危机、政府治理危机、财政危机和合法性危机”<sup>[8]</sup>背景下启动的。而在中国，作为一种补缺型的福利制度，它“并没有经历高福利所造成的财政难以为继，而是不同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福利需求与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供需之间的矛盾”<sup>[9]</sup>所致。（2）政府财政投入不同。虽然福利多元主义倡导福利供给的多元化，但是政府的福利投入并没有大幅度削减，而是经由社会组织的递送来完成福利的满足；而我国的福利多元供给，政府仍然扮演最后出场者角色，其财政投入比例仍然较低。（3）主体角色不同。西方具有公民结社的传统，福利多元主义重视社会组织的福利供给作用。中国目前虽然社会组织也开始发展，但是其功能仍然受到诸多制约。然而，如上文所言，家庭和社区是我国福利供给的一贯传统，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是西方福利供给相对欠缺的。

### （二）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也被称之为政府工具或治理工具，是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和方式。不同的学者对政策工具进行了不同的分类。本文在结合豪利特<sup>[10]</sup>、萨瓦斯<sup>[11]</sup>、陈振明<sup>[12]</sup>、朱春奎<sup>[13]</sup>等学者的基础上，按照政府干预强

度的高低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类、市场类、信息传导类和自愿类，共四类政策工具。“强制类工具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直接提供、公共事业、财政拨款、特许经营等；市场类工具主要指合同承包、用者付费、凭单制、政府补贴等；引导类工具主要指引导发表、

动员广告、宣传教育、劝诫行销；自愿类工具主要志愿公益组织、家庭和社区等”<sup>[14]</sup>。基于此种政策工具分类，老年福利供给中的政策工具可以具体划分为以下四类，如表 1 所示。

表 1 老年福利供给中的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类型	老年政策工具中的次级工具
强制类养老工具	老年法律法规，财政投入，农村养老保险，公办敬老院，政府监管
市场类养老工具	商业保险，政府对民办养老机构补贴、税费减免等，老人付费，产权拍卖，政府购买专业养老服务，
引导类养老工具	养老政策宣传、开展爱老敬老活动、对子女劝诫
自愿类养老工具	家庭，社区互助，非正式老年群体，慈善公益组织

四种类型政策工具各有其侧重点和作用机理。一般来讲，在科学合理界定政策问题的基础上，促进多种政策工具协同配套，形成政策使用的“组合拳”，能够系统解决政策实施中的多种问题，从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目前学界对政策工具的研究侧重于其选择和运用的机理，如豪利特<sup>[15]</sup>根据政策子系统复杂程度高低和政府能力强弱构建了政策工具选择模型。彼得斯<sup>[16]</sup>总结了政策工具运用研究的三种途径。传统工具主义遵循严格的目标—手段理性，强调政策工具如何实现政策目标。修正工具主义既关注工具之间的张力，也关注普遍价值、道德伦理和外背景。有四方面因素影响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工具的特许、政策议题、背景因素和目标大众的特性。制度主义途径关注政策工具选择背后的制度框架因素，先前的制度会对后续政策工具选择产生路径依赖。

然而，本文采取了综合途径，认为政策工具的选择与组合不仅需要考虑政策工具的性质，还需考虑政策工具的利益相关者、政治社会系统的影响。不仅需要考虑即将采纳工具的特性，还需考虑已实施政策工具的特性。不仅需要考虑单一工具的特性，还需要考虑辅助工具的特性。

### （三）福利多元供给与政策工具的关系

从学科分野上来看，两者似乎关系不强，福利多元主义属于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范畴，

政策工具理论属于公共政策或公共治理范畴。然而，两者又有诸多共同点：（1）二者都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民营化、市场化运动实践，是对该场运动的理论归纳与提升。它们都刻画了西方各国政府通过政府分权，促使市场和社会要素参与社会福利生产和递送的生动画卷。因此，两者都认同产品供给与产品生产或递送相区分的理论假设。（2）都倡导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对公共事务和社会福利的参与供给。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以邻居和朋友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社区，以及家庭等多元福利主体，也是政府推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政策目标的政策治理主体。政府在对公共产品或社会服务担负供给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合同外包、运营补贴、政府购买等政策工具促使市场和社会进行生产和递送的政府管理革新。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证明了第三部门、社区和家庭作为政府的重要替代或补充，在福利供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是，本文最着重论述的是两者间内在关联，即政策工具或治理工具的运用是怎样促进多元福利供给的有效运转。关于政策工具与多元福利主体的关系，主要有两种研究结论。其一，政策工具促进了福利主体之间的互动。此种观点以萨拉蒙的研究为代表，“政府行动的新工具——贷款、贷款担保、社会管制、服务购买合同、税收补贴、补助

金等大量使用，已经从根本上改造了公共部门的本质……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新工具涉及政府和大量的第三方机构——其他层次的政府、银行、行业协会、医院、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机构共享权力，实际上是由第三方机构提供政府授权和出资的服务”。<sup>[17]</sup> 概而言之，萨拉蒙指出了政府采取这些新型政策工具促使了其他主体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发展趋势。高祖林<sup>[18]</sup>也注意到新的政策工具能够在政府、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物业公司和老人之间扮演中介性的连带角色。其二，业已存在的多元福利模式有助于政策工具的嵌入和执行。希尔德加德<sup>[19]</sup>论述了在德国的长期医疗保障中，福利混合模式作为前置条件能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倡导的市场化、分权化策略铺平道路，揭示了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策工具与福利多元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理查德<sup>[20]</sup>论述了国家、市场、市民社会和家庭这四个组织为了解决社会贫困问题而采取相应工具进行互动和合作，从而推动了福利混合进一步发展。

上述文献为进一步的研究做了铺垫，然而对具体的互动逻辑尤其是中国老年福利供给的运转互动逻辑没有深入剖析。具体而言，财政投入、直接提供等工具必然在政府和社会福利消费者之间建立起关系；合同外包和政府购买促成了政府与市场的互动；用者付费和政府财政补贴可能促成了社会组织的参与；政府动员广告、宣传教育等可能促成了家庭、传统社区的回归和其他社会公益要素的发展。多元福利主体都能够提供老年福利，说明政策工具在功能的相互替代性。因此，以政策工具为视角来分析多元福利主体的运转和互动具有较强的理论契合性和现实可行性。

在老年福利供给中，首要的主体是家庭，家庭成员不仅能对老人进行经济供养、生活照料，还能进行情感慰藉。家庭养老的理论假设无论是经济生产交换论，还是社会情感需要交换都指涉了家庭是最主要的老年福利供给主体。<sup>[21]</sup> 再次是政府，无论是基于满足公民生存权的诉求，还是立足于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政府直接对老人福利的提供主要表现为法律保障，财政投入，提供国民养老金和举办公立敬老院。政府间接上也可以特许民办养老机构的成立，对其运行进行补贴和优惠，以及向社会组织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然而，与家庭相比，政府及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老年福利更多地表现为经济供养以及一部分生活照料，而情感慰藉相对很少。因为情感慰藉作为心理活动，更大程度上需要在他人交往中实现的，但是社区、非正式老年群体和慈善组织在此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为了促进社区和非正式老年群体的兴起，政府也可以进行财政投入，通过政策宣传引导发展，为其创造良好环境。

此外，年轻时老人们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进而获得工作单位为其缴纳的养老金，也可以通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以期在老年需要时发挥作用。故此，政府也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和鼓励商业部门对老人发挥经济支持作用。这些供给主体之间的互动和政策工具的交织混合使用，便构成了复杂多元的老年福利供给网络，如图 1 所示。虽然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社区/社会慈善组织以及商业部门这四者之间很难发生互动关系，但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能够通过相应的政策工具与它们建立联系，使其在家庭养老功能式微状态下发挥福利供给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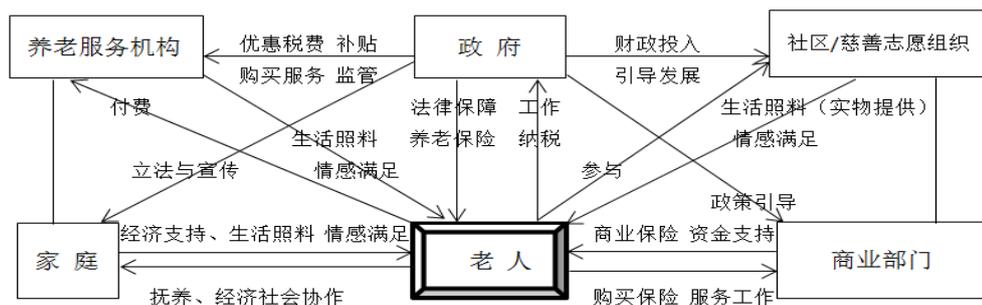


图 1 多元福利主体与政策工具关系

图 1 展示的是多元福利运转的一种应然状态，是政策工具驱使下多元福利主体间互动的理想模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农村老人大多为农民，不像企事业单位职工那样能领取退休金；受制于经济困境，他们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也低。故此，商业部门在农村老年福利供给中作用较低。家庭和社区是老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和依托所在，在老年福利的生产和递送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是政策工具予以动员或组织的最重要主体。石人炳<sup>[22]</sup>等提出随着农村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拨款和补贴方式对家庭予以扶助，促使养老方式应由“家庭支持”向“支持家庭”转变，以应对老年照料危机。陈芳<sup>[23]</sup>等论述了在欠发达地区，应该重视“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优势，注重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服务。此外，养老服务机构作为社会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断受到关注和研究，如穆光宗<sup>[24]</sup>提出为

了引导农村老年福利机构的规范发展，不仅要运用税收优惠，补贴等来营造良好环境，还要经常性地定期进行消防检查和安全鉴定等来保障福利机构安全。

这些文献有助于理解政府与家庭、社区和养老服务机构的互动机理，但是都没有上升到政策工具的视角展开论述。下文通过考察 S 村互助式养老，来对政策工具是如何促进多元福利的有效运转进行具体分析。

### 三、S 村互助式养老的发展过程

#### （一）互助养老中心的发展动因

2013 年 S 村现有户籍人口 2018 人，60 岁以上的老人为 359 人，到外省和本省务工的农民工大约 800 人。为了进一步凸显该村的人口特征与老年福利之间关系，特将其与以上区域的人口结构进行比较，如表 2 所示。

表 2S 村及以上区域人口结构

区域 \ 类型	总人数	老龄化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	农民工数量及比率
S 村	2018	17.8%	4.70‰	800 人，39.6%
F 镇	10185	19.1%	4.94‰	3600 人，35.3%
阆中市	87.7 万	21.8%	——	——，——
南充市	631.7 万	21.4%	3.12‰	——，——
四川省	8673 万	16.3%	3.00‰	2400 万，27.7%
全国	13.6 亿	14.9%	4.92‰	2.69 亿，19.1%

（资料来源：S 村和 F 镇的数据主要由 S 村村委会和 F 镇政府提供。阆中市、南充市和四川省的数据主要来源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省统计年鉴 2014》。全国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4》，<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nd> 以及《2013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部分数据难以精确统计获得，以“——”代替。）

其一，从人口老龄化率来看。该村老龄化率为 17.8%，略低于 F 镇、阆中市和四川省的水平，但是又略高于四川省的 16.3% 和全国 14.9% 水平，意味着老龄化程度高。其二，从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一地自然增长率高，说明新生儿出生率高于老人死亡率。从长期来看，人口死亡率越低，养老压力也就越高。目前，S 村和 F 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近，虽然较高于南充市和四川省的水平，但是与全国 4.92‰ 的比率相当。其三，从农民工数量及其比率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平与

人口吸纳率成正相关的社会背景下，一地经济发展水平越落后，人口外流率就越高，农民工数量和比率也就越高，留守老人数量和比率也随之相应提高，进而导致了老人从家庭中获得直接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减少。目前 S 村的人口外流率为 39.6%，F 镇为 35.3%。它们虽然难以与阆中市和南充市的农民工外流率进行比较，但是都大幅度高于四川省 27.7% 和全国 19.1% 水平。从进一步的数据来看，S 村 5 岁以下的孩童和 18 岁以下的中小學生共约占 520 人，留守在村继续务



农和从事副业的青壮年农民大约 319 人，约占总人口的 15.8%。因此，S 村属于人口外流较为严重的村庄。

综上所述，F 镇及其下辖的 S 村面临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留守老人数量两大直接难题。此外，老人的身份基本为农民，正式福利短缺。现阶段他们除了从政府领取 55~100 元不等的基础养老金之外，大多都无力从市场购买各种商业保险。因此，正式福利短缺、未富先老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最后，传统村庄日渐凋敝，熟人社会在演变为半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稀疏化；邻里互助也因为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住房建筑的区隔化而减少，这些都导致传统社区福利功能日渐衰落。其典型事件便是一位独居在家的老人，直到去世几天之后才被邻居发现。社会公益慈善要素因为自身力量薄弱、信息不对称或缺乏组织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在以上几方面因素的交互压力下，尤其是老人独死家中无人知晓的惨剧，直接促使了 F 镇政府开启互助式养老这一新型养老模式。而之所以选择 S 村作为先行试点示范村，不仅是因为该村是个人口大村，具有类似的养老难题，还因为该村具有一所闲置的小学，这为创立互助养老中心节省了初始成本。在互助式养老发展初期，最主要的福利供给主体是政府以及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合力之上的福利服务机构——互助养老中心。然而，随着它的正常化运行及其产生的连带性动员功能，其他福利主体如社区、家庭和社会慈善要素等福利主体也逐渐参与进来。

## （二）互助式养老的发展阶段

S 村互助式养老的发展可以区隔成互助养老中心自身的发展，以及互助中心之外其他主体参与福利供给这两个阶段，且两阶段构成了一个前后因果链条。

### 1. 互助养老中心的发展

#### （1）强制类工具和信息引导类工具先行

强制类工具表现之一为直接投资工具的使用。阆中市民政局和 F 镇政府共投资约 36 万元，将 S 村闲置小学改建成互助养老中心，不仅改扩建了食堂、简易宿舍，还增加了棋牌室、电视房、电脑房及其他健身实施。政

府直接投资满足了老人们基本的生活和娱乐需要。表现之二为补贴和组织活动。在中心就餐的老人每餐只需支付 2 元用餐费，政府为每人每餐补贴 3 元。此外，政府还组织爱老敬老活动，在老人生日时、重阳节时以及过年时给予几百元不等的补贴。“补助是一种政府给予生产者的补贴……它降低了特定物品对符合资格的消费者的价格”<sup>[25]</sup>。政府通过就餐补助，无形中减轻了老人们的经济负担，促进其参与性。

信息引导类工具的使用。政府和 S 村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媒体和传统的横幅、海报和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等形式来吸引老人们参与。“政府通过信息平台由目标群体自由选择接受的一种工具类型，它以理性解释、感性劝服和相互认同等柔和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目标群体的观念和行为”<sup>[26]</sup>。通过此种工具，扩大了社会影响力，起到广泛的社会动员效果。

#### （2）市场类工具的补充运用

用者付费工具。在互助中心就餐的老人需要缴纳 2 元的用餐费。用者付费是消费者用来满足无论是私人性质的经济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性质的社会服务的基本工具之一。它的广泛运用体现了养老市场中的平等交换原则，进而促进养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市场化补充。互助养老中心兼设小卖部来销售农村居民所需的生活用品，不仅能满足农村居民的日常消费需要，其盈利部分还能促进互助中心的造血功能，用来改善老人福利和专职人员的工资待遇。笔者在其他地方调研也发现如下规律，那些运作得较好的乡村敬老院或福利院，一般都通过充分利用自身条件来进行诸如喂养生猪、承包鱼塘、或者是促使身体条件较好的老人编织手工制品以出售等形式，来改善敬老院和老人的福利水平。那些仅仅依靠政府和村委会投资的敬老院，一般都面临着老人福利水平低，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和管理混乱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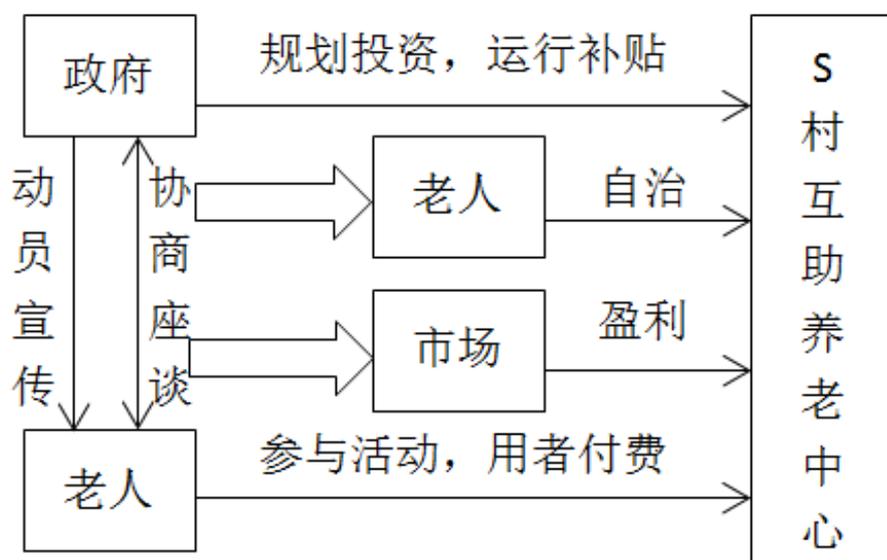
#### （3）自愿类工具的日常管理

互助中心成立之初，由乡镇和村干部在具体负责运行。长此以往，老人们成了互助中心的被组织者，缺乏积极参与的主动性；

干部们也分身乏术，无暇顾及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此，F镇党委书记连续主持了3天的座谈会，就如何开展好互助中心的工作与老人们进行交流。会议结果形成了分部制度和分组制度。分部制度即其组织架构：S村党支部书记兼任互助养老中心主任以处理重要事项和紧急情况，而副主任以及生活部、卫生部和文娱部的正副部长均由老人们选举产生，他们由互助养老中心给予相应的电话补贴作为工作奖励。三个部门各司其职，秩序井然。这也与有学者认为“第三部门在农民福利治理过程中扮演的利益代表者、福利传递者和关系协调者”<sup>[27]</sup>等角色的结论相吻合。

综上所述，虽然互助中心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投入，并辅以用者付费和市场经营的盈利所得，但是互助中心的日常管理却由老人们通过自愿性的政策工具进行自治。它体现了政府投入和老人们参与相结合基础上的“上下互动”运行方式。因此，作为一项政策项目，S村互助养老中心的成立、运作与管理既体现着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方面要素的有序运转，还体现着强制类、市场类、信息传递类和自愿类政策工具的配套使用，同时也启示了政策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互助养老中心运行过程中多主体互动



## 2. 互助中心之外其他福利主体的参与

互助养老中心在成立之初主要是依靠政府在投资规划和制度设计上发挥主要作用，随着市场类工具的补充运用和自治式的组织结构发展，社区、家庭和社会慈善要素等多元主体的福利功能也随之增强与注入，进而形成了多元福利供给格局。

### (1) 社区的福利增加。

其表现为邻里互助得到落实和朋友间的关系网络变得更加密集。邻里互助得到落实。分组制度将地域相近的老人编成一个小组。究其目的，一是方便互助中心快速获知每位老人的及时信息，以防止在突发情况下，迅速采取救济措施；二是倡导邻里之间在生产

生活上相互支持，构成以地域和情感为基础的社区共同体来互助和共助。作为约束规则，此项分组制度较之以前松散的邻里互助显得更加牢固。分组制度设立之后，邻里间互帮互助的情况明显增多。最常见的互助行为，在生活上表现为给其他老人送饭送菜、生病期间的陪护、照看小孩等；在生产上表现为帮助他人植树、收割玉米和拉水泥、修建房屋等。互助和共助传统在有集体化生产经验的老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年轻时的集体化劳动使得他们相互熟悉，且具有较强的集体参与意识。在有效动员情况下，他们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很容易再次被调动起来。

朋友之间的关系网络变得更加密集。互



助中心作为一个供老人们娱乐的活动平台，增加了之前不相识老人之间相互认识和增加友谊的机会。于是，老人们逐渐与那些和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加强了日常交往。此时，交往的地域界限可能由互助中心转移到了双方家里、集市上、乃至田间地头。交往的范围更加广泛，交往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如有的老人通过相互行礼和尝试建立干亲家的方式来维持此种朋友关系。这也与 Sheying Chen<sup>[28]</sup>的研究结论相似，即大多数老人不仅是照料的接受者，还是照料的提供者，并且在需要时还是照料的交换者。如果说朋友间的交往在过去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那么现在的交往更多是建立在趣缘之上。

邻里互助的增加是政府设立此项制度的初衷，其直接功效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有效地消解了当前乡村社区互助关系日渐衰落的症结。日趋密集的社交网络则增加了老人们的心理安全和情感满足，以及对于外围社会的价值。

## (2) 家庭的功能强化

互助式养老模式成立之后，家庭尤其是子女对老人的支持也相对增多。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互助中心提供的电脑网络能够帮助老人与家人进行视频对话，他们通常在工作人员帮助下与预约的子女聊天。记录显示，有 50 多位老人在过去半年中与子女进行过 2 次以上的视频交流。子女不仅是老人的血亲延续，还是他们的牵挂所在。与信件、电话等传统通信方式相比，视频对话的可视性、互动性和真实性，让他们从子女那里感受到更多的精神慰藉和情感满足。其二，子女对老人们的经济支持更多。最主要原因是老人之间日趋紧密的社交网络产生了“人情应酬费”。如上文所言的相互行礼，邀请朋友到家里过生日，在茶馆喝茶等都会产生相应的费用。另外，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老人之间相对公开的信息交流促使那些对父母支持较少或不孝的子女有丧失脸面的可能性，从而被迫增加了对父母的经济支持。

家庭养老功能的强化与回升，相应缓解了人口空巢村老年福利式微的困局。从根源

上分析，它一方面产生于借助现代通信手段与父母进行互动时所产生的情感需要，另一当面也迫于乡村社会的舆论压力。在这种吸引力和压力的双重驱使下，子女对父母的孝心和支待得以萌生和增加。

## (3) 社会慈善要素的注入

因为政府对农村互助中心的大力宣传以及其实际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富有爱心的个人和组织以及社会团体也开始对农村互助中心进行支撑。其表现有三个典型事例：其一是 S 村一位爱心人士每年给予互助中心 5000 元的经济捐赠用以解决水电气开支；其二是一个企业捐赠了一台净水器，用以改善生活用水质量，从而间接提高老人们的身心健康。其三是 2014 年的世界糖尿病日，阆中市中心医院给老人们进行了免费的血糖检测。

社会慈善要素的注入，为老年人的福利供给进行了有益补充。这种意料之外的注入，一方面说明了民间慈善资源的潜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互助养老中心能产生相应的社会吸引力。因此，从长远来看，政府需要继续采用信息引导类政策工具来挖掘各种福利资源，为慈善要素的注入和转化提供便利。

综上所述，在此阶段，家庭、社区和社会慈善要素的回归与注入，体现了福利供给的团结和公益精神，其结果也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社会支持网络。这与 Andrew<sup>[29]</sup>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社区中的社会组织能够帮助建设友好社区，能够帮助实现部分成员的社会福利。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看，它们都属于自愿类工具，体现了较少的政府干预，然而它们也都与政府和互助养老中心存在着相应的互动运转关系，如图 3 所示。有必要说明的是，家庭、社区和公益志愿组织不仅属于实现社会公益的自愿类政策工具，又属于福利多元供给中的重要主体。而此类主体赖以互动的基础是血缘亲情、朋友趣缘、传统邻里和社会的慈善公益精神。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政府通过相应的政策工具塑造出社会空间之后，其他福利主体也依循其自身机制和关系纽带参与其中，共同推动着多元福利的运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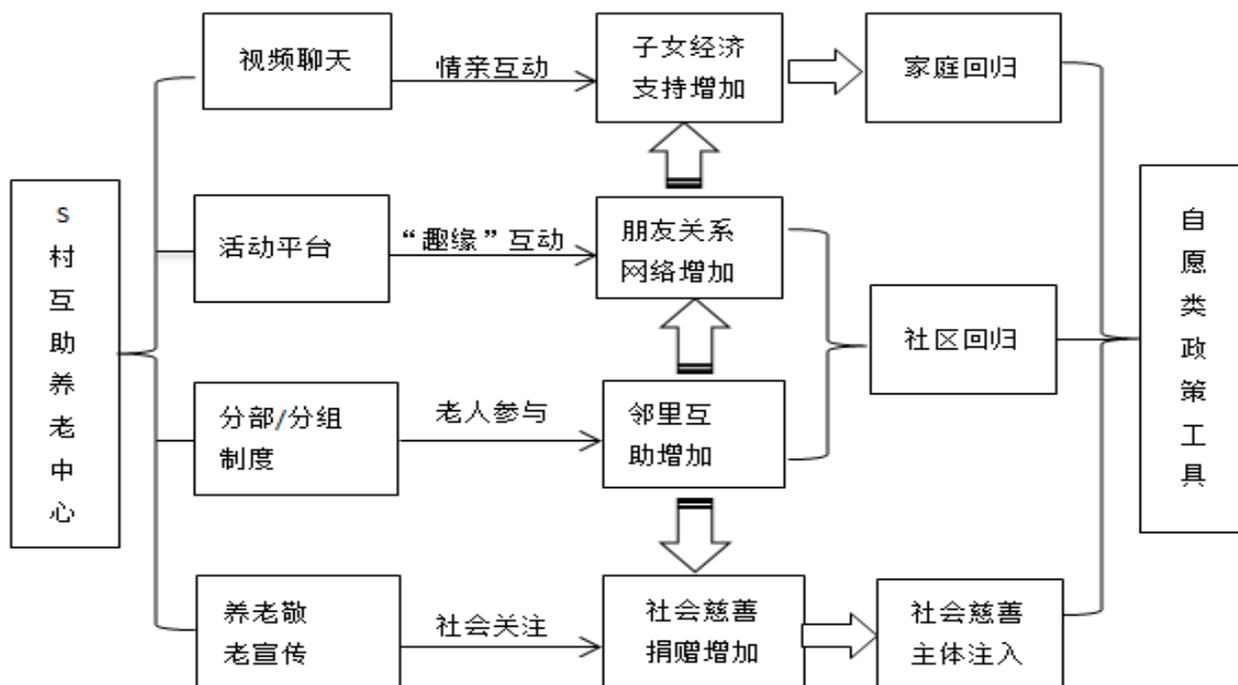


图3 多元福利供给的有效运转

#### 四、政策工具视角下多元福利良性运转逻辑探寻

政策工具的四种类型暗含了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多样化方式。从政策工具视角看，它与福利多元供给之间既存在某种契合性，也存在相应的张力。透过 S 村互助养老中心的发展演变轨迹，从政策工具视角能清晰地透视福利供给中的政府、老人、社区（邻里和朋友）、家庭和社会慈善公益主体之间，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要素综合而成的互助养老中心的互动关系和运转逻辑。

##### （一）多元福利供给良性运转的动因来源于政策工具之间的压力与引力。

政策工具的配套使用是其成功运用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工具之间也具有相应的张力。“政策工具的‘影响’也许可以被看作对于变化的一种预测，对于政策结果的一种回应，以及目标群体对于政策的回应。‘作用与反作用’的研究方式似乎提供了一种对政策工具做动力学研究的新的框架。”<sup>[30]</sup>通过对 S 村经验材料的质感把握，本文将“作用与反作用”重新解构为“压力与引力”。政策工具的压力是指单一政策工具不能有效解决复杂政策项

目时给福利主体造成的紧张感和剥夺感。政策工具的引力是指采取新的政策工具来调适或补充先行政策工具时给福利主体造成的满足感和收益感。基于理性人假设，当福利主体意识到单一政策工具产生的压力时，便会萌生采取新政策工具的引力。也就是说，前置政策工具所造成的压力或后续政策工具所产生的吸引力是促使特定福利主体做出行动改进，与其他福利主体进行互动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在互助养老中心介入阶段，当家庭这一传统养老工具难以有效支撑老年福利时，政府一方面基于留守老人独死家中的负面新闻报道压力，另一方面基于创新留守老人养老模式的政绩吸引力，采取财政投入的政策工具来搭建活动平台、倡导老年互助，以改善留守老人福利状况。当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互助中心难以正常运行给政府和村委会造成压力时，又通过用者付费和增加市场要素来盈利的市场类工具进行补充。当政府采取直接提供和包办式的政策工具难以吸引老人们参与时，老人自治式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便在协商讨论的基础上应运而生，进而替代了之前直接提供的政策工具。在多元福利主体的回归与注入阶段，邻里之间生产生活互助增加既是由于分组制度这种信息



引导类工具的外在压力制约，又是由于此项制度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和吸引力；家庭的回归既是因为互助中心提供的视频聊天吸引力，又是由于老人们社交网络密集所产生的人情应酬费需要，以及农村封闭社区和政府爱老敬老宣传产生的舆论压力。从此角度看，该村多元福利主体正是在基于政策工具之间的压力和引力基础上进行的良性互动。

## （二）多元福利供给运转的中介在于信息引导类工具的运用。

“人们改变行为是因为公共政策改变了他们的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信息作为政策工具被运用是基于人们能对信息做出反应。”<sup>[31]</sup> 信息引导类工具的表现形式既可能表现于政府通过官方途径的信息发布、宣传动员等正式手段作用于目标群体，也可能通过协商谈判、劝诫行销等非正式手段来促成互动。究其功能而言，信息引导类工具不仅是政府促使目标群体理解政策意图的重要保障，还是各福利主体之间信息交流的通道。然而，“信息引导类工具是较弱的，它们很少单独使用，但是经常与其他工具联合使用”。<sup>[32]</sup>

S 村的互助养老项目实施之前，政府采取了宣传动员的策略让社会公众知晓。在项目实施中，政府采取了座谈会的形式保障其他福利主体的协商参与或福利供给。在 S 村老年福利的多元供给中，政府不仅通过多种手段宣传入驻互助养老中心的各种好处，从而动员老人们到养老院娱乐休闲，并参与养老院周二下午的活动。在直接提供和包办式的强制性工具难以凑效时，政府迫于压力与老人们进行协商座谈。在充分听取老人们意见的基础上，达成了另外两项政策工具，一是带有 NGO 性质的志愿型政策工具，即让老人们通过分组和分部制度在日常管理中发挥自治作用；二是带有市场性质的市场类工具，通过增设市场要素来盈利，并对老人采取用者付费工具来提高互助中心的福利水平。

同理，在多元主体的参与阶段，可以发现主要是由家庭、社区和社会慈善公益主体等志愿类工具在发挥作用。它们之间的互动也体现了信息引导类工具的中介作用。社区互助的增加是因为分组制度得以传递并被落实，社会慈善公益主体的介入主要是因为政

府的宣传推介所致。家庭支持的增加和老人间私底下关系网络的密集化趋向，虽然不是政府故意引导的结果，但是仍然体现了家庭与老人之间、老人们之间直接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及政府的连带性信息传递。

## （三）多元福利运转的路径，遵循了强制类工具的出现促进自愿类工具的增加。

“自愿性政策工具强调政府对社会低程度的干预，以家庭自身的维系功能、社区志愿者的互动等非营利组织的参与为其特征。强制性政策工具则需要政府在公共利益、社会福利等涉及全局性方面的责任担当，如直接提供社会福利、对市场失灵的政策矫正等。”<sup>[33]</sup> 志愿类政府干预程度最低，它更多是体现着家庭、社区、志愿组织基于成员亲密关系的个体自助性，互助性和共助性。因此，从此角度看，从强制类工具到自愿类工具的连续光谱也体现了私人性和社会亲密性从低到高的递增态势。

如前文所言，当前形势下的农村养老，从社会产品属性来看，既包含着家庭完全承担的私人性，又体现了政府基础保障的公共性，还呈现了运用市场部门供给的准公共性。然而，在 S 村的个案中，农村留守老人因为经济能力有限没有从市场上购买商业保险，也没有像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那样享受较高的养老金或退休工资。因此，老年人的福利主要是由家庭、政府、社区和互助养老中心在供给，而商业部门并没有发挥作用。

具体而言，在家庭养老缺位的情况下，政府通过财政投入、直接提供等强制类工具来促使互助养老中心的建立。虽然该中心运营体现了多种政策工具的合力，但是就其主要发动者和筹资者而言，政府的强制类工具仍然处于主导地位。然而，通过参与该养老中心的娱乐活动，老人们逐渐与自己趣味相投的朋友建立了更为密集的社会网络。由此所产生的人情应酬费又引起了子女对老人经济支持的增加。互助中心提供的电脑视频技术促使老人们从子女那里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故此，家庭这一养老主体重新被激活。与此同时，邻里互助增加也是由于政府所参与制定的分组制度所致。最后，社会慈善公益主体注入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宣传动员和信

息引导。

从互助中心出现到多元福利主体的回归，展示了在农村老年福利的多元互动过程中，政策工具的运用趋势是从强制类工具到自愿类工具的演变。有必要说明的是，虽然这种转变如老人间关系网络的密集化，子女对老人经济支持的增加，以及社会慈善要素的注入是政府意料之外的，但是这种连带性动员仍然展示了由强制类工具向自愿类工具逐渐转变的规律。

#### （四）多元福利运转的结果编织了一个密集的政策网络。

Kickert<sup>[33]</sup>将政策网络视为一个由多主体之间，在不能单独发挥作用的资源相互依赖状态和制度规则的约束下，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网络。政策网络强调政策工具的选择是政策网络中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动、反复博弈和平衡的结果。政策工具的选择不是一种自由选择，它不是在真空中选择的，它植根于一定的环境，其中存在多种因素影响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行动者是在一个由思想体系、惯例和环境背景支配的政策共同体（或政策网络）选择政策工具的。政策工具既是技术性的，又是社会性的，作为一个特殊的制度设置，它体现了各种群体代表间的互动关系。因此，此处政策网络含义区别于 Marsh 和 Rhodes<sup>[35]</sup>的界定，也不是遵从政治主义观点认为政策网络由政策制定者、利益集团和目标群体的互动所造成。

在 S 村的留守老人福利供给中，由于政府的财政投入和宣传动员，四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均被运用进来。政府、社区、家庭和社会公益慈善主体运用多种政策工具进行互动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复杂网络。政策网络的编织肇始于政府，但是却引起了多主体的陆续参与。因此，网络编织的过程也就是各种政策工具被恰当运用之时。老人不仅是福利的接受者和享用者，同时还是网络的编织者。当老人既是福利供给主体，又是福利的使用者时，因为动力充足，在其他资源充沛的条件下，网络编织的速度更快，网络的密集度更高。

网络结构包含参与者、整合程度、资源和权力四个维度。从网络的参与者来看，涉

及到多个福利主体，其价值理念都明确指向怎样更好改善老年福利。从网络的整合程度来看，此种网络一旦形成，各主体之间在养老敬老的价值观上保持相对稳定，其行为具有较强的连续性；从网络的资源来看，各主体都享有相应资源，并且相互依赖，共同发挥作用；从网络中的权力向度来看，政府拥有较大的权力，但是老人们仍然在互助中心的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网络成员间呈现出正和博弈。

#### 五、结语与讨论

帕特南<sup>[34]</sup>通过考察意大利南北地区的民主运转绩效差异，揭示出促使民主制度有效运转的关键是存在较为密集的公民互惠网络，以及基于信任、规范和网络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本文通过考察 S 村互助式养老个案，揭示出促使政府、社区、家庭、慈善公益组织，乃至老人自身等农村多元福利供给运转起来的关键是一系列政策工具的合理运用。其有效运转的逻辑表现为：政策工具之间的压力和吸引力是多元福利供给运转的主要原因，信息引导工具充当了运转的传递中介、从强制类工具到自愿工具的转变是运转的基本路径，较为密集的政策网络是运转的总体结果。进而言之，政策工具的多个侧面呈现了多元福利供给运转的动力来源、中介方式、运转路径与互动结果。因此，本文在借鉴萨拉蒙等学者观点基础上，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定性分析，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场景尤其是在农村养老中，政策工具与多元福利运转的关联研究，使之更加具体和深入。

虽然说“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消费或运作模式可以称为国家主导的社区供给模式”<sup>[35]</sup>，但是家庭、社区和社会慈善要素能在政府连带性动员下对老年福利进行供给。然而，从该个案中也可以看出不同的福利供给主体折射出不同的理念和作用机制。政府依靠权威，体现了平等保障的公民权理念，彰显了政府与公民关系；市场依靠价格机制，体现了个体自主选择和平等交换的价值观，彰显了行动者与经济的关系；社会组织依靠志愿精神，彰显了利他主义的慈善理念，彰显了社会与行动者关系；社区依靠传统价值观，体现了社会成员相互依赖性理念，彰显了邻里间、



朋友间社会纽带关系；家庭依靠血缘纽带，彰显了亲密团体的团结和共有价值，彰显了亲属间互惠关系。在多元福利运转互动的背后是多元理念的交融。因此，政府在运用政策工具动员其他福利主体生产福利时，不仅需要认识各种政策工具的自身特性和作用范围，还需要注意其他福利主体背后的理念和作用机制。如此，方能构建出良性有效的多元福利运转机制。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基于埃斯平·安德斯<sup>[36]</sup>认为社会福利（包括老年福利）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社会结构和职能变迁逻辑，还是龙天翔<sup>[37]</sup>认为社会福利的发展来源于政治运作逻辑，抑或是景天魁<sup>[38]</sup>指出中国特定国情下社会保障的发展是谋求与经济发展均衡性、促进社会福利的底线公平，都指出了政府在社会福利供给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然而，政府适当的社会福利投入和其他方面支持并不必然产生福利依赖，相反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留守老人的福利需求。政府在人口空巢村创造出具有福利吸引力的社会空间基础上，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能够吸纳老人参与其治理。在此过程中老人的自主性得以彰显，进而充当了老年服务的生产者或供给者，而并不总是被动等待政府予以支持和救济的接受者。

此种福利模式在当地的 success，与政策工具的科学选择、合理运用紧密相关。清晰界定政策项目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政策环境是政策工具选择与执行的基础。现阶段，老年福利具有多种性质，既有由家庭养老的私人产品性质，也有政府平等保障的纯公共产品性质，还有以市场营利为导向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劳动力外流致使家庭养老功能式微，F镇老人未富先老的现状决定了从市场购买养老服务的较小可能性。家庭和市场功能弱化的困境，加上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和空巢老人数量多的现状，决定了政府强化养老的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决策选择，在养老服务过程中担负重要作用。

从政策工具操作化的视角来看，在互助式养老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侧重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配套运用。在互助养老中心发展初期，强制类政策工具应先行以发挥导向作用。政府通过财政投资的形式来兴办互助养

老中心，搭建养老平台，让老人首先有去处就餐和娱乐，以解决基本生活需求。此阶段，信息引导类工具要发挥动员宣传，促使老人和社会大众知晓的作用。随着养老中心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采取用者付费和其他市场化工具来减少互助中心运营负担，提高运营效率。在日常管理上，采取老人自治式的组织结构负责运行。此阶段，信息引导类工具表现为政府与老人通过各种方式与老人协商，帮助其建立组织架构和互助制度。在互助式养老成熟阶段，各种自愿型的政策工具，如家庭、社区和社会慈善要素会被连带性动员起来进行福利供给。此阶段，信息引导类工具要求政府建立起与家庭和社会慈善组织的联系，做好养老资源转化的桥梁和催化剂。

从多元福利的本体化视角来看，虽然中国政府的福利投入低，社会自主性和组织化程度不如西方的团体格局和市民社会发达，社会成员尤其是农民群体从市场上获得的职业福利和商业保险也不足，但是在政府的连带性动员下，家庭和社区却有可能成为福利多元供给的潜在力量。其一，从家庭来看，虽然它的福利保障功能在减弱，但是传统上“家庭本位”和儒家孝道观念的影响却仍然留存，只是受到市场理性的侵蚀而被遮蔽和收缩。在一定的压力和引力作用下，子女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功能得以回归。其二，从社区来看，虽然传统意义上的福利功能日渐萎缩，但是社区内的关系网络和邻里互助传统却仍然潜在，并没有完全割断。在有效动员情况下，社区纽带很容易被再次联结起来。动员的关键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如政府来进行投资、规划和引导，创造一个公共活动空间。其三，从政府来看，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不仅要增大社会福利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构建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基层政府还要在福利服务供给中扮演“能促者”角色，充分挖掘其他福利主体如家庭、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优势并培养其能力。与西方政府主要是依靠合同外包和购买服务等市场类工具来与社会组织发生互动不同，中国的基层政府在其他福利主体缺失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还要善于运用强制类工具和信息引导类工具成立福利组织，甚至在发展初期直接参与管理，直到该组织自身能建立起运行制

度。

从政策学习或政策转移视角来看，目前阆中市已在全市 10 多个乡镇推广互助式养老项目，说明该政策项目的有效性和适用性。然而，此种互助式养老是创立于人口老龄化程度高、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普遍，留守老人数量多，老年福利资源较为短缺的人口空巢村。因此，此种养老模式决定了其在同种类型的农村地区具有更强的借鉴性和适用性。然而，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地区，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逻辑、当地特有的人口结构和可能潜在的福利资源是政策移植地政府学习和决策的重要变量。于此，方能构建出符合当地

实际的老年福利模式。

本文的局限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该种福利模式对于该区域的经济状况、人口结构以及潜在的福利资源具有特定的依赖性。论文没有选择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老年福利供给进行对比研究。其二，受制于个案实际制约，合同外包、政府购买服务等次级工具没有更好体现出来，致使市场类工具如何促使多福利主体运转没有得到深入探究。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有选择性地收集资料，从政策工具视角对多元福利供给展开更全面的分析。

## 参考文献

- [1] 林闽钢.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政策实践[J].社会, 2002(7): 36—37; 汪大海、张建伟.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问题[J].华东经济管理, 2013(2): 118—122; 乐章.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医疗保险政策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 2009(5): 37—51; 张敏.社会支持网络研究——对大连社区公共服务社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 2007(12): 48—57.
- [2] 张新文、杜春林.政策工具研究路径的解构与建构[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4(3): 14—20.
- [3] Richard Rose. Common goals but different roles: The st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welfare mix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8.
- [4] Norman Johnson. Welfare Pluralism: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in Adalbert Evers & Ivan Svetlik. *Balancing Pluralism—New Welfare Mixes in the Care for Elderly*, Aldershot: Avebury, 1993: 51-66.
- [5] Abrahamson, P. Welfare Pluralism: Towards a New Consensus for a European Social Policy [J]. *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Europe*, 1995(1): 29-42.
- [6] 彭华民、黄叶青.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40—48.
- [7]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3）：1—5.
- [8] Norman Johnson. *Mixed Economies of Welfar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M]. Prentice Hall Europe, 2002: 22.
- [9] 李长远、张举国.养老服务本土化中政府责任的偏差及调整[J].人口与发展, 2013(6): 84—89.
- [10] [加] 迈克尔·豪利特, 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 [M]. 庞诗, 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6: 144. 豪利特等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类, 混合类和自愿类三种。
- [11] [美] E S 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伙伴关系 [M]. 周志忍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69. 萨瓦斯按照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和安排者组合, 将政府工具划分成从政府服务到自我服务的连续光谱。
- [12] 陈振明.政策科学（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77. 陈振明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三类。
- [13] 朱春奎.政策网络与政策工具：理论基础与中国实践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34—136. 朱春奎在豪利特分类基础上细分了次级政策工具, 增加了命令性和权威性工具、契约和诱因型工具。
- [14] 王辉.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的逻辑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 2014(3): 14—23.
- [15] [加] 迈克尔·豪利特, 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 [M]. 庞诗, 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6: 281.
- [16] B. Guy Peters and Frans K. M. Van Nispen: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s*, Edward Elgar, 1998: 48-54.
- [17] [美] 莱斯特 M 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关系——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M]. 田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16.
- [18] 高祖林.政策网络视域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研究[J].江海学刊, 2013(3): 201—207.



- [19] Hildegard Theobald. Combining welfare mix and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 case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German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2012(21): 61-74.
- [20] Richard J. Estes, Huiquan Zhou. A conceptual approach to the creation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social welfar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2014(1):1-16.
- [21] 姚远.中国家庭养老研究述评[J].*人口与经济*, 2001 (1): 33—43.
- [22] 穆光宗.我国养老机构发展的困境与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2):31-38.
- [23] [美] E·S·萨瓦斯. 民营化与公私部门伙伴关系[M]. 周志忍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82.
- [24] 徐媛媛、严强. 公共政策工具的类型、功能、选择与组合[J].*南京社会科学*, 2011 (12) .73—79.
- [25] 韩央迪. 农民福利主体的结构转型与福利治理可能[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4): 154—161.
- [26] Sheying Chen. Social Policy of the Economic State and Community Care in Chinese Culture[M].Avebury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6:267.
- [27] Andrew E. Scharlach & Carrie L. Graham. Does the Village Model Help to Foster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J]. *Journal of Aging & Social Policy*, 2014(8): 181-196.
- [28] 顾建光.政策工具研究的意义、基础与层面[J].*公共管理学报*, 2006 (4): 58—61.
- [29] Lester M.Salamon. The Tools of Government[M].Oxford Press,2002:218.
- [30] B.Guy Peters and Frans K. M. Van Nispen: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s, Edward Elgar, 1998:76.
- [31] 张新文.政社关系视角下的公共政策工具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7 (3): 140—144.
- [32] Erik hans Klijn. Analyzing and Managing Policy Processes in Complex Network[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1996(5): 90—119.
- [33] Marsh,D.& Rhodes.Policy Networks in British Government[M]. Oxford: Clarendon, 1992: 251.马斯和罗茨将政策网络划分为成员少、价值观念相同、资源相近、权力平衡、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 以及与这些特征相反的问题网络(Issue Network)。然而两者都是一种极端, 在它们之间还存在若干形势的连续光谱。
- [34] [美]罗伯特 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208.
- [35] 高鉴国、高功敬.中国农村公共品的社区供给: 制度变迁与结构互动[J].*社会科学*, 2008 (3): 68—76.
- [36] [丹麦]埃斯平·安德斯.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J]. 古允文译, 台北: 巨流出版社, 1999: 27—34.社会结构和职能变迁逻辑有三方面解释: 工业化逻辑, 即工业化发展导致传统家庭和社会福利保障功能衰落, 致使国家福利干预职能的出现; 民主制度逻辑, 即政党为了满足大多数选民需要, 进而发展社会福利; 资本主义阶级逻辑, 通过社会福利来缓解阶级矛盾。
- [37] Christian Aspalter.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2006(15): 290—301.政治运作逻辑强调社会运动和阶级、政党以及政治家在福利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作用。
- [38] 景天魁.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的柔性调节[J].*社会学研究*, 2004 (6): 32—40.

### The Logic of Effective Operation of Pluralistic Welf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Wang Hu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The provision of pluralistic welfare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endowment in rural China. However, how to make pluralistic welfare work together to form an effective provision network has not been thoroughly studied. Policy tools can be deconstructed into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welfare subjects. Therefore, based on i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mutual endowment in S Village as an example and applies the deep description to interpret the logic of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pluralistic welfare. The motives of effective operation originate from the pressures and gravitation between policy tools. The medium of that is the application of guiding policy. The path of that is the emergence of mandatory tools promoting the increase of voluntary tools. The result of that are dense policy networks has been weaving. This article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matched use of different policy tools driving the provision of pluralistic welfare in empty nest village. Then it tries to go beyond the case so as to briefly summarize the operation of policy tools, the ont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welfare pluralism as well as the condition of policy transfer.

**Keywords:** Policy Tools; Provision of Pluralistic Welfare; Operational Logic; Left-behind Elderly; Case Study

# 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的“认知内卷化”

## ——以上海 XH 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

李利文 申彬 彭勃

**摘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外在表现有“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支配这种外在表现的中介因素实质是“认知内卷化”。“认知内卷化”强调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创新主体基于一定的社会图式而不断强化某一思维，从而导致这一思维所附带的问题不断受到强化，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实质突破。本文以上海市 XH 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采用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行为和话语进行分析，发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在自动化认知期的社会图示是“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很复杂，而社会力量又很薄弱，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给予帮扶”。在随后的控制性认知期，基层政府部门通过调研和走访所输入的信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社会图式。最后在表征印证期，“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印证了“认知内卷化”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中的中介作用。

**关键词：**“利益内卷化”；“组织内卷化”；“认知内卷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一直是解释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理论范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逐渐从国家中脱离出来，国家的许多制度和创新在名义上都指向全能政府的弱化和自治的加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然而，国家为实现其管理和秩序的需要，社会力量并未得到“没有约束的发展”，国家力量实质上还在不断下沉，并通过“分类控制”<sup>[1]</sup>、“行政吸纳”<sup>[2]</sup>和“嵌入式监管”<sup>[3]</sup>等方式实现国家意志。近年来，社会基层治理创新层出不穷，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甚至还发起了“中国社会创新奖”，但这些新现象和新影响背后隐藏的仍然是国家的行政逻辑。如全国到处蔓延的“网格化管理”，其实质是“透过信息平台进行权威整合与行政力量下沉，实现社会控制的目标”<sup>[4]</sup>；上海正在大力推行的“镇管社区”逆行政化创新“并没有完全跳出行政逻辑的思维，改革的结果是有限共治和行政下沉”<sup>[5]</sup>等。由此可见，由国家主导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质上走向了“内卷化（Involution）”。

“内卷化”一词源于拉丁语，原意是“转或

卷起来”，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分别是“文化内卷化”、“农业内卷化”和“国家内卷化”。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首先用该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sup>[6]</sup>。后来，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受此启发，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中提出了“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认为“印尼爪哇地区农业部门在外部扩张（包括农业的外延性扩展）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只能向内使耕作趋向精细化和复杂化，以此在农业内部自我消化增长的劳动力，同时又不致造成人均收入下降”<sup>[7]</sup>。后来，黄宗智也对长三角地区“农业内卷化”进行了研究，发现了“无发展的增长”。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则主要将其运用于国家权力的描述，认为“国家内卷化（State-Involution）”是“国家与社会旧模式的复制、延伸和精致化”<sup>[8]</sup>。由此可见，“内卷化”的基本含义是指外部扩张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而出现并不能带来实质性发展的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主要是指在国家主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中，由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3AZD089）

作者简介：李利文，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申彬，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彭勃，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受国家框架和资源数量的限制，以强化社会自治为目标的改革逐渐为国家力量不断下沉和精细化所取代的过程，且这一过程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发展。其主要表现为“组织内卷化”和“利益内卷化”。“组织内卷化”主要是指在以强化社会自治为目标的社会治理创新中，基层政府通过组织结构的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来提供社会服务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利益内卷化”是指在以强化社会利益为目标的社会治理创新中，基层政府通过新的制度安排使部分组织和个人利益不断强化和内嵌于社会制度的过程。目前关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贺雪峰为代表的“乡村社会治理内卷化”，一是以何艳玲为代表的“城市社会治理内卷化”。

“乡村社会治理内卷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利益内卷化”。在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中的各利益主体行为逻辑及相关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结盟的全新结构。<sup>[9]</sup>乡村混混逐渐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向经济精英转型，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sup>[10]</sup>在资源分配中，灰黑势力主动拉拢基层组织官员，在土地开发等事项中，基层政权反而向灰黑势力求援。<sup>[11]</sup>在国家资源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势力、某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sup>[12]</sup>二是“组织（制度）内卷化”。在基层治理主体结构中，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都出现了“内卷化”，其社会服务、社会管理职能退化，自利性、赢利性和掠夺性动机增强。<sup>[13]</sup>建立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是深化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合作社虽然在数量上有了迅速增长，但并没有使小农经济的性质发生实质性改变，没有出现预期的农业现代化的革新和演变。<sup>[14]</sup>另外，还有研究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认为不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会不断强化并进行线性发展，也应注意其“内卷化”。<sup>[15]</sup>总之，“乡村社会治理内卷化”已经改变了乡村利益关系结构和组织生长方式，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缺失和乡村社会秩序混乱，从而引发

新的乡村治理危机。

“城市社会治理内卷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议题上。一是城市社区自治。当前国家主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际上是国家权力触角重新延伸到城市基层生活的过程，而这种权力的延伸与渗透是以内卷化为特征的。<sup>[16]</sup>何艳玲和蔡禾首先指出了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中出现的“内卷化”问题，认为在居委会组织变革中，虽然新的组织要素（例如社区代表大会、居委会委员的直选等）已经产生，但居委会组织变革真正要指向的组织性质和实际运作机制却没有根本改变，在一定意义上，原有的居委会组织性质还得到了加强。<sup>[17]</sup>后来一些学者试图对城市社区自治中的“内卷化”进行解读。如张付强从空间转移、权力转移和利益转移三方面对西方国家社区自治改革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内卷化规避”的空间模型，认为社区自治改革的成功运行必须同时具备空间转移的发展取向、权力转移的路径协调、利益转移的民主保障和实质性参与四项内容。<sup>[18]</sup>还有学者从社会资本角度进行解读，认为差序伦理造就的人情化关系网络构建的个体性社会资本直接渗透于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的微观权力运行中，是基层政权内卷化背后的隐性逻辑<sup>[19]</sup>。二是城市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主要表现在社会交往<sup>[20]</sup>、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进入城市空间，但其就读的学校大多是农民工子弟学校，接触和交往的对象主要还是农民工群体；由于受户籍政策等制度性影响，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新生代农民工很难通过个人努力从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城市生活，却经常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偏见和歧视，缺乏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和怨恨情绪。这些都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受到限制，使其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关系不断深化，进而可能拉帮结派，结成团伙，产生犯罪问题。总之，“城市社会治理内卷化”的不断发展使城市基层政府结构不断膨胀，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不断嵌入和深化，整个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刚性越来越强，弹性越来越弱。

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已

有研究来看，无论是“乡村社会治理内卷化”，还是“城市社会治理内卷化”，其主要表现为“组织内卷化”和“利益内卷化”，而且“利益内卷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内在地推动着“组织内卷化”。虽然许多学者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现象都有过细致的观察，但目前对其成因和作用机制研究还不深入。如现有研究中出现的几个解释变量，“社会资本”太过宏大，而且社会资本本身所包含的内涵也十分宽泛，不能很好地从微观视角进行剖析；“制度环境”太过宽泛，尤其是在“内卷化”多因分析中很难厘清何种制度在起根因性作用；“非协调约束”只是从组织理论视角强调了组织形式与组织运作的分离，还未深入挖掘这种机制的内在根因；“理性约束”太过功利化，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假设在实际社会中可能适用有限；“内卷化规避”的空间模型过于强调空间、权力、利益和参与等因素的综合性作用，因而缺乏“内卷化”成因的细致分析。从总体上看，现有解释变量大都侧重从“客观”视角对其进行解释，而缺乏从主观视角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成因进行解释。经过对上海市 HX 区物业管理改革长达半年多的调研和观察，发现“社会认知”主观变量在“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中发挥着重要中介作用。社会图示和“内卷化”机制在相互嵌入的整合作用下形成“认知内卷化”，而主观的“认知内卷化”变量，一方面促进了“组织内卷化”和“利益内卷化”的加深，另一方面“认知内卷化”在一定的外在条件和刺激下进一步精细化和复杂化。因此，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认知内卷化”模型来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成因机制做进一步探究。

## 二、模型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一种新解读方式

“认知内卷化”模型是建立在“内卷化”和“社会认知”两个概念的基础之上的，这里在借鉴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先对两个概念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的学理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一般的解释模型，以期能够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提供一种全新的解读方式。

### （一）“内卷化”的外在表征与内在逻辑

为明确“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内在机制和社会后果，这里首先将其内涵与西方公共管理学中的相关理论进行简要的比较分析。“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实质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受到资源和其他方面的限制；二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向目标被暗中替换；三是基层行政力量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其有两个重要表现，分别是“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利益内卷化”同样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利益向外扩张受到限制；二是公共利益为个人利益所替换；三是个人利益与制度结构不断深化和内嵌。“利益内卷化”的直接后果是“关系生产”，即公共利益目标为私人利益目标所俘获，以利益关系的不断加强来获取资源分配。其社会表象是社会主体之间非生产性活动（如人情往来、游说、疏通、拉关系、走后门等）增多，而社会发展却停滞不前。西方的“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实质上能很好地诠释“利益内卷化”现象。寻租理论认为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租金是指支付给资源所有者款项中超过那些资本在任何可替代的途径中所得款项的那一部分，是超过机会成本的收入。<sup>[21]</sup>寻租实质上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其不会增加任何新产品和新财富，只是生产了“社会关系”，并通过“社会关系”影响资源分配。寻租是政府干预市场的后果之一，政府介入市场的程度越高，寻租产生的概率也就越大。可见，“利益内卷化”与“寻租理论”在表征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在逻辑上具有高度契合性。

“组织内卷化”同样也包含三层含义：一是组织发展受到资源等方面限制；二是组织目标被异化或被替换；三是组织自身不断膨胀和精细化。“组织内卷化”的直接后果是组织结构不断复制和膨胀，间接后果是因组织膨胀带来的权力也在不断生产。如组织内行政人员、行政层级、行政部门的增加，都是机构复制和权力生产的表现。这些“增长”却不能带来社会效率，反而制约了社会发展，是一种典型的非生产性行为。西方行政学中的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在一定程度上与“组织内卷化”暗合。帕金森定律是英国“民众行政理论家”帕金森在对组织机构的无效活动进行调查和分析中提出的关于组织



机构臃肿低效的形成原因的定律。其包括两个法则，第一是增加部属法则，即一个行政官员想增加的是下级而不是对手，因为这既可以减少竞争对手，又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第二是增加工作量法则，即随着部属增加和人员增多，行政官员彼此之间也人为地制造了工作、增加了工作量。帕金森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繁琐定律，即各级行政机构一旦建立，内部势必设满各种委员会、董事会等机构，而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必须通过他们才能解决。<sup>[22]</sup>可见，帕金森定律与“组织内卷化”在表征上和逻辑上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相似性。

## （二）“社会认知”的内在机制

社会认识（Social Cognition）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中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领域。社会认知是指人们如何选择、解释、识记和使用社会信息来做出判断和决定。社会认知有两种类型，分别是自动化社会认知和控制性社会认知。一般而言，社会认知的形成路径是从社会图式中提取信息而进行自动化思维的过程，即人们在信息获取过程中会基于自身的社会图式采用一种无意识的、不带意图的、自然而然的并且不需要努力的自动化思维（Automatic Thinking）。图式（Schemas）是指经过对来自社会环境的信息进行选择 and 加工后在人脑中组织起来的认知系统。图式和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所处位置的优越性决定了这些图式和概念被提取的可能性。虽然社会图式是我们做出选择和解释的重要向导，但当社会图式被证明是错误的之后，其仍然具有持久性。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就是这样起作用的：（1）人们对其他人怎样产生一个预期；（2）这会影响到他们如何对待他人；（3）而这种对待方式又会导致那个人的行为与人们最初的预期相一致，使得这一预期成为现实。<sup>[23]</sup>自证预言的启动前提是社会图式在个人头脑中起着重要作用，而社会图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即刻板效应或内隐社会认知。迈尔斯指出了这种刻板效应或内隐社会认知的有三种内在逻辑。一是类别化，即认知过程中进行自动类别化，

这会夸大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二是独特性，即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会使我们意识到在其他情形下注意不到的差异，这可能导致人与行为之间的错误相关（Illusory Correlation）；三是归因，即将人的行为归结于内在品质，这会导致利群偏差。<sup>[24]</sup>

第二种是控制性社会认知，即一种有意识、有意图、有目的、需要努力的控制性思维（Controlled Thinking）。人们通常可以自由地开启和关闭这类思维，这类思维对自动化社会认知具有制衡作用。人们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对一件事情进行有意识的、控制性较强的思考。但人们心不在焉时或动机水平较低时，很难进行控制性思维。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可能接受错误信息并很难进行抑制思考（Thought suppression），即避免想到那些自己宁愿忘掉的事情。控制性认知的另一种思维是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Thinking），即在心理上改变过去的某些环节，以便想像事情有可能不同。但长期沉溺于反事实推理可能给人情绪产生负面影响。

## （三）“认知内卷化”模型构建

本文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成因机制中人的主观“认知”起着重要作用。基于“内卷化”的内在逻辑和“社会认知”的内在机制，本文提出了“认知内卷化”概念，其强调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创新主体基于一定的社会图式而不断强化某一思维的现象，导致这一思维所附带的问题不断受到强化，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实质突破。“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实质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其形成过程中主要包括三个阶段：

1. 自动化认知期。在该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会基于个人的社会图式来自动地、无意识地、无意图的、不带目的地、自然而然地对基层社会问题进行理解，但社会图式本身所附带的社会偏见和自证预言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都可能会影响到对基层社会问题的客观选择和判断。

2. 控制性认知期。在该阶段创新主体会启动具有目的、有意识、有意图、要努力的控制性思维，控制性思维启动的目的在于制衡自动化思维，克服自动化思维中一些具有

偏见或不客观的思维观念。控制性思维的启动实质就是新信息和新知识的输入，当输入的信息和知识与自动化认知期的社会图式一致时，原有的社会图式则得到强化，同时原有社会图式所附带的问题也得到强化，这样就形成了“认知内卷化”。

3. 表征印证期。实质上以上两个阶段已经形成了“认知内卷化”，“认知内卷化”支配“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的机制将通过“认知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的进一步加深而得到验证。而且“利益内卷化”与“组织内卷化”加深的表征是很容易观察到的，这也是许多基层治理研究者判断基层社会出现问题的重要依据。

正是基于以上内在逻辑，本文引入了解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一个新的解释变量“认知内卷化”，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认知内卷化”是导致“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

化”的重要中介变量。即“认知内卷化”是引发“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加深的重要环节（见图1）。

笔者2015年3月至2015年12月对上海市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观察和调研，调研对象包括相关政府干部、专业学者、物业律师等。该研究在主要运用观察法和座谈会的同时也辅之以文献分析法，对获取的大量政策文献进行分析，以确保经验材料的完整性。另外，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对调研的地名和人名进行了化名处理。虽然“认知内卷化”很难通过直接观察发现，但作者根据调研对象的一系列行为和话语表现来进行推理，从而提炼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根因逻辑。故此，本文以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个例来验证“认知内卷化”模型的合理与否，并试图探寻“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内在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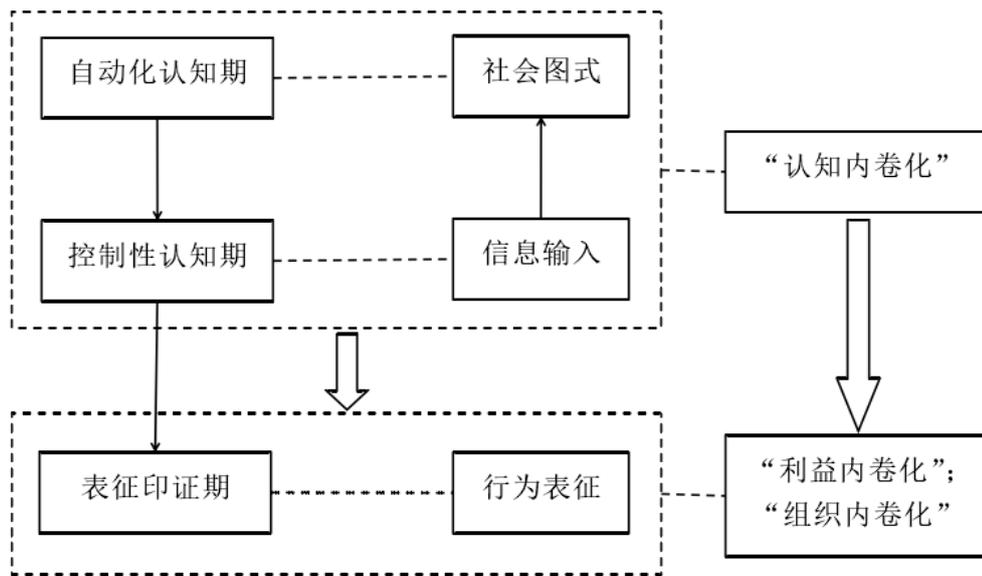


图1 “认知内卷化”的模型假设

### 三、模型解构：以上海市 XH 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

上海市 XH 区根据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加快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落实《上海市关于加强本市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和《上海市加强住宅小区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区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简称房管局）从 2015 年 3 月起就开始酝酿进行

物业管理深化改革工作，2015 年 9 月中旬正式启动，2015 年 9 月至 10 月进入试点小区调研期和改革方案明晰期，2015 年 11 月进入试点运行期。在这一改革推进过程中，相关政府干部、专业学者和物业律师都参与其中，并对深化物业改革方案产生重要影响，下面将分三个时期对其行为和话语进行分析。

#### （一）自动化认知期：物业深化改革的酝酿与启动

这一阶段主要通过房管局课题开题报告



会和物业管理深化改革动员会反映相关人员对物业管理深化改革的“社会图式”。这一阶段反映的是各相关主体对物业深化改革的最初印象，也是各相关主体利用已有的知识结构来表达问题的时期，其所反映的观点应该是不带目的、不带意图、自觉自发的。因此，这一阶段形成的观点将成为推动物业深化改革的基调。在具体调研中我们主要看到三种表述较多且基本统一的观点。

物业管理问题十分复杂。物业管理纷繁复杂，涉及的主体多、内容多，由此衍生的

问题和矛盾也十分复杂，许多基层干部反映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更有一些基层干部抱怨社区物业管理工作具有极大的反弹性，一些问题和矛盾在解决之后，没隔多长时间又冒出来了，社区物业管理缺乏长效解决机制。根据在房管局课题开题报告会和物业管理深化改革动员会中各政府干部、专家学者和物业律师等的反映，主要总结出以下四类反映突出的问题（表1），他们认为这些问题错综复杂，长期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表1 反映突出的四类物业管理问题

理顺关系	具体问题
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关系	“三条六方”（即代表政府的房管局和街道办、代表市场的物业服务企业和服务企业、代表社会的居委会和业委会）的组织性质、职能定位、相互关系不明确。
物业权属关系	没有对物业管理标的物的权属进行清理，物业管理的居住空间和公共空间权属划分不明晰，所有者权属和权力义务关系不明确。
物业管理费用收支关系	物业收费结构、性质、标准不规范，物业管理运行、经费收缴支出的监督机制还没建立起来。没有实现管养分开的收支、作业管理机制。
物业管理市场化运作机制	物业管理权获得的招投标机制，物业管理费用定价的询价、评估机制等都还不完善。没有形成与房地产一、二级市场相衔接的完整的市场交易体系。

资料来源：该表格主要根据 XH 区物业深化改革开题报告会和物业管理深化改革动员会的内容及相关文件整理所得。

在物业管理深化改革试点工作动员会议议程中 TL 街道办事处代表的发言也很好地体现了大量基层干部共有的心声。

“TL 街道有住宅物业小区 67 个，面积约 400 万平方米。其中商业房小区 34 个，售后房小区 26 个，混合型小区 7 个，共有 35 家物业服务企业，已成立业委会的有 61 个。作为一个人口密集的居住型城市社区，TL 街道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面临着各种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1）物业公司入不敷出，严重影响物业管理水平；（2）维修资金和公益性收入的监管及维修资金二次筹集问题；（3）混合型小区的管理问题。”（WYGL-20150916）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领导在 XH 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试点工作动员会上甚至说：

“物业管理搞好了，街道一半以上的任务就完成了”（WYGL-20150916）

XH 区委副书记在 XH 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试点工作动员会中总结其过去多次调研的经验和感想中也提到：

“在‘满意在 XH’的大走访过程中，我们群众反映最多的就是物业管理问题。我们现在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不能解决的、最要上交的也是物业管理问题。居委会干部 60% 以上的精力就是在做和物业管理相关的工作。”（WYGL-20150916）

以上材料都反映了许多市级、区级和街道层面的政府干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都认为物业管理问题十分复杂，需要多方主体通力合作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解决。

社会力量仍旧薄弱。社会治理创新中社会主体力量仍然不强是许多政府干部和专家学者的普遍感受，一些政府干部甚至表示，政府非常希望社会力量能够承接政府分离出来的社会职能，让其充分发挥自治功能，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这样政府的负担实际也减轻了，但他们认为虽然现在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鼓励和培育社会力量，但总体上而言，社会力量还很薄弱，还不能承接政府转移的社会职能。我们在“社会协商机制研究”的暑期调研中，一位来自 XH 区委组织部的代表说：

“群众的自治能力不强，只有在参与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提高，参与能力不是天生的，不是开个会就能提高的，只有在参与中才能懂得沟通、怎么尊重规则。”（XSJZ-20150901）

其表示社区协商机制构建的最大难点在于群众自治能力还不够，这也从侧面体现了社会自治力量还很薄弱。XH 区房管局局长 RY 在开题报告会上在以往诸多研究的经验基础上也强调社会力量参差不齐，认为目前应该重点对其进行分类研究。

“关键问题是理顺关系，主要问题是政府缺失、市场缺失、自治能力不强，我们要选择一些小小区，面上的调研工作我想也没有很大的意义了，以前做了很多很多了，也可以整理出很多条，应该集中在不同类型小区，做一些调查摸底工作。”（KTBG-20150824）

中共上海市社会工作委员会领导 MT 在物业管理深化改革动员会上指出业主和居民的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还不强：

“在业主和居民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现在居民的法治素养和文明意识有待提高，有的对物业管理的知识也不很了解，根据社科院的一项调查，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居民了解《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上海市物业管理住宅规定》等相关法规，部分群众守法意识和义务观念也不很强。有的片面追求私利，也不考虑是否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和公共利益。只愿享受权利，不愿承担义务，在我们居民区中还是屡见不鲜的。”

（WYGL-20150916）

上海市司法局的领导 MJ 还在物业管理深化改革动员会上对业委会的自治结构和自治能力表示担忧：

“现在业委会有的搞监事会的，有的不搞，有的制度已经明确了，有的还没有，反正什么的都有。现在（即使）制度明确的话，它的结构和一些现在发育的功能，如果直接把它当做一个组织来研究的话，问题还有很多，现在它还不是法人代表，没有法人资格，作为权力组织的话，它叫代表大会，或者全体业主大会，而实际上也是不能实现的。”

（WYGL-20150916）。

XH 区委副书记 ML 在物业管理深化改革动员会上甚至对传统社区自治主体居委会的能力也同样表示担忧：

“一些物业管理问题居委会根本无法解决，RY(XH 区房管局领导)正在研究筹建的物业管理指导中心，它也是全市首创，我觉得很好。这些事情最有权力去做的其实就是我们行业管理部门，因为我们街道的推广性还是有限的。”（WYGL-20150916）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许多政府领导都认为社会力量还很薄弱，无论是个体层面的居民和业主，还是组织层面的业委会和居委会，其自治力量还很薄弱，无法有效承接政府转移的社会职能。

政府应该适当帮扶。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许多基层政府干部都有一种介入物业管理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是出于自发自动、自然而然的，而不是有目的、有预谋的。他们认为基层物业管理工作十分复杂，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十分多，而社会自治力量又十分薄弱，因此，政府应该发挥好社会治理的职能，适当地介入社区管理，帮助社区自治主体管好社区。而管好社区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基层政府的权力成立更多的指导中心、调解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其中 XH 区委副书记 ML 在物业管理深化改革动员会上谈到物业收费问题时就说：

“物业公司的收费标准？管理标准？涨价怎么涨？这里其实都要我们“条”的部门来牵



头，上次我和RY(XH区房管局领导)还讨论，业委会要考核吗？也要考核。业委会要审批吗？也要。现在有很多问题，就没有一个有公信力的东西站出来，业委会要监督吧！谁来监督？还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到底标准是什么？一元五的（服务）标准是什么？那老百姓不满意可以做解释工作，你为什么做不到人家四块五的（服务标准），因为你的物业管理费就是一块五，一块五的（服务）标准是这个啊！那么这个物业公司做到了没有，做到了，你不能乱提意见的！你要一块五的（服务）标准享受四块五的（服务标准），那么这个小区就永远要涨价啦！那这些东西谁来说话，一定要我们“条”里面专业部门站出来，所以我觉得现在房管局要成立一个物业管理指导中心。”（WYGL-20150916）

针对物业收费与定价问题，LY街道办事处的代表也在物业管理深化改革动员会上表达了其看法：

“成立LY物业管理综合中心，作为物业管理的‘专家门诊’，作为物业企业的市场定价机制的‘裁判员’，根据LY社区的实际情况，提供物业管理的合理定价，为物业企业的选聘提供透明、公开的市场指导价，为社区里的物业企业选聘定标准。”（WYGL-20150916）

一些专业学者虽然没有表示要成立相关机构来对物业管理进行规范，但其观点中也隐含着建立规范机构的必要性：

“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物业管理有一个行业协会，我们今天也来了物业管理的领导，但是业委会是没有对应的行业性质组织存在的，实际上我们从法律上讲，像居委会一样，上海不可能成立一个大的联合会。不搞也可以，但上海同时要面对几千个业委会，怎么办呢？”（KTBG-20150824）

虽然上述材料中列举的例子有限，但政府应该适当介入物业管理的思想相当普遍，这些想法不仅来自基层行政部门的政府领导，还来自基层行政执法的一线工作人员。由此可见，基层社会力量对政府的高度依赖性。

## （二）控制性认知期：物业管理深化改革调研

从物业管理改革深化的酝酿和启动阶段来看，基层政府干部、专业学者等主体的社会图式显示了一种较强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基层干部希望推动社会力量发展，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力量还很薄弱，无法有效承接基层政府转移的部分社会职能。因而，许多基层干部的潜意识中存在着“政府应该介入市场和社会”的观念。上一阶段是一个自动化认知阶段，而这一阶段则是控制性认知阶段，即基层干部将通过深入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和组织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来分析当前社区物业管理的现状，以弥补主观认知的不足，防止自动化认知的内隐偏见。

XH区房管局这次物业管理深化试点主要选取了6个街道12个小区作为典型进行调研。其选取的12个试点小区非常具有代表性，覆盖了各类型的小区，其中5个为商品房小区，2个为售后房（含公房）小区，5个为混合型小区。住宅总面积76.8万平方米，非居住物业6万平方米，除了一个小区实施自治管理外，其他小区均有物业服务企业覆盖。在此次调研之前，也即在物业管理深化试点工作动员会上，房管局对试点街道房办主任和试点小区居民党组织负责人进行了培训。此次调查和走访的主要内容包括小区房屋类型、居住情况、公用设施设备清单、物业管理收费、公共收益情况、物业管理人员配备情况、业委会情况、居委会情况、物业管理人员工资福利情况、小区主要矛盾和问题等。这次摸底调研的主要目的是充分掌握物业管理领域的具体情况，提出具有高效、有针对性、具体、可复制的实施方案。但这些调研和走访并没有改变房管局和基层政府干部的前期认知，反而加剧了其对前期认知的认可。从问卷调研结果来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物业服务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市场机制在解决社区问题中的绩效表现并不优良，首先从物业经营情况来看：

“2014年物业服务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2.29%，平均每家企业盈利水平约为3万元。从抽样调查的情况来看，12个试点小区中7

个项目亏损，3个项目盈利，2个项目持平，亏损率达到58.33%，亏损主要集中在售后房项目和混合型项目。”（《“物业管理深化试点工作”前期调研情况分析》）

从物业管理和服务工作人员的结构来看，不同房产类型和不同居住数量小区之间的差别较大（表2）。从整体上而言，保洁、保绿和维修工等人员的基本配备还是很薄弱。

“从试点小区抽样调查情况来看，一线从业人员年龄整体偏大，以40至60岁为主；薪酬水平整体偏低，月工资收入维持在最低工资标准2280左右的占58.73%，2500元至3000元的占27.95%，3000元以上的占13.32%。”（《“物业管理深化试点工作”前期调研情况分析》）

表2 物业服务企业人员配置基本情况

所属街道	小区名称	房屋属性	总户数	总建筑面积(m <sup>2</sup> )	管理人员	保安	保洁	保绿	维修工	其他人员
XJH	YLHYQ	商品房	472	54597	2	24	5	1	1	\
	YLHEQ	混合型	366	28755	1	12	\	1	0	\
	FYHJ	商品房	519	93266	6	17	7	1	3	1
FL	YGMY	商品房	587	81708	4	13	7	1	3	0
XT	RJNY	商品房	732	122528	5	33	11	外包	2	0
	HDXQ	售后房	360	19368	2	4	1	0	2	0
TL	JXY	混合型	1242	133895	9	20	10	2	2	1
	TLSEC	售后房	2067	94014	3	外包	外包	外包	外包	\
HM	YTGYYQ	商品房	203	25490	2	9	2	0	0	0
	QJDL	混合型	176	17607	1	4	1	0	0	0
LY	SXY	混合型	432	35698	2	6	2	0	0	1
	HLY	混合型	912	61441	2	9	2	外包	外包	2

数据来源：《XH区物业管理深化试点小区基本信息汇总表》

物业服务总体感知差，还来自调研主体在深入社区调研中的深刻感受，HX区房管局领导在总结这次调研工作中说：

“住宅小区中的矛盾纠纷其成因相当复杂，有物业服务质量的问题，也有业主自我管理的问题，有业主不文明居住引发的相邻矛盾，更有历史原因引发的深层次问题。这些矛盾涉及的主体多元复杂，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交错纷杂不易梳理，而且矛盾纠纷的解决结果往往会形成强烈的连锁反应。”（WYGL-20151027）

由上述材料可知，基层政府干部通过这次调研和走访，其对物业管理的认识更为深入和具体。也论证了他们之前认为基层物业管理错综复杂、矛盾丛生的观点。这些调研感知作为一种“客观信息”，输入基层干部的认知系统之中，进一步强化了之前的社会图

示。

2. 物业收费价格机制尚未理顺。从整个基层调研和座谈会内容来看，物业收费问题是物业管理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许多物业矛盾的衍生都是由于物业收费问题而引发的。从实践调研的结果来看，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在解决小区物业管理问题上表现力不从心。具体而言，从物业收费标准上而言，1996年上海制订了售后房物业服务标准，但十多年来劳动力、水电耗能、维修材料等物业成本不断上升，2012年起通过售后公房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分步到位的调整方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业经营亏损的情况，但这在商品房小区，情况则继续恶化。

“商品房部分物业由于要通过业主大会决议进行提价，业主不理解不支持，实际操作和实施较为困难，一直没有能够进行提价。从而出现了商品房的物业收费价格比售后房



低的“倒挂”现象。”（《“物业管理深化试点工作”前期调研情况分析》）

XJH 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表示，在商品房小区，业主对物业的不信任是物业收费标准提高的一个重要障碍。

“物业公司一直想来调整物业管理费，但这方面的压力比较大，主要来自业主。比如当时物价是一块六，后来要调整，调整后业主就上访，我们那时候是晚上值班，被两个业主抓出去点停车数量，说物业管理费在虚报，其实像类似的问题在我们商品房当中还是蛮多的。一旦物业公司要上调物业管理费，业主会以各种理由来阻止。”（WYGL-20151027）

他表示现在物业公司的财务也不透明，即使比较透明，也起不到实质性作用。

“现在公司也这样，他填一个表，收入多少，支出多少，然后物业亏损多少，但具体的、细化的都没有，不过我们审计也很难审出来，我们也有审计，但很难看出猫腻出在什么地方。”（WYGL-20151027）

FL 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表示，现在他所负责的小区在物业管理收费问题上已经陷入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了。

“小区业主对物业提价机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老百姓说，你要提价先提高水平，我看到的水平提高了的话，我就允许提价。物业公司说，现在价格上不去，人力资源也不够，成本也收不回来，我没办法提高这个质量。这就出现两者前后之间互相扯皮、互相不买账的问题。”（WYGL-20151027）

XT 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提出了一个现在物业管理中一个普遍存在且极其棘手的问题。

“主要的矛盾焦点就是关于物业管理费的标准问题，很多业主到居委会和房办来的时候，他们说，物业费他们不在乎掏多少，但服务一定要提高，那么具体说你服务提高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如保安、保洁、保绿、保修，比如说什么短板的地方，说得更明白一点，也可以提出更具体的要求，这个小区的业主对于这一点反倒比较模糊，就一个概念，

服务要再上去一点，至于说哪个短板要上去一点？没有！这就给我们工作造成麻烦，就是说有一个感觉做得不好，但是又提不出具体哪里不好。”（WYGL-20151027）

从上述材料来看，市场力量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明显力不从心，关键在于市场和市民谈判之前已经失去信任，而在重构与业主的信任过程中又能力不足，因而陷入社区管理的恶性循环。这些争论进一步强化了基层政府干部对基层市场力量的负面认知，认为市场力量在解决社会问题上能力不足。

3. 业委会自治能力十分有限。小区中社会力量薄弱似乎也成了这次调研的共识，业委会在选举换届过程中矛盾重重。不要说业委会作为社区矛盾的重要化解机制，其自身反而成为社区矛盾的“生产机器”。许多物业收费问题、公共空间使用问题、社区和谐问题等都是由业委会自身引发的。这些现象强化了基层政府干部对业主委员会能力不强的负面认知。

“在组建或者换届中，筹备组中的业主代表不符合规定条件，筹备组在工作中违反相关程序；业委会侵害业主利益，公益收益和维修资金使用不按程序和规定；业委会在实际工作中不规范、不透明；一些小区少部分业主与业委会成员之间、业委会成员内部之间、业委会与物业企业之间因见解不同或利益冲突产生矛盾，发展到积怨，导致互相拆台，影响物业管理的相关工作等等。”（《“物业管理深化试点工作”前期调研情况分析》）

XJH 街道办事处负责人也表示了此方面的隐忧。

“已经好几年没有业委会，业委会组建不起来，小区几方面的矛盾，业主和物业公司，业主和政府，这个矛盾错综复杂，也是亟需我们法律的思维来解决这些。”（WYGL-20151027）

上海市法工委负责人在此次调研总结会上也指出：

“‘三驾马车’六匹马，政府一架马车，市场一架马车，社会一架马车，每架马车都有

两匹马在拉，政府这架马车有房管局和街道乡镇的有关管理部门，市场这一块有物业管理公司和专业服务公司，社会也有两匹马，就是业委会和居委会。今天的介绍，就暴露出来了，这六匹马中有些是瘸腿的，有的是病马的，所以系统治理用到这里也是蛮恰当的。”（WYGL-20151027）

从上述材料来看，此次调研并没有发现以业委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解决基层物业管理问题上发挥着积极作用，相反，更多的调研信息显示业委会等社会自治力量还不成熟、不健全，其本身就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对象。通过此次调研，之前在基层干部中形成的社会图式得到进一步强化，而不是缓解。

### （三）表征印证期：物业深化改革的方案明晰与试点运行

实质上，上述两个阶段中“认知内卷化”已经形成，即基层政府干部作为社区物业管理改革创新的重要推动主体，其关于“物业管理问题十分复杂，而社会自治力量又十分薄弱，因此，政府适当帮扶十分必要”的思维模式已经在调研走访中得到强化，而从其解决手段来看，无非是加强领导和设立更多的机构来进行协调，这又陷入了之前基层政府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实质上并没有新的突破。在这一阶段，“认知内卷化”所引起的“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在下述材料中将得到印证。

1.“利益内卷化”。“利益内卷化”是指在以强化社会利益为目标的社会治理创新中，基层政府通过新的制度安排使部分组织和个人利益不断强化和内嵌于社会制度的过程。通过这几次调研和座谈会的讨论，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达成的共识越来越清晰，方案也越来越明确，那就是通过政府权力再生产成立更多的精细化的解决社区物业管理问题的协调机构。似乎这一共识与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是高度相融的。首先，街道办的态度是政府应该加强领导、积极介入。XJH 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在谈到解决物业管理费用问题时就提议：

“（政府）帮助物业和业主建立一个公平

的议价平台，在一个比较公平的平台上来达成一个物业管理的费用。”（WYGL-20151027）

LY 街道对此与 XJH 街道的提议在利益协调上也是一致的。

“市场意识不是很强，调费难度比较大。下一步计划，加强和房办一同对居委会和业委会的领导。”（WYGL-20151027）

XH 区社建办负责人从社建办自身角度也谈到了下一步应该采取的对策。

“从社建办角度来讲，业委会的建立和运作机制需要进一步规范，很多问题与业委会本身人员、建立过程中发生的矛盾是有关系的，因为其没建立好，导致我们后续的工作不能做，还有业委会主任这些核心人物怎样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管理），如居委会书记兼任，刚才我看到 12 个小区中几乎就没有（兼任的），这次市委文件里‘加强居民区建设’中就提到，要进一步探索居委会主任去兼任。第二就是文件中提到，在业委会把印章图章拿掉导致业委会无法运作时，居委会是可以接盘的，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大家也反映难度很高的，并不是像文件说的那么简单，因此，需要更多部门投入这一块。”（WYGL-20151027）

上海市司法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从我们司法局来讲，我们前期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居委会的调委会参与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参与大规模的物业费纠纷调解上可能力度是不够的，因为在居委会的调委会的成员很多他（就）住在这个小区里，他自身可能就有这个诉求，或者其自身就对物业服务不满意，那么物业也会对他们产生一些不信任，所以物业调节纠纷的这个平台还要放到街道这个层面，因为更加宏观一些，更加超脱一些，更加能够平衡双方的利益。”（WYGL-20151027）

BJYK 律师事务所的物业专业律师对未来物业深化改革的方向也表示些许期许：

“物业管理收费矛盾确实很突出，我们上个礼拜代表协会去了市高院一趟，物业管理



案件没有及时处理，他们也想和市物业管理协会搞一个调解机制，现在 PD 区已经有了，PD 区司法局已经和房联部门搞了一个调解机制了，也是司法局牵头的。因为现在法律诉讼程序太慢，不是法官偷懒，而是案子实在太多，我们去法院，说 5 名法官物业管理案子 1000 件，那这怎么处理？上海是 25 万案件，有 5 万是物业管理的案件，估计还有很多是不给受理的，所以这个只有通过调解机制来解决。”（WYGL-20151027）

从以上多个组织部门的利益视角来看，其都希望政府能够积极介入物业管理。实质上各个部门之间在讨论过程中都在不断强化各部门的利益，显然，政府积极介入，对街道办、社建办、法工委、司法局和律师事务所等都是有利的，因而，他们期望通过政府的改革举措将组织利益嵌合于制度结构之中。这种“利益内卷化”只是“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外在表现，而推动“利益内卷化”的更深层次因素则是“认知内卷化”，只有所有部门在认知上达成利益共识，“利益内卷化”才可能顺利地表现出来。

2.“组织内卷化”。“利益内卷化”则进一步推动了“组织内卷化”的发展，即在以强化社会自治为目标的社会治理创新中，基层政府通过组织结构的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来提供社会服务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其实在这次改革方案明晰之前，许多基层部门已经通过组建相关部门和机构来处理物业管理工作。如：

“TL 街道于 2011 年成立住宅小区综合管理工作联系会议办公室，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专职负责协调和处理辖区内物业管理综合事务和纠纷，指导和监督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组建和日常运作。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推动专业单位工作进小区，发挥党建联建作用等，切实强化小区综合管理合力。”（WYGL-20150916）

类似于 TL 街道这样的组织机构在其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屡见不鲜，这一次 XH 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方案中也有类似举措：

“结合物业深化试点和物业纠纷人民调解

实际工作需要，在全区构建‘1+13+3+X’的物业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网络，‘1’是指区级层面的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及办公室，‘13’是指设在各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3’是指三家社会化中介组织设立的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X’是指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大型社区、商务楼宇设立的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物业管理深化试点工作”下一步推进安排设想》）

从上述材料来看，XH 区这次物业管理深化改革实质上是对政府介入市场和社会的机制进一步精细化和复杂化，试图通过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来化解基层社会矛盾，陷入了之前深化改革的老路。从整个材料来看“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只是“认知内卷化”的外在表现而已，“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实质上在基层政府干部的社会认知和社会图式形成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因此，从“内卷化”形成的整个链条来看，“认知内卷化”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形成的更重要的、更深层次的中介影响因素。

#### 四、结语和讨论

从已有研究成果和案例分析可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类型基本上可以归为三类，即“利益内卷化”、“组织内卷化”和“认知内卷化”。在现有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他类型，但这些类型基本可以纳入该三种类型之中。如“公共服务内卷化”<sup>[25]</sup>实际上是“组织内卷化”的延伸表现，因为组织复制和精细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供给过程。这三种“内卷化”在因果机制上并不是并列的，“认知内卷化”在发生机制上应该先于“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利益内卷化”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组织内卷化”，“组织内卷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利益内卷化”。

三种类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差异较大（见表 3）。从外在表现上而言，“组织内卷化”最为明显，容易观察；“利益内卷化”有一定的隐蔽性，但外在表现也较为明显；“认知内卷化”则表现不明显，难以通过直接观察获知。从外在表征上而言，“组织内卷化”主要表现为组织结构的复制和精细化，“利益内卷化”则表现为各种势力和利益之间

的联合和嵌入，“认知内卷化”则表现为刻板效应，即用已有的知识结构去评判事物的心理倾向。从理论机理和实质支配上而言，“组织内卷化”类似于“帕金森定律”，即人的权力欲望推动机构数量的不断增长和公共事务的不断增加；“利益内卷化”类似于“寻租”理论，即通过关系网络来影响制度安排和资源分配；“认知内卷化”则类似于“自证预言”，即通过

信息输入来印证预期目标。从主客观性上而言，“组织内卷化”和“利益内卷化”具有客观性，而“认知内卷化”具有主观性。从链条位置上而言，“组织内卷化”处于终端，“利益内卷化”处于中间或终端的位置，“认知内卷化”则处于中间位置。三种类型的“内卷化”都表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在关键领域没有实质性突破。

表3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几种类型

	“利益内卷化”	“组织内卷化”	“认知内卷化”
外在表现	较明显	明显	不明显
外在表征	利益联盟	组织复制和精细化	刻板效应
理论机理	“寻租”理论	“帕金森定律”	“自证预言”
实质支配	关系	权力	图式
主客观性	客观	客观	主观
链条位置	中间或终端	终端	中间

注：作者自制。

“认知内卷化”的实现实质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自动化认知期、控制性认知期和表征印证期。从上海市 XH 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案例可知，自动化认知期内，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对基层社会治理内容的认知是一种无意识、自动化、无目的、无意图、不自觉地、自然而然的认知过程，即利用已有的社会图式或知识结构来认知基层社会治理内容，这一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形成的认知逻辑是“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很复杂，而社会力量又很薄弱，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给予帮扶”。在控制性认知期内，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利用调研和走访获得的信息输入，来检视已有的社会图式，其最初目的是为了纠正已有社会图式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但调查结果并没有反转之前的社会图式，反而加深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对之前社会图式的认同。即，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得到更深的强化。在这一阶段，“认知内卷化”实质已经形成，因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思维定式已经形成，其思维发展只是为了寻求可供证明的已有知识结构合法性的重复性增长，在解决社会基层问题上没有可替代的具有突破性的新思维。正是这种“认知内卷化”的不断发展，推动了表征印证期内“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的发展。

该个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即集中体现

了某一类别的现象的重要特征<sup>[26]</sup>。本文中所采用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出现的一类困境，即，许多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都是对基层政府组织的复制和精细化，通过治理改革新成立一整套系统的组织结构来提供公共服务，加强政府的社会治理。同时，基层政府部门与地方利益之间通过改革等手段进行制度重塑，使地方势力与基层政府利益深度嵌入，形成“利益联盟”。这些现象所生产的内容是“权力”和“关系”，即权力不断蔓延和下沉，关系不断深化和巩固，最终形成“结块”，想要打破“结块”再恢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弹性”非常困难。目前许多人从宏观社会资本、微观理性个体等客观角度去寻找原因，而本文通过实证观察，发现人的知识结构和社会图式等主观行为层面的“认知内卷化”实际上支配着“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这在现实案例中是大量存在的。如基层政府大力推行的网格化管理实质上就是一种“认知内卷化”，即认为社会管理只有“无缝隙”才能做到管理“无死角”，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确保社会安全，再加之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的要求，多个条线部门在认知上达成共识，利益不断相互嵌入，而这种社会图式却导致了行政权力过分下沉、网格化刚性过强的负面后果。

本文中所强调的政府介入都不是基层政府有意图地、有目的地介入社会和市场，而是出于一种无意识、无目的、自然而然地介入，是出于对社会和市场的帮扶，因此，本文将基层政府的这种行为定义为“帮扶式干预”，而这种行为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的。一方面，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确比较薄弱，市场无法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即使是通过外包、转包等手段，社会力量也无法很好地实现自治；另一方面，政府出于上级政府的压力，承担压力体制结构中的配额任务，而从社会成本的角度而言，这些社会治理的任务能“甩掉”则应“甩掉”，但在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和问责制度下，基层政府部门会“心理着急”，不自觉地去介入市场和社会，对其进行“帮扶”。但政府力量越介入，市场和社会对基层政府的依赖性也越强，最后导致政府无法松手，只能通过更为精细化的手段来进一步实现对市场和社会力量的扶持。正是在这一逻辑支配下，市场和社会越扶越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自主性。“帮扶式干预”实质上是一种不自觉的干预，是行政力量不自觉的扩展过程。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已经严重影

响到某些社会领域改革，如政府购买服务、网格化治理、农民工教育等，这种形式如果继续存在，可能使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国家力量不断下沉，同时社会治理体系的刚性也越来越强，代表国家利益的各个条线部门之间的利益嵌入也会更加深化，最终将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本文强调从主观视角来分析“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存在的原因，并认为“认知内卷化”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影响变量。从该角度出发，克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手段也应该从创新主体的主

观认识上着手。应该明确不同场域下政府与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公共服务提供场域中，政府与社会和市场之间应该是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即使

社会力量很薄弱，政府也不应该通过直接干预来扶持社会力量，而应该通过间接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调整来改善社会力量发展的整体环境，从而从整体上来带动社会力量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分散的、多元的、断续的政府帮扶来实现社会力量的暂时性发展，这种“帮扶式干预”具有明显的短期绩效和行政推动的色彩，不仅难以形成合力，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而且也不具有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



#### 参考文献:

- [1] 康晓光, 韩恒. 分类控制: 当代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5, (6): 73-89.
- [2] Kang Xiaoguang, Hang Heng.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Society: A Further Probe into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Mainland[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7, (summer): 116-128.
- [3] 刘鹏. 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 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1, (5): 91-99.
- [4] 孙柏瑛, 于扬铭. 网格化管理模式再审视[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 (4): 65-71.
- [5] 彭勃. 从行政逻辑到治理逻辑: 城市社会治理的“逆行政化”改革[J]. 社会科学. 2015, (5): 18-26.
- [6] 刘世定, 邱泽奇. “内卷化”概念辨析[J]. 社会学研究. 2004, (5): 96-110.
- [7] 郭继强. “内卷化”概念新理解[J]. 社会学研究. 2007, (3): 194-208.

- [8] Prasenjit Duara.State Involution: 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 1911-1935[J].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1987,(1):132-161.
- [9] 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 K 镇调查为例[J].开放时代.2011,(2):86-101.
- [10] 李祖佩.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J].青年研究.2011,(3):55-67.
- [11] 耿羽.灰黑势力与乡村治理内卷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71-77.
- [12] 陈锋.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J].社会.2015,(3):95-120.
- [13] 马良灿.“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治理[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98-103.
- [14] 樊红敏.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卷化及其制度逻辑——基于对河南省 A 县和 B 市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11,(6):12-21.
- [15] 贺东航.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内卷化”现象的思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6):100-105.
- [16] 陈宁.国家-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区建设:走向内卷化的权力秩序——基于对长春市 J 社区的研究[J].兰州学刊.2010,(7):109-113.
- [17] 何艳玲, 蔡禾.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04-109.
- [18] 张付强.我国社区自治改革的内卷化分析——一种空间模型的视角[J].公共管理学报.2009,(3):77-83.
- [19] 王婷.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内卷化分析[J].学海.2010,(4):213-216.
- [20] 叶鹏飞.探索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之路——基于社会交往“内卷化”的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2,(1):81-85.
- [21] 陈振明 主编.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214-216.
- [22] 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221-229.
- [23] [美]Elliot Aronson, Timothy D.Wilson, Robin M.Akert.社会心理学(第五版)[M].侯玉波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47-75.
- [24] [英]戴维 迈尔斯.社会心理学(第八版)[M].侯玉波, 乐国安, 张智勇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262-270.
- [25] 李春霞, 巩在暖, 吴长青.体制嵌入、组织回应与公共服务的内卷化——对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2,(12):130-132.
- [26] 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 ——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J].社会学研究.2002,(5):123-125.

### "Cognitive Involution" and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Property Management Deepening Reform in XH District of Shangha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Involu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s "interests Involu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which is, in essence, dominated by "cognitive Involution". "Cognitive Involution" stresses that innovators strengthen a thinking based on certain social schema, which leads to more strengthen of the negative side of the thinking and no real breakthrough in th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This paper take property management deepening reform in XH District of Shanghai as the example, using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s to analyses the behavior and discourse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ors, and find that the social schema of the innovators in the period of Automatic Cogniti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help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social schema is further strengthened by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nd visit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following controlling cognition period. Finally, "interests Involu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confirm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gnitive Involution" i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Key words:** "interests Involution"; "organizational Involution"; "cognitive Involution";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郭俊华<sup>1</sup> 孙泽雨<sup>2</sup>

**摘要:** 本文根据当前科技创新活动的发展状况,从五个不同维度构建起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选取2013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作为样本,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各省市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后,得出各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排名。发现中国区域间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因素对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拉动作用不同,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因子分析法

## 一、引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也提出要“把握科技发展的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高等学校作为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在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科技创新活动包括了科学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人才创新等多方面,是多要素相互作用、协同互动的结果。评价和分析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是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为此,本文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入手,通过对2013年全国31个省份的高校科技创新指标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对我国目前高校创新能力进行评析。

## 二、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研究现状

当前,国外关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偏重于实证研究,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



内涵等理论性的研究较少。国外学者运用数理方法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研究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产出效率和技术

转让效率方面。Jerry G.Thursby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高校的科技创新成果的影响因素,归纳出科研水平和校企合作程度两个主要影响变量<sup>[1]</sup>。Yukio Miyata对科研管理能力的效率评价所做的研究,对于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也有所启示<sup>[2]</sup>。Chiang Kao则选用特定时期的截面数据计算高校科技创新的效率值进行研究<sup>[3]</sup>。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开始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研究成果日趋丰富。学者们提出诸多关于高校创新能力的概念,如科技创新能力、知识创新能力、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服务创新能力和人才创新能力等<sup>[4]</sup>。

**基金项目:**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与改进策略研究》(第43批);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上海全球城市创新系统与创业生态环境研究》(2014-A-52-B);上海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上海市科技人才项目跟踪管理机制研究》(14692108900);上海市中国工程院院士咨询与学术活动中心委托项目《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与评价模型研究》(ZX-2014-4)。

**作者简介:** 1. 郭俊华(1972—),女,湖南益阳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创新管理、公共部门绩效管理。  
2. 孙泽雨(1991—),男,江苏南通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创新管理、科技政策评估。

目前关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涵义、创新过程以及如何提高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张茂林(2011)等通过分析高校科技创新团队与科技创新能力之间的联系，提出发展高校科技创新团队、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议<sup>[5]</sup>。梁翠(2014)等从协同创新视角的视角研究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对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给予了新的解释，并以河北省为例，提出了促进河北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协同发展的举措<sup>[6]</sup>。二是研究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不同的学者基于自身的研究目的构建起不同的评价指标。孙燕(2011)等研究了知识创新能力和解决社会生产实际问题中的技术创新能力，建立起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sup>[7]</sup>。杜俊慧(2013)选用14个指标构建起山西高校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sup>[8]</sup>。三是研究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方法。曲泽静(2011)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进行评价<sup>[9]</sup>。巴吾尔江(2012)等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高校和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研究<sup>[10]</sup>。王守文(2015)等则利用因子分析法研究湖北省公共科技服务能力评估体系，探讨湖北省各区市的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状况<sup>[11][12][13][14][15]</sup>。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关于高校创新能力的研究既有从理论层面探讨创新能力的内涵、创新过程以及如何提高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也有从实证层面研究创新能力。但是，现有研究中也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关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内涵界定不清晰。既有基于过程理论进行的定义，也有从知识、技术、科研等方面进行的界定，对于高校创新能力的内涵没有达成的共识，缺乏整体意识和框架意识。二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选取不甚合理。评价指标的选取关系着评价体系的建立，一些学者在分解指标时没有全面体现创新能力的不同侧面，在评价维度上有所欠缺。三是在利用评价体系进行得分排序时的方法选择有待改进，一些学者利用主观法对评价指标赋予权重，这种方法形成的评价体系往往有着较强的主观性，在评价高校创新能力时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四是对于高校创新能力的分析不够深入，政策建议不够到位。一些学者对于不同地区高校创新能

力的状况没有进行深入分析，相应的政策建议也往往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协同创新的框架体系下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界定和阐释，从五个维度构建起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并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宏观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对目前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研究，并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 三、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构建

#### (一) 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涵义

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是高校依靠广大科研工作者，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平台，从事创造性活动，将资源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的能力。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主要体现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两个层面。自主创新是高校利用自身的教学科研平台、自身所拥有的科研人员力量等进行的创新活动；合作创新则是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企业之间、境内高校与境内外高校间的合作创新。高校创新能力的內容主要表现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学科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等方面，同时高校创新能力也体现在创新投入能力、创新支持能力、创新合作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转化能力等环节。

在创新过程中贯彻始终的则是协同创新，协同创新是整体框架和总体要求。协同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求高校科技工作者、研究人员、研究生之间相互配合，在专业优势和知识更新上实现良好互动，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科研创新共同体，实现创新人才协同；二是要求高等学校内部协同人力、物力、财力，整合现有资源和创新平台，实现创新资源协同；三是要求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之间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的竞争优势，确保高校科研院所为企业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实现创新主体协同；四是要求科技创新政策符合创新需求，科研考核机制符合创新规律，知识产权保护符合创新动力，科研成果转化符合创新目的，形成尊重创造、倡导创新、努力创优的良好局面，实现创新系统协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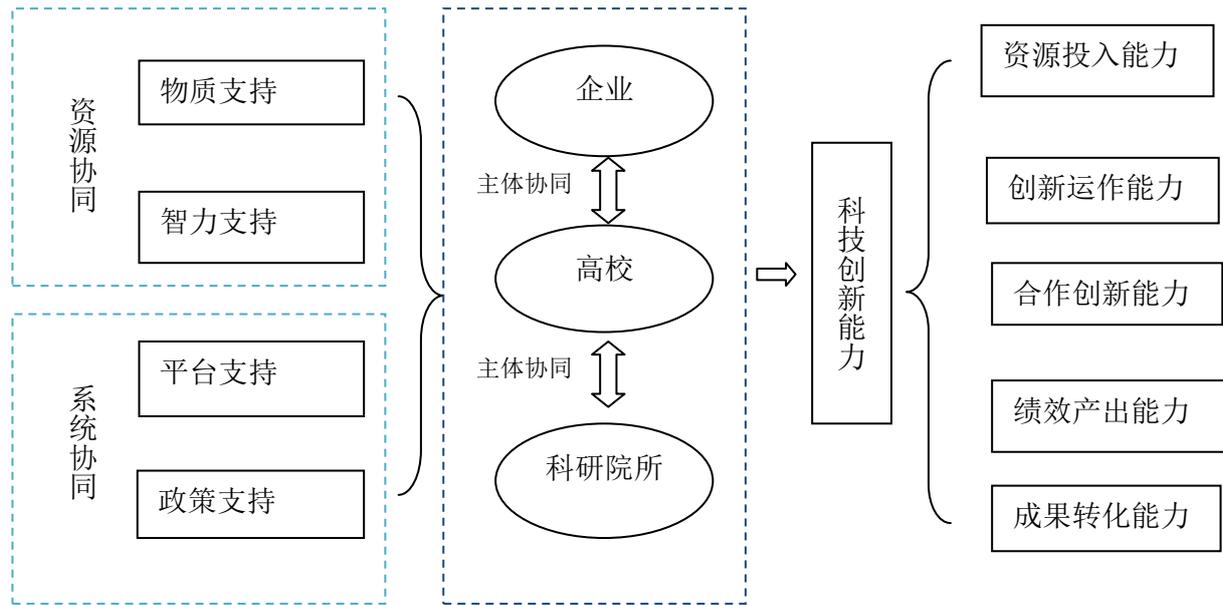


图 1: 协同创新框架下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示意图  
**Figure 1: S&T Innovation Capacity of Universities in the framework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二) 指标选取

衡量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构建，而评价体系又依赖于评价指标的选取。因此，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也就成了构建高校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基础性、关键性、核心性工作。

本文基于科学性、合理性、系统性的原则，根据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特点和过程，围绕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这个一级指标，分解

出 5 个二级指标和 15 个三级指标。并将三级指标编码为 C1—C15，便于后续工作的进行。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二级指标分别从资源投入能力、创新运作能力、国际合作创新能力、绩效产出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等五个维度对创新能力进行衡量。这五个维度的分解是基于高校科技创新的过程而进行的，因而能够从过程管理角度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评价。

表 1: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of S&T Innovation Ability**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变量编码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资源投入能力	高等学校科技经费拨入总额(千元)	C1
		高等学校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总额(千元)	C2
		R&D 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人(人)	C3
	创新运作能力	高等学校研究与发展机构数(所)	C4
		高等学校研究与发展项目数量(项)	C5
		研究与发展人员数中高级职称人数(人)	C6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国际合作创新能力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研究派遣人数(人)	C7
		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篇)	C8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次数（次）	C9
绩效产出能力		专利授权数（项）	C10
		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C11
		国家级三大奖数量（项）	C12
成果转化能力		专利出售合同数（项）	C13
		当年技术转让实际收入（千元）	C14
		国家级项目验收数量（项）	C15

### （三）指标含义

1.资源投入能力。资源投入能力体现的是高校在科技创新活动中能够调动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包括创新活动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高校每年的科研经费拨入总额是衡量高校科技创新资源投入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将其纳入评价体系之内。此外，高校的 R&D 经费支出总额则体现了高校在利用经费方面的倾向性，因此也有必要将其纳入指标体系中。在创新活动中的科技人员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它体现了高校为提升创新能力而投入的人力资本。

2.创新运作能力。在创新过程中，创新平台和创新支持力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创新运作能力就是衡量创新过程中高校提供的平台能力。此项指标选取了 R&D 研究所数量、研究项目数量以及中高级职称人员数量作为三级指标。在高校创新过程中，R&D 研究所及项目数是高校创新的基础平台，发挥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而拥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在创新活动中则起到了主体性的作用，是整个创新运作的核心力量。

3.国际合作创新能力。创新不是闭门造车，不能孤立地进行，而是应当与其他单位、人员相互交流合作。合作创新是协同创新的题中之义，也是现代高校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国际合作创新能力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以国际交流的人员数量、举办的国际创新交流会数量以及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衡量国际合作创新能力的三级指标。

4.绩效产出能力。科技产出是科技创新活动的成果输出，本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代表性论文发表数、获得的专利授权数以

及国家三大奖的获得数量等三级指标作为绩效产出能力的衡量标准，尽管这三项指标不能全面地衡量出高校的科技产出水平，但是在总体上是还是能够代表高校的绩效产出能力。

5.成果转化能力。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终端和目的，科技创新活动能不能为社会带来价值，能不能为技术带来突破，关键在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因此成果转化能力是衡量科技创新能力不可缺少的维度。本文从国家级项目验收数量、出售专利的合同数以及当年技术转让实际收入等三个子指标来对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进行评价。

## 四、实证研究

###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2013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选取 2013 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高等教育创新能力指标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缺失数据以“0”代替。本文利用 SPSS19.0 软件对上述样本数据进行处理。

### （二）统计分析

#### 1. KMO 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结果

进行因子分析时，需要进行 KMO 检验。KMO 检验一般用于考察变量间的相关性，取值在 0~1 之间。KMO 越接近于 1，说明变量间的偏相关性越强，因子分析效果越好。一般来说，KMO 统计量在 0.7 以上，即可认为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本文样本数据分析结果见表 2，结果显示，KMO 检验值为 0.808 表明因子分析的效果很好。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Table2: KMO and Bartlett's Test**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808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787.407
	df	105
	Sig.	.000

2. 方差贡献分析

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的主成分进行提取，得到如表 3 所示的总方差表。

表中显示了各因子所对应的初试特征值、累计贡献率以及通过旋转后的累积贡献率。

**表 3: 特征值及其累计贡献率**  
**Table3: Eigen Values and Cumu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0.918	72.788	72.788	10.918	72.788	72.788	8.069	53.796	53.796
	1.873	12.485	85.273	1.873	12.485	85.273	4.721	31.477	85.273
	.625	4.168	89.441						
	.381	2.539	91.980						
	.354	2.359	94.340						
	.273	1.819	96.159						
	.189	1.261	97.420						
	.132	.878	98.298						
	.107	.712	99.010						
0	.059	.390	99.400						
1	.036	.237	99.637						
2	.027	.178	99.815						
3	.016	.107	99.922						
4	.011	.074	99.996						
5	.001	.004	100.000						

一般来说，如果指标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 85%，即可以认为这些主成分包含了全部测量指标的信息。本样本中前两个成分的初始特征值分别为 10.918 和 1.873，均大于 1，且累积贡献率达到了 85.273%，所以本文提取这两个成分作为第一主成分（F1）和第二

主成分（F2）作为新的综合指标对高校创新能力评价。

3. 因子荷载矩阵和得分矩阵

通过 SPSS19.0 统计分析软件，对因子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得出因子荷载矩阵（见表 4）以及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 5）。

表 4: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Table4: Rotated Factor Loading Matrix

编码	指标	成分	
		F1	F2
C1	高等学校科技经费拨入总额(千元)	.922	.339
C2	高等学校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总额(千元)	.905	.381
C3	R&D 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人员(人)	.183	.948
C4	高等学校研究与发展机构数量(所)	.674	.566
C5	高等学校研究与发展项目数量(项)	.860	.436
C6	研究与发展人员高级职称人数(人)	.340	.787
C7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研究派遣人数(人)	.814	.380
C8	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篇)	.915	.342
C9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次数(次)	.840	.329
C10	专利授权数(项)	.606	.681
C11	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794	.559
C12	国家级三大奖数量(项)	.590	.696
C13	专利出售合同数(项)	.075	.884
C14	当年技术转让实际收入(千元)	.850	.140
C15	国家级项目验收数量(项)	.880	-.007

由表 4 可以看出, 第一主成分 F1 在 C1、C2 上有较大的载荷, 表明 F1 主要是从高等学校科技经费拨入总额、高等学校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总额等方面影响高校创新能力, 可称之为投入因子; 第二主成分在 C3、C13 上有较大的载荷, 表明该因子是从 R&D 成

果应用及科技服务人员、专利出售合同数等方面影响高校创新能力的, 可视为产出因子。

根据 SPSS19.0 的统计结果, 可以得出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如表 5。

表 5: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Table5: Score Coefficient Matrix of Factor

编码	指标	成分	
		F1	F2
C1	高等学校科技经费拨入总额(千元)	.143	-.056
C2	高等学校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总额(千元)	.131	-.036
C3	R&D 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人员(人)	-.152	.336
C4	高等学校研究与发展机构数量(所)	.039	.085
C5	高等学校研究与发展项目数量(项)	.109	-.005
C6	研究与发展人员高级职称人数(人)	-.083	.241
C7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研究派遣人数(人)	.110	-.017
C8	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篇)	.141	-.053
C9	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次数(次)	.127	-.043



C10	专利授权数 (项)	.000	.144
C11	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068	.058
C12	国家级三大奖数量 (项)	-.007	.153
C13	专利出售合同数(项)	-.164	.334
C14	当年技术转让实际收入 (千元)	.168	-.119
C15	国家级项目验收数量 (项)	.205	-.183

根据上述表格数据以及原始数据, 可以写出因子得分函数。因子得分函数, 即将公因子表达为各个变量的线性形式。记 F1 主成分系数为 $\alpha_i$ , 其中  $i=1-15$ ; 记 F2 主成分系数为 $\beta_j$ , 其中  $j=1-15$ , Z 表示将变量标准化; 例如,  $\alpha_1 = 0.143$ ,  $\beta_7 = -0.017$ ; 则各主成分得分表达式为:

$$F1 = \sum_{i=1}^{15} \alpha_i * Z C_i$$

$$F2 = \sum_{j=1}^{15} \beta_j * Z C_j$$

由于 F1、F2 这两个公因子是从不同的侧

面反映高校创新能力的, 因此单独使用任何一个因子得分进行排名都难以做到综合评价。本文以各公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 (记为 R) 比例作为权数, 利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Score = R_1 * F1 + R_2 * F2$$

其中, 第一公因子 F1 的方差贡献率  $R_1=53.796/85.273$ , 第二公因子 F2 的方差贡献率  $R_2=31.477/85.273$ 。根据上述公式及数据, 可以人工计算出因子得分并进行总排名。

#### 4. 综合得分及总排名

本文利用 SPSS19.0 软件中“得分”功能, 自动计算出因子总得分, 并据此给出了基于本指标的总排名, 见表 6。

表 6: 综合得分排名表  
Table 6: Composite Score Ranking

省份	F1	F2	总得分	总排名
北京市	4.24186	-1.18996	2.24	1
江苏省	.36652	4.26990	1.81	2
上海市	1.93972	-.06239	1.2	3
广东省	.37013	.76102	0.51	4
辽宁省	.32978	.82331	0.51	4
山东省	.19412	.80904	0.42	6
四川省	.60645	.06560	0.41	7
浙江省	.21906	.67984	0.39	8
湖北省	.72806	-.22069	0.38	9
湖南省	-.02365	.74498	0.26	10
黑龙江省	.81699	-.74872	0.24	11
陕西省	-.06039	.73194	0.23	12
安徽省	.14865	-.07912	0.06	13
天津市	-.06692	-.25052	-0.13	14
吉林省	-.05314	-.45079	-0.2	15
河南省	-.42688	.16402	-0.21	16
河北省	-.68316	.52164	-0.24	17
重庆市	-.36683	-.06773	-0.26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	-.86014	.62475	-0.31	19

福建省	-.50052	-.12446	-0.36	20
江西省	-.65675	-.00258	-0.42	21
云南省	-.50431	-.40199	-0.47	22
山西省	-.72752	-.34477	-0.59	23
甘肃省	-.52375	-.71830	-0.6	24
内蒙古自治区	-.64031	-.62228	-0.63	25
贵州省	-.64217	-.61940	-0.63	2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3277	-.71462	-0.66	27
海南省	-.55451	-.97842	-0.71	28
宁夏回族自治区	-.67102	-.85833	-0.74	29
青海省	-.65171	-.89240	-0.74	39
西藏自治区	-.71487	-.84855	-0.76	31

### （三）结果分析

通过对全国 31 个省份样本数据的处理，利用 SPSS19.0 软件得出上述统计结果，从上述表格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结论：

1. 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呈现明显的地区倾向。

排名靠前的省份如上海、江苏、广东等均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基础雄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集中、科技工作者数量众多，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的智力支持。东部地区是经济发展高地、人才创新高地，而实证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跻身中间段的省份如安徽、河北、山西等为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基础相比于东部地区来说显得较弱，在支持科技创新发展、吸引科技创新人才方面还有待加强，因此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也有进步空间；而如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边远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则比较落后，一方面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条件不利于经济发展，而薄弱的经济基础也难以支撑地区的高校科技创新发展；另一方面，西部地区难以吸引到优秀的科技人才，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也比较低。

2.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拉动因素各异，不同因子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不同。分析表 6 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全国的省份大致可以归为四类：

（1）F1 为正，F2 也为正，典型的如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等。江苏省 F1 值为

0.36652，F2 值为 4.26990，这说明江苏省的综合得分中投入和产出这两个因子表现均不错。同时可以发现 F2 的值显著大于 F1 的值，说明第二个公因子对江苏省排名起到了显著的拉动作用。这说明，无论是高等学校的经费拨入、科研人员配备还是在创新产出方面，江苏省表现都很好，而在科技产出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方面更加突出。这与人们对于江苏省作为教育强省、科技大省、创新高地的形象相一致。与此类似，浙江、广东等省份在这两个因子上表现也很好，表明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些省份创新能力的提升。

（2）F1 为正，F2 为负，如北京市、上海市等。北京市虽然总得分排名位列第一，但是其 F1 值为 4.24186，F2 值为-1.18996，说明北京市的排名主要是在依靠第一个因子起作用，即北京市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排名高，主要是由于科研创新经费的投入等因素的拉动，而科技产出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并没有很好地提升其排名。

（3）F1 为负，F2 为正，如河南、河北等综合排名居中的省份。虽然 F1、F2 一正一负，但是它们的值却非常接近，可以认为，这两个因子对于拉高排名或者拉低排名均没有显著影响。

（4）F1 为负，F2 为负。这一类型主要集中在综合得分排名表的末端，如宁夏、贵州等省份，表明无论是投入因子还是产出因子，它们对于该地区的排名起到的均是拉低作用。



## 五.政策启示

本文构建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提供了思路,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制定促进创新发展的政策提供了依据。研究表明,各地区高校间科技创新能力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和不平衡,创新拉动因素也不尽相同,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完善高校科技创新经费管理体制。**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实证研究表明,教育经费的投入量对于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教育经费是保障高校科技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没有相应的教育经费作保障,高校的科研创新活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也很难得到提高。因此,政府部门要继续大力增加高等教育科研经费投入,为高校科技创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校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促进区域间科技创新能力协调发展。**实证研究表明,中西部地区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与东部地区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中西部地区面临着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基础薄弱、人才资源稀缺等诸多发展“瓶颈”问题。提升中西部地区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关系着国家整体创新水平能否得到有效提升。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设立地方高等教育专项资金,扶持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逐步缩小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区域间差别,实现区域间创新协调发展。

**(三) 重视个体差异,尊重创新规律,走特色创新之路。**研究表明,不同地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拉动因素不同。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了解高校科技创新政策需求,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创新资源丰富、创新能力强大、创新效益良好的高校和地区要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打造科技创新的“示范区”、“排头兵”。对于科技创新能力较低

的高校和地区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做到“对症下药”,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

**(四) 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是高校科技创新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如何使用科研经费关系到教育支出目的能否实现,关系到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能否提高,关系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落实。因此,要确保科研经费的使用用途,优化科研经费的使用结构。同时要加强科研经费管理问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依法追究违规使用经费的行为,努力把科研经费用到实处。

**(五) 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的生力军作用,完善合作创新体制。**高等学校在科技创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高等学校良好的科研环境、一流的科研平台、顶尖的科研团队,为高等院校在科技创新中奠定了坚实的生力军地位。高校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不断加强与产业、区域的合作,形成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加强与港澳台地区、国际间机构的交流与互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科技合作创新体系,实现协同创新,不断提升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

## 六. 结语

本文从5个不同的维度对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建立了包含15个三级指标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与主观赋权法偏重于人为赋权不同,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这些指标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评价了我国不同地区的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状况,并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性建议,旨在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提高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当然,限于主客观原因,本文不足之处主要是选取的均为量化性质的指标,没有考虑到定性指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改进。

## 参考文献

- [1] Jerry G. Thursby, Sukanya Kemp, Growth and productive efficiency of univers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licensing [J]. Research Policy, 2002, (31): 109-124.
- [2] Yukio Miyata,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novative activity of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Technovation, 2000, (20): 413-425.
- [3] Chiang Kao, Hsi-Tai Hung, Efficiency analysis of university departments: An empirical study[J]. Omega, 2008, (36):653-664
- [4] 廖文秋, 石彪等. 高校创新能力研究述评[J]. 中国科技论坛, 2009,(6): 26.
- [5] 张茂林, 董泽芳. 高校科技创新团队数量与科技创新能力关系实证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4) :151—155.
- [6] 梁翠, 王智新. 协同创新视角下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14, (1): 23—26
- [7] 孙燕, 杨健安, 潘鹏飞, 孙敏. 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1, (3) :125—129.
- [8] 杜俊慧, 王文寅, 苏贵影.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山西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J]. 经济问题, 2013, (7): 111—114.
- [9] 曲泽静, 史安娜.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评价——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16): 109—112.
- [10] 巴吾尔江, 董彦斌, 孙慧, 张其.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 (12): 26—30.
- [11] 王守文, 颜鹏.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湖北省公共科技服务能力评估体系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5, (2) :59—61
- [12] 李双成, 柴亮, 张宏伟. 河北省区域创新能力分析与评价[J]. 经济与管理, 2009, (12): 58—61.
- [13] 周玉敏, 邓维斌. SPSS16.0 与统计分析[J].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299—319.
- [14] 张文彤, 董伟. SPSS 统计分析高级教程 (第 2 版) [J].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214—230.
- [15] 刘勇, 应洪斌, 蒋芬君. 中国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基于华东地区高校的实证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4, (10) : 113—119.

### Evaluation of S&T Innovation Capacity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GuoJunhua      Sun Zeyu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innovation 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were rebuilt. This article selects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as samples, using factor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S&T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univers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regional S&T innovation and different factors have different effect on S&T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 S&T Innovation Capacity; Evaluation system; Factor analysis



# 中国 PM2.5 治理困局及对策研究\*

## ——基于环境规制理论视角的分析

吕守军 沈星迟 张晓敏

**摘要:**近年来,中国严重的PM2.5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巨大的压力下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与政策,但收效并不明显,难以满足公众对于治理雾霾的迫切需求。PM2.5治理问题具体表现为环境执法乏力。本文试图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分析这一治理困局的原因。首先,本文参照佩尔兹曼基本模型构建起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模型,推导出最优环境规制供给量的表达式,进而给出了中国PM2.5治理困局原因的理论解释。其次,本文采用了2010年-2013年中国各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基本验证了PM2.5治理困局产生的主要原因,其可概括为:地方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点偏离制度安排所追求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最后,针对此原因提出了治理对策。

**关键词:**PM2.5, 环境规制, 废气规制强度

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但许多社会问题亦随之而来。PM2.5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其造成的巨大公众健康损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面对巨大的压力,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与政策,但收效并不明显,难以满足公众对于治理雾霾的迫切需求。2014年发生的“APEC蓝”事件让公众似乎看到了治理雾霾的希望,政府通过强力的举措换来了短暂的蓝天白云,但特殊时期一过,雾霾依旧挥之不去。由此表明,在非特殊时期政府对治理雾霾存在容忍现象,具体表现为环境执法乏力。治理雾霾,牵涉利益主体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作为规制的主导者亦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为何会出现如此的治理困局,本文将基于环境规制理论视角对此做出理论解答与实证检验,并提出治理对策。

### 一、环境规制与PM2.5治理

环境规制理论在解决环境问题中已有了诸多有益实践,这为中国PM2.5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思路。治理PM2.5,政府需发挥作为规制者的主导作用,协同社会各方力量,共同谋求社会治理的均衡点。因此,以环境规制理论作为基石研究这些问题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综观国内外对环境规制的研究,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丰富,而国内则在近

几年才逐步开始成为研究热点。研究最多的议题是环境规制对产业经济的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将会提高企业的治污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竞争力。但在1991年哈佛大学教授波特(Porter)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说”,打破了这一传统观点。波特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被规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产生效率收益”<sup>[1]</sup>。在这之后,许多学者围绕“波特假说”展开了大量的研究,有通过研究赞成假说的,亦有许多对假说提出质疑的。但梳理众多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即在短期内,环境规制的提高势必会提升企业的成本,从而降低企业利润,不利于经济增长。其次,PM2.5治理作为环境规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却鲜有学者从环境规制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过研究。通过梳理有关PM2.5的文献可以发现,现阶段国内外有关PM2.5的研究大多集中在PM2.5的成分组成分析、来源分析、危害、致病机理等问题上,这些研究基本属于生物、医学、化学、气象学等领域。环境规制领域内有关PM2.5治理的研究是一块亟待弥补的空白,并且现有研究中,也鲜有学者将环境规制供给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因而这些都是本文试图弥补的研究领域空白,亦是本文的创新性所在。

### 二、中国PM2.5治理现状与问题

\*吕守军,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沈星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张晓敏,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

## 1. PM2.5 组成及来源

PM2.5 又称细粒、细颗粒物。细颗粒物是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其在空气中的含量浓度越高，就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

从组成来看，PM2.5 并非某种单一类型的化学污染物，而是一些化学污染物的合集。PM2.5 的来源分为两种：直接排出的一次颗粒物和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前体物通过大气反应生成的二次颗粒<sup>[2]</sup>。其中，一次颗粒物又分为直接排出的固态一次颗粒物和在高温下以气态排出、在冷却时凝结成固态的一次可疑结颗粒物。一次固态颗粒物主要来源于燃烧过程、矿物质的加工和精炼过程以及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等等。

从分行业来看，PM2.5 的主要来源有农业及燃料生产、居民和商业部门、能源部门（燃煤发电）、工业加工过程、交通运输等。其中，工业加工和能源部门是最为主要的污染排放源，以 2010 年京津冀地区为例，其对 PM2.5 形成的贡献率达到了 51.46%<sup>[3]</sup>。因此，结合环境规制理论视角，本文的研究重点即工业加工和能源部门中的污染企业。

## 2. 中国 PM2.5 治理现状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快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在快速增长的工业生产和能源消费驱动下，中国已成为了全球 PM2.5 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京津冀、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严重。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亦逐渐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与制度体系<sup>[3]</sup>，形成了以“八项制度”为核心的环境规制体系。并且随着近些年来公众、社会舆论日渐认识到 PM2.5 所带来的严重健康危害和环境影响，公众对于治理雾霾的呼声不断提高，故政府亦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自 2010 年始，《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环境空气 PM10 和 PM2.5 的测定重量法》、《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等文件不断出

台，表明了政府迫切减排的决心。

## 3. 中国 PM2.5 治理存在问题

中国 PM2.5 治理的问题在于，政府出台的这一系列举措并未遏制 PM2.5 污染的严峻形势。《2014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 161 个城市中 145 个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并且这也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改善空气质量的迫切愿望。例如，环保部出台的空气质量目标指出要在 2030 年前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但在京津冀重点城市中，70% 的受访群众认为这一目标期限太长，92% 的受访者希望在 2020 年前就完成目标<sup>[4]</sup>。

此外，发生于 2014 年的“APEC 蓝”事件尤其值得注意。中国政府在特殊时期通过高压手段换来了短暂的良好空气质量，这说明政府在环境规制层面具有足够且强大的规制能力。但为何在非特殊时期政府的环境规制又显得如此的薄弱无力？

中国政府一方面承受着来自民众治理雾霾呼声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政府对于雾霾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容忍现象。这便是中国当下 PM2.5 治理的一大困局，而这一困局亦绝非仅仅是经济发展同环境质量间的简单权衡问题，其背后蕴藏着复杂的利益关系。

## 三、理论探因

本文将从环境规制理论的视角对上述困局进行分析，且有关 PM2.5 的污染源本文仅考虑企业一方。尽管现实中 PM2.5 的来源非常多元，不过如前文所述，工业生产过程（包含能源部门）对 PM2.5 的产生具有非常大的贡献率。因此，本文认为应该重点考虑工业生产部门的污染对于 PM2.5 问题的影响。

首先，对中国当下环境治理结构做出理论说明。从实证的视角来看，政府的环境规制来源于各相关利益集团对环境规制的利益需求。以斯蒂格勒（Stigler）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于上世纪 70 年代，最早将标准的供求分析方法引入了政府规制的研究领域，提出了利益集团规制理论。他们认为，规制来源于产业利益集团为实现其利益诉求而向公共规制者施加的影响<sup>[5]</sup>。政府拥有强制权，产业为了利用政府的强制权来使自身增利，会

向政府寻租，即产业集团会利用物质利益俘获政客来获得政府支持。佩尔兹曼 (Peltzman) 于 1976 年将这一理论进行了拓展，将消费者利益集团也纳入到了规制的供需模型中<sup>[6]</sup>。因而有关环境规制的利益集团可主要区分为规制者 (政府)、污染企业、消费者 (社会公众) 三方。结合当下中国实际，政府又可分为两个层级：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中央同地方之间的关系可简要地概括为“经济上高度分权，政治上高度集中”<sup>[7]</sup>，中央政府会对地方政府下达命令或指示，并掌握着对地方官员考评与任命升迁的权力。污染企业和消费者作为环境规制的利益相关者，会对政府不断施加压力来影响规制的决策。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直接作用于污染企业 (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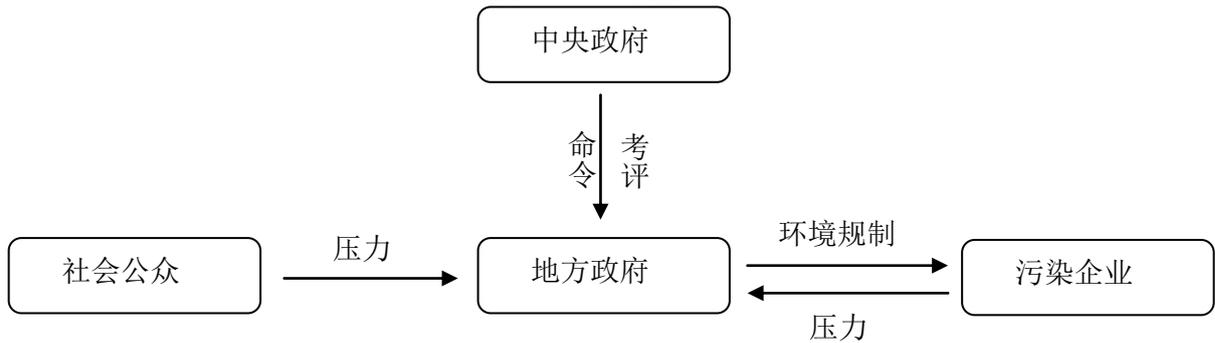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环境治理结构图

Figure 1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China

其次，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供给的目标进行界定。总结过去文献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供给的目标为，在中央考核标准与命令的约束框架下，尽可能地满足包括自己在内的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以获取政治支持的最大化。在此前提下，本文参照佩尔兹曼基本模型构建起中国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最优决策模型，以阐释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供给量的决策过程。设规制机构的目标函数为：

$$W=W(G_1, G_2, G_3)=L_1 G_1+L_2 G_2+L_3 G_3$$

其中  $G_1$ 、 $G_2$ 、 $G_3$  分别代表着公众、污染企业、地方政府自身对环境规制的满意度，而  $L_1$ 、 $L_2$ 、 $L_3$  则分别代表着这三个利益集团对于规制者的重要程度。另外，设：

$$G_i=N_i U_i \quad (i=1,2,3)$$

其中  $N_i$  代表该集团的成员数量，而  $U_i$  代表该集团中个体的效用函数。然后，设  $R$  为环境规制供给量；另设  $q$  为为环境质量， $\pi$  为污染企业利润， $c$  为污染企业治污的成本， $r$  为政府税收。

对于公众来说，其所关心的是环境质量的好坏，随着环境规制供给量的提升，环境质量亦会好转，故  $dq/dR > 0$ ，然而随着环境规制供给量增加，其所带来的环境质量的改善会边际递减，因此  $d^2q/d^2R < 0$ 。而社

会公众感受到的效用  $U_1$  与环境质量  $q$  密切相关，因此  $U_1=U_1(q)=U_1(R)$ ，且  $dU_1/dR > 0$ ， $d^2U_1/d^2R < 0$ 。不妨以环境质量来直接代表公众感受到的效用，不妨设  $U_1=q(R)=a+b \cdot \ln R$ ，其中  $a$  为环境基础值， $b$  为环境规制效率系数。

对于污染企业来说，其效用  $U_2$  与利润  $\pi$  息息相关，由于短期内，增加环境规制供给  $R$  将会提升治污成本  $c$ ，从而使得利润  $\pi$  减少。因此， $U_2=U_2(\pi)=U_2(R)$ ，且  $dc/dR > 0$ ， $d\pi/dR < 0$ ， $dU_2/dR < 0$ 。治污边际成本将随着  $R$  的增加而递增，故  $d^2c/d^2R > 0$ ， $d^2U_2/d^2R > 0$ 。不妨以利润额来表示污染企业感受到的效用，不妨设  $U_2=\pi(R)=P-c(R)=P-\varepsilon R^2$ ，其中  $P$  为价格水平且假定不变， $\varepsilon$  为治污成本系数。

对于政府来说，其本身也是利益主体，有其利益诉求，即追求财政税收的最大化。政府的税收与企业的利润密切相关，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加，污染企业的利润将会减少，政府获得的税收也便相应减少。因此， $U_3=U_3(r)=U_3(R)$ ， $dr/d\pi > 0$ ， $dr/dR < 0$ ， $dU_3/dR < 0$ 。不妨设  $r=r_0+k \cdot \pi$ ， $r_0$  表示来自污染企业税源以外的税收且假定不变， $k$  为税收系数。不妨以税收来直接表示政府所

感受到的效用，设  $U_3=r(R)=r_0+k \cdot (P-\varepsilon R)$ 。

因此，规制者的目标最大化为：

$$\max W=W(G_1,G_2,G_3)=L_1 N_1 (a+b \cdot \ln R)+L_2 N_2 (P-\varepsilon R)+L_3 \cdot N_3 \cdot [r_0+k \cdot (P-\varepsilon R)]$$

对  $W$  关于  $R$  求导，并令一阶条件为零，得

$$\frac{\partial W}{\partial R} = \frac{bL_1 N_1}{R} - 2L_2 N_2 \varepsilon - 2L_3 N_3 k \varepsilon = 0$$

即

$$R^* = \sqrt{\frac{bL_1 N_1}{2L_2 N_2 \varepsilon + 2L_3 N_3 k \varepsilon}}$$

二阶导数为

$$\frac{\partial^2 W}{\partial R^2} = -\frac{bL_1 N_1}{R^2} - 2L_2 N_2 \varepsilon - 2L_3 N_3 k \varepsilon < 0$$

二阶导数小于零，所以当  $R=R^*$  时  $W$  存在最大值，即  $R^*$  为最优环境规制供给量。短期内假定环境规制效率系数  $b$ 、税收系数  $k$ 、治污成本系数  $\varepsilon$  不变，可以发现，地方政府提供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利益集团的成员数、对规制者的重要程度有关。虽然  $N_1$  远大于  $N_2$ 、 $N_3$ ，但  $L_1$  却远小于  $L_2$ 、 $L_3$ ，故  $R$  始终难以达到较高水平。本文认为这是中国当下  $PM_{2.5}$  治理困局的主要原因，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 $L_3$  较大是显而易见的。政府本身作为经济人，亦有其利益诉求，而规制的强制权又掌握在政府手中，其势必会尽量满足自身诉求。

其次， $L_1$  较小与中国当下的政治生态有关。规制者受到来自公众的约束监督较少，其更多地是受到来自上级政府的监督和问责。此外，公众虽然人数众多但其分布较为分散，且我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亦有待提高。而非政府组织，作为集合公众力量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的发展也尚不成熟，力量略显单薄。因此，公众对政府产生的压力是相对有限的。

再次， $L_2$  较大则与多方面因素均有关。一方面，在“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中央-地方关系下，地方官员将会受到来自中央的考评与命令的约束，并且地方官员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晋升动力，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与考评依据下，地方官员会尽可能地撬动本辖区内一切的政治、经济资源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sup>[8][9][10]</sup>。尽管近几年来，中央不

断完善考评依据，不断提高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但经济建设仍是第一要位的考核指标。并且废气的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炼焦等重要行业，这些部门对地区的  $GDP$  贡献是巨大的，因而其对政府来说十分重要。另一方面，这些排放废气的企业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率的提升对维持地区稳定有着巨大的作用，而地区稳定亦是中央对地方考核的重要指标。另外，这些排放废气的企业中还有许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我国除了创造产值以外，其还承担着许多来自政府授意的政治职能。因而国有企业有可能通过人大、行业协会、银行等渠道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sup>[11]</sup>。总而言之，这些污染企业对于政府的重要性非常之大。

值得注意的是， $N_2 L_2$  和  $N_3 L_3$  均出现在分母的位置上，即政府与企业对于环境规制供给量的影响作用是同方向的，公众的力量便显得有些势单力薄。

另外，环境规制效率系数  $b$ 、税收系数  $k$ 、治污成本系数  $\varepsilon$  也值得关注。通过提高  $b$ ，减小  $\varepsilon$ 、 $k$ ，都会使  $R$  增加，从而有利于  $q$  的改善。如何改变这些系数或许也是解决  $PM_{2.5}$  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 四、实证检验

### 1. 计量模型

本文将根据上文的理论推导来构建起计量模型。首先，将关于  $R^*$  的决定式进行转换可得

$$R^2 = \frac{bL_1 N_1}{2L_2 N_2 \varepsilon + 2L_3 N_3 k \varepsilon}$$

为方便构建模型，将方程简化

$$R^2 = \frac{bL_1 N_1}{2L_2 N_2 \varepsilon}$$

方程两边取对数可得

$$\ln \frac{1}{R^2} = \ln L_2 + \ln \frac{N_2}{N_1} + \ln \varepsilon - \ln L_1 + \ln \frac{2}{b}$$

由于环境规制效率系数  $b$  难以确定其衡量指标，故将其隐去，因而本文将着重考察  $1/R^2$  与  $L_2$ 、 $N_2/N_1$ 、 $\varepsilon$ 、 $L_1$  之间的关系。然后本文将寻找相关指标对这五者进行界定。

在明确指标前，首先需要明确对  $PM_{2.5}$



问题负有责任的污染企业有哪些。通过前文论述可知, PM2.5 来源于直接排放的一次颗粒物和由气态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前体物转化成的二次颗粒。通过查阅《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可知, 主要有六大高污染行业是这些污染气体的主要排放源, 其分别是: 石

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全国这六大行业的废气排放量大约占到了工业全行业的90% (如表1所示)。

**表1 2010-2013年全国六大高污染行业污染物排放**  
**Table 1 2010-2013 pollutants from high pollution industry in China**

		六大污染行业排放总计	全行业总计	六大污染行业占全行业百分比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吨)	2010年	14929305	17054510	87.54%
	2011年	16772369	18964630	88.44%
	2012年	15582258	17758201	87.75%
	2013年	14815802	16892309	87.71%
工业氮氧化物排放(吨)	2010年	——	——	——
	2011年	15009107	15808097	94.95%
	2012年	15795750	16600615	95.15%
	2013年	13878216	14649394	94.74%
工业烟(粉)尘排放(吨)	2010年	7936011	9581846	84.95%
	2011年	7936011	9574106	82.89%
	2012年	8472531	10280165	82.42%
	2013年	8593329	10225341	84.04%

数据来源: 2011年、2012年、2013、2014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并且, 在已有的政府规制下这六大行业都付出了高昂的费用来治理废气, 2010到2013年全国这六大行业废气治理设施年度运行费用总和占到了工业全行业治理费用的90%左右(如表2所示)。

**表2 2010-2013全国六大高污染行业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万元)**  
**Table 2 2010-2013 operating cost of waste gas treatment facilities in China**

行业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行业总计	14977779	14522520	15794758	10545219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569080	522759	700242	49897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771324	665946	652508	52302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98822	1214942	1187254	1012010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240295	3029740	2872875	2076732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852754	786779	688685	56760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7190118	7231127	8190222	4286210
六大污染行业总计	13822393	13451293	14291786	8964554
六大污染行业占行业总计百分比	92.29%	92.62%	90.48%	85.01%

数据来源: 2011年、2012年、2013、2014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由此可见，面对政府有关 PM2.5 的环境規制，主要受到影响的是这六大高污染行业，而其他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小。故可以将这六大行业确定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围绕其构建起相关的变量与指标。

本文将用这六大高污染行业单位工业总产值所排放的污染物量（以二氧化硫为代表）<sup>[12]</sup>来表示废气排放規制强度，即  $1/R2$ 。由于数据获取困难，六大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将用全行业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来代替表示，但这六大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到了全行业的 90% 以上，故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而  $N2/N1$  即用六大污染行业员工数占地区总人口比来表示。

$L2$  则用六大污染行业对地区经济贡献率（经济贡献率 = 六大行业工业总产值占工业全行业比 \* 工业增加值占地区 GDP 比）来表示。 $L1$  则较难权衡，本文将同时引入公民环境信访情况与受教育程度两个变量来对其进行表示。一方面，信访人数越多，表明公众对政府直接施加的压力越大，越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另一方面，公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越会关注环境保护议题，从而在环保议题上也会更多地对政府产生压力。其中，信访情况将用地区每万人中环境信访人次表示，受教育程度将用地区每万人中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表示。

治污成本系数  $\varepsilon$  则用政府财政科学技术支出来表示，并且预计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因为企业治污成本与治污技术有关，而技术水平则与科研投入直接相关。另外，在构建计量模型时，本文还将引入地区财政预算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来使模型的检验更加完善。因为政府的财政负担水平不同，表明其规制的供给能力亦不同，亦会对規制强度产生影响。

综上，本文将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begin{aligned} \ln \text{regu}_{it} = & C + \beta_1 \ln \text{eco}_{i,t-1} \\ & + \beta_2 \ln \text{employ}_{i,t-1} \\ & + \beta_3 \ln \text{tec}_{i,t-1} \\ & + \beta_4 \ln \text{petition}_{i,t-1} \\ & + \beta_5 \ln \text{edu}_{i,t-1} \\ & + \beta_6 \ln \text{finance}_{i,t-1} + \mu_{i,t-1} \end{aligned}$$

其中，下标  $i$  表示第  $i$  个地区， $t$  表示年份；因变量为废气規制强度（ $\text{reguit}$ ），用污

染企业单位工业总产值排放的二氧化硫表示；自变量包括污染企业经济贡献率（ $\text{ecoi},t-1$ ）、污染企业员工数占地区总人口比（ $\text{employi},t-1$ ）、政府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text{teci},t-1$ ）、地区每万人环境信访人数（ $\text{petitioni},t-1$ ）、地区每万人中高校在校学生数（ $\text{edui},t-1$ ）、地区财政预算支出占收入比重（ $\text{financei},t-1$ ）； $C$  为常量， $\mu_{i,t-1}$  为随机误差项， $\beta_i$  为待估参数。由于废气規制强度依赖于过去的种种影响，为避免模型的设定偏误，通过引入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来将其扩展为一个动态模型，即被解释变量采用的是 2011 年到 2013 年的数据，而解释变量采用的是 2010 年到 2012 年的数据。

## 2.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是 2010 年-2013 年除香港、澳门、台湾以外的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其中，六大高污染行业的员工数、工业总产值等数据来自 2011 年-2014 年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各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各地区环境信访总人次等数据来自 2011 年-2014 年的《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则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网站数据库。

## 3.检验方法

本文使用统计软件 SPSS22.0 对数据分别进行了描述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具体检验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进行回归检验时，本文将六个解释变量逐步引入到模型中进行检验，观察不同模型间回归结果的变化，以排除解释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从而使得检验更加可靠。

## 4.检验结果与分析

### (1) 变量描述

本文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变量描述  
Table 3 Variable description

变量	单位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Regu	吨/亿元	82	9.346	331.691	87.018	66.453
Eco	%	84	2.58%	32.23%	15.85%	0.060
employ	%	83	0.25%	2.46%	1.35%	0.005
Tec	亿元	93	2.710	257.240	61.473	65.778
petition	人次/万人	93	0.018	4.270	0.652	0.555
Edu	人/万人	93	79.929	334.820	174.503	54.227
finance	%	93	107.95%	1503.52%	263.45%	2.217

(2) 回归分析

本文将解释变量依次分阶段引入模型，得到如表 4 所示的回归结果。

表 4 面板回归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panel regression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ln eco	0.852*** (5.527)	0.835*** (4.234)	0.738*** (3.747)	0.587** (2.693)
ln employ		-0.126 (-0.608)	-0.084 (-0.407)	-0.065 (-0.315)
ln tec		-0.339*** (-4.805)	-0.281*** (-3.678)	-0.467** (-3.296)
ln petition			0.073 (1.035)	0.098 (1.368)
ln edu			-0.483* (-2.15)	-0.514* (-2.669)
ln finance				-0.487 (-1.553)
Cons	0.839*** (4.613)	1.384*** (4.819)	2.501*** (4.365)	3.725*** (3.837)
F	30.543	29.743	19.858	17.295
R 方	0.284	0.560	0.594	0.608

注：显著性水平\* $<0.05$ ；\*\* $<0.01$ ；\*\*\* $<0.001$ 。

在各模型中共线性统计量 VIF 均小于 10, 因而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通过观察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污染企业经济贡献率、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公民受教育程度均与废气规制强度有着显著的相关性, 且与理论预期的系数符号一致。并且在不同的模型中各个变量的系数符号未发生改变, 说明上述结论并不因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改变影响作用的方向。

由此可见, 污染企业经济贡献率越高, 该地区的废气规制强度将会越弱。这可能主要由于政府非常重视 GDP 增长指标、污染产业俘获规制者等原因。企业的经济贡献率越大, 代表着其掌握的资源越多, 在地区的支配地位越高, 因而其更有能力来影响政府的决策, 阻碍环境规制的实施。在中国, 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密切的联系更是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另外, 还可以发现, 随着政府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的增长, 废气规制强度也会增长, 这与假设也是一致的, 说明技术水平的提升, 将有效减少治污的成本, 这将有利于提升环境规制的强度。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 废气规制强度也会不断变强, 这与理论假设也是一致的。随着公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 其会更加关注环境保护议题, 并极力催促政府实行环境规制, 这将有利提升环境规制的强度。不过, 也有可能是由于教育水平的提升反应了地区的技术水平的提升, 从而有利于提升环境规制强度。教育水平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更深入的讨论。

通过对比系数大小可以发现, 经济贡献率对废气规制强度的影响程度均要大于政府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这说明, 政府在进行环境规制决策时企业对其的影响力是相当之大的。

另外, 本文遗憾地发现污染企业员工占地区人口比重、地区环境信访情况与废气规制强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一方面, 这说明政府在进行废气规制决策时, 并未将污染企业员工数与地区人口比作为影响决策的因素。另一方面, 说明环境信访人数并不能很好地表示 L1, 即信访并不能有效地提升公众对于政府的重要性。这可能是由于公众信访是分散的、各自独立的, 其对政府产生的压力较小, 不能引起政府的有效重视。所

以, 提升公众对政府的影响力不能单靠个别的信访, 通过非政府组织、互联网等方式也许效果会更好。

综上, 回归检验基本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需强调的是, 废气污染企业的经济贡献率越大, 其在地方的支配力就越大, 这将导致地方政府在进行废气规制决策时会较多地顾及污染企业一方, 使得规制博弈失衡, 进而阻碍了废气规制强度的提升。这对空气质量改善产生了一种双重的负作用, 大量的污染企业排放了大量的废气污染物, 同时大量的污染企业又阻碍了政府废气规制强度的提升。

## 五、结论与对策

本文通过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的方法, 对 MP2.5 治理困局存在的原因进行了考察,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地方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的主要规制者, 其将同时受到来自中央政府、企业、公众等对其施加的压力。因而地方环境规制供给的目标可以归纳为, 在中央考核标准与命令的约束框架下, 尽可能地满足包括自己在内的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 以获取政治支持的最大化。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与供给目标约束下, 短期内地方政府的最优环境规制供给量, 可以理解为是规制者为应对各利益集团之间互相博弈而做出的均衡性的结果, 它与各利益集团的重要程度、污染企业治污成本系数、环境规制效率系数、污染企业税收系数等有关。第二, 在中国, PM2.5 污染物的排放很多来自一些关键性的重工业和能源部门, 其创造了大量的经济产值与就业机会, 因而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以及维持稳定的政策要求下, 这些污染企业对于政府来说显得异常重要, 甚至一些大型企业还会通过贿赂等方式来俘获规制者。第三, 在寻求规制均衡的过程中, 政府作为经济人也会将自身的利益诉求考虑进来。政府自身亦需要追求财政税收的最大化, 因而政府自身的财税利益诉求和污染企业的利益诉求对于环境规制供给量的作用同是负方向性的。第四, 相较而言, 公众的力量便显得有些薄弱, 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小。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污染企业的经济贡献率对废



气排放的规制强度产生了较大的负向作用，公民受教育程度对其产生了较小的正向作用，公民环境信访情况则对其不产生作用，这充分地佐证了本文的理论解释。

综上，中国 PM<sub>2.5</sub> 治理困局的原因可以总结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博弈均衡点更多地偏向于污染企业一方，导致政府、污染企业、消费者三方的博弈均衡点偏离了社会福利最大化，而环境法律体系设置的初衷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因而制度安排与博弈均衡发生偏离，制度推行受到了较大的阻力，进而表现为 PM<sub>2.5</sub> 治理过程中的执法力度薄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可以归结为，理性人的个人理性行为而导致的集体非理性结果。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便是寻求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换言之，即通过一些机制来使得地方利益集团的博弈均衡点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相重合。在现有的情境下，可以在两方面采取行动，一方面削弱污染企业的支配度，另一方面增强公众的影响力。前者可以采取以下几个做法：

一是进一步完善中央政绩考核标准。注重经济建设并没有错，但只强化经济建设好比饮鸩止渴。中央宜进一步提升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标准，使得地方政府应将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列为同样重要的两个目标，而非是让环境保护来从属于现代化建设。

二是调整产业结构，扶持环保企业，从而降低污染企业经济贡献率。对环保企业施以政策的利好，引导其不断发展壮大，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调整产业结构，以降低污染企业的经济贡献率，这将有利于提升政府对污染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解决就业问题。比如，政府可设立生态工业园区，通

过政策引导与税收减免等吸引环保企业入驻。待到地区环保产业发展壮大之时，不仅可以提升地区竞争优势，也可在规制博弈时对污染产业起到有效的限制作用。

三是提升企业治污技术水平，减少治污成本。政府可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开发新的环保减排技术，并通过法律或政策手段将环保技术进行推广，从而提升污染企业的治污技术水平。企业的治污成本下降，将有利于政府提升环境规制强度。

四是加强监督，严惩腐败。政府应完善内部监督，对官员违法行为施以严惩，防止官员遭受污染企业俘获。中央可加大对地方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的巡视力度，并着重对环境保护问题进行巡视检查。

而如何增强公众影响力可采取以下几个做法。一是继续提升公民受教育程度。随着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其会越来越关注有关环境保护的议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亦会随之增强，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也会加强。二是积极培育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目标十分明确，其是公众力量的重要集合体，其能有效表达公众诉求，影响政府决策。三是充分保障公民有关环境治理的知情权。地方政府应建立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主动向公众积极宣传和解释环境保护政策。并且任何公民均有权向政府索要环境治理相关信息，政府不得拒绝，以此来接受公众的监督。四是增加并完善公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比如可借鉴洛杉矶的做法，在环境政策出台前召开公共研讨会与公众听证会，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公众亦可通过社交媒体、“互联网+”等方式来与政府、企业等实现互动，披露污染信息，交换环保心得。

## 参考文献

- [1] Michael E. Porter, "America's Green Strategy," *Scientific American*, 1991.(1):p.168.
- [2] Environment Canada: Interim plan 2001 on Particulate Matter and Ozone, <http://www.ec.gc.ca/air/default.asp?lang=En&n=0768F92F-1&offset=1&toc=show,2001>.
- [3] 关大博, 刘竹:《雾霾真相——京津冀地区 PM2.5 污染解析及减排策略研究》,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3 年,第 17 页。
- [4]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系列报告之十七: 环境保护成就斐然》, <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yzgcl60zn/t20090928402590846.htm>, 2009-9-28.
- [5] 绿色和平:《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满意度调查问卷》,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news/releases/climate-energy/2013/06/jingjinji-air-polling,2013-6>.
- [6] George J.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s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1971, 2(1), pp. 3-21.
- [7] Sam Peltzman, "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regul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9, 19:pp.211- 240.
- [8] 黄万华:《财政分权、政治晋升、环境规制失灵: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理论导刊》2011 年第 4 期: 第 4-6 页。
- [9]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第 36-50 页。
- [10] 徐现祥,李郁,王美今:《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经济学(季刊)》2007 年第 4 期:第 1075-1096 页。
- [11] 张晏:《财政分权、FDI 竞争与地方政府行为》,《世界经济文汇》2007 年第 2 期:第 22-36 页。
- [12] Peter Lorentzen, Pierre Landry, John Yasuda, "Undermining authoritarian innovation: The power of China's industrial gian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4, 76(1): pp182-194.

##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OF PM2.5 AIR POLLU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V shoujun, SHEN xingchi, ZHANG xiaomin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PM2.5 air pollution has caused great damage to public health and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China. Under the large pressure of public, the government has unveiled a series of measures and policie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PM2.5, but the effect is not obvious. It was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mand of public for urgent treatment haze. It indic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tolerated the haze during the common time and the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is so weak. Why was there such a dilemma of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attempted to answer thi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ory. Firstly, combined with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expression, this article presented an explanation of the PM2.5 governance dilemma. Secondly, we used the 2010 - the 2013 Chinese provinces panel data to test hypotheses empirically and the hypotheses were basically verified by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Finally, we gave a series of advice to deal with the PM2.5 problem in China.

**Key words:** PM2.5,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regulatory strength of exhaust gas



## 《剩女：性别不平等在中国重新抬头》

沈洋

**人物小传：**沈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研究领域：**性别、移民、亲密关系。

Leta Hong Fincher 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前，是名记者。本书是以她的博士研究项目——尚未被充分研究的“剩女”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以及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关联——为基础的。Fincher 此前曾为纽约时报，CNN 以及 Ms 杂志撰写过文章讨论类似的议题，而这些话题也由此得到了不少的关注。大量的采访引述和新鲜的媒体报道使得这本书可读性很高，有潜力吸引广大读者。

根据 Fincher 的说法，在中国，“剩女”一词被“广泛用来形容一位快三十岁或以上的单身都市职业女性”（引自书中第 2 页，下同）。在第一章里，Fincher 检视了剩女这一话语是如何通过“官媒新闻报道，调查，专栏，漫画和电视节目”（第 15 页）而形成的，并指出了国家宣传“剩女”话语的两大原因：一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由于长期处于性别比例不平衡的状态，很多中国男人找不到老婆。在中国，小于 20 岁的男性的人数比同年龄女性多 3200 万。二是为了通过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逼婚，提高人口“素质”。这一观察的确十分深刻。国家暗地里帮助和推动传播侮辱性的“剩女”话语，而这一话语可以说对 25 岁以上的未婚女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指出了中国女性是如何为了避免被“剩下”而经常“在婚姻里放弃了太多协商权”（第 12 页），从而导致她们被“排除在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民用房地产财富积累之外”。第三章进一步指出许多父母“通过只买房给他们的儿子这一行为表现了对他们自己的女儿的歧视”，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的性别财富差距。

本书语言风格通俗易懂，普通读者也可以理解这个论题。同时，本书采取了一种包容性的方式，涵盖了一系列与女性的财产权相关的议题，包括第三章和第六章探讨的 LGBT 群体的利益，以及第五章探讨的家庭

暴力和女性财产权缺失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每当涉及性别不平等时，这些议题很少会被放到一起讨论，因此作者在这点上做到的成绩值得赞许。

然而，我发现在某些地方，文章所提供的论据不足以支撑其提出的论点。例如，读者们会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大学毕业的女性被访者称其放弃了工作只因为“她想要让自己更容易嫁出去，不再吓跑可能的结婚对象”。文中直接引用了她的话：“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找个好男人嫁了”（第 39 页）。作者分析这一案例时写道：“官媒关于‘剩女’的宣传使得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甚至在结婚之前就辞去了工作”（第 39 页）。除了对于这一案例是否具有普遍性抱有疑问，我觉得分析和引用之间并不具有逻辑关系，因为这名被访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她受到了“剩女”话语的影响。

这种分析的不严谨在第三章也有所体现。作者指出被访者尚小姐（音译）结婚的原因是她觉得她变老了。而作者将尚小姐的焦虑和“剩女”的年龄门槛”（第 107 页）联系在了一起。再一次地，被访者并没有明确指出她的焦虑和官媒宣扬的“剩女”准入年龄有什么联系。通过将“剩女”话语当做解释的“万金油”来使用，可以说作者不仅夸大了“剩女”话语对女性的影响力，而且忽略了引起她们焦虑背后错综复杂的原因。我们很容易发现，未婚女性关于年龄渐长的焦虑在“剩女”话语出现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这种焦虑在其他并没有出现“剩女”话语的国家也存在。

作者引用了相当数量的网上资源来支撑她的论点，让文章看起来运用了各方各面的资源。但是，Fincher 并没有点到这些资源或许不是完全可信的。在第二章，作者引用了 2012 零点指标的数据和凤凰网的报道，指出只有 30% 的女性在她们婚房的房产证上写了名字（第 46 页）。首先，对于这份报道的可

信度，我持怀疑态度，因为它并没有说明一共有多少受访者，也没有说明是通过什么方法进行的调查。再者，十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提到这份报道显示的一个趋势，即房产证也写上女方名字的数量和 2006 年相比上涨了 10.2%，这可以解释为女性财产权的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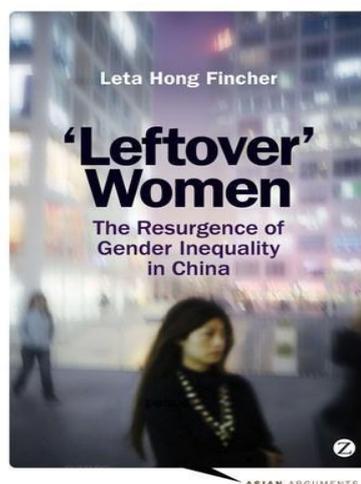
虽然全篇引人深思的论点不断，我还是觉得文中有些发现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例如，在第三章里，Fincher 讲述了生女儿的父母“通常拒绝给自己女儿买房提供帮助”（第 78 页）。作者认为这是因为父母觉得买房是男人的责任（第 83 页）。然而，作者又发现许多女性会贡献自己的全部积蓄去帮助她们的伴侣买房子，即使房产证上没有她们的名字。“女儿”们的行为和父母们关于买房是男人的责任的观念大相径庭。考虑到作者还提到的女儿对其父母的孝顺（第 82 页），我不得不好奇父母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女儿贡献了全部积蓄却没能拥有财产权？这一行为有没有引起任何代际冲突？遗憾的是，本书并没有提及这些问题。

最后，本书标题中“重新出现”一词，在这一情境下显得有些问题。正如在本书序言部分提到的，本书“认为有官方背景的媒体对‘剩女’的宣扬是后社会主义中国性别不平等重新出现的表现之一”（第 3 页）。这里“重新出现”暗示了性别平等曾经得以实现。我认为性别平等从未实现并且性别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更多信息请阅读 Hui-Chen Wang Liu, Elisabeth Croll, 和 Judith Stacey 的相关书籍）。Fincher 通过引述宋朝（公元 960-1279 年）时期女人“对财产有着持续和独

立的控制和拥有权”来支撑“重新出现”这一观点。然后她把宋朝女人和当代中国女人进行比较，声称“中国女人的财产权在后社会主义的城市化进程中被逐步侵蚀了”（第 131 页）。她把当代中国女人和一千年前的女人对比的方法是有问题的。虽然作者引用了历史学家 Kathryn Bernhardt 的研究，但她似乎忽视了 Bernhardt 的结论：宋朝根本就没有“财产平分法”，而且也确实不可能有。相反，父系继承的原则倒是一直沿用，而女性只有在家里无子无兄弟的情况下享有继承权（第 8 页）。此外，由于在讨论财产权时几乎没有考虑过相对应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境，第四章的讨论显得过于简化。

中国媒体和公众目前的主导话语聚焦于女性如何谋划着分文不出或者只出很少的钱就能在房产证上写上自己名字。本书致力于通过讨论女性是如何被迫在房地产市场处于弱势来逆转上述话语。通过使“剩女”话语和房地产市场相互关联，作者想要提出一个新方法来论证在当代中国女性是如何处于弱势的。遗憾的是，由于过于简单化的讨论方式，不太站得住脚的论据，以及没有充分论证支撑的论点，本书的目的并没有实现。

总之，本书似乎颇具争议。即便如此，由于新颖的题材，作者吸引眼球的论点，和作者已有的名气，无论本书的观点有多片面，它仍有可能成为畅销书。还是得说，作者将很少讨论的一些议题，包括女性的财产权，LGBT 群体的权利，和家庭暴力，放到一起研究这一点是很值得认可的。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演变分析

## ——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

卢少云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进入十三五时期，供给侧结构不合理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为此，2016年3月中央出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在此背景下，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理论的历史演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 一、市场自由供给，政府充当守夜者

20世纪3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与之相应的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重点在微观领域，整个经济分析侧重于供给侧。认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经济运行能够达到自身的均衡，进而自动传导到宏观领域，使其不会发生重大的经济问题。因此，解决经济问题重点是从供给方入手，如果把供给问题处理妥善，需求问题和其他宏观问题也就能够得到相应的解决。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生产为产品创造需求”的论断，反映了古典经济学关于供需关系的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主张政府充当守夜者，不必干预市场经济活动，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亚当·斯密提出了政府四项主要职能，旨在为市场机制创造良好的环境，包括防止形成垄断，保障竞争环境的作用；加强国防建设，保护国家免受外国侵犯；保证国内秩序和安全，使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受其他人的侵害；提供具有过大外部性的公共产品。

萨伊所谓“生产创造需求”强调的生产能够创造出有价值的物品，人们想要消费某种有价值的物品，其前提是要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而生产便是实现这个前提的途径。萨

伊认为货币只是人们转移价值的手段。换言之，生产能够创造购买力，人们有了购买力，便能够消费。反之，如果人们没有购买力，也就不会有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萨伊提出的是指“生产使需求有了支付的条件”。但是，萨伊忽视了需求由购买力和购买欲望组成，有购买力不等于就有需求。他忽视了不合需求的生产过剩，即生产可能会供给出劣质或无法满足消费者更高购买欲望的物品。

### 二、市场生产过剩，政府干预需求

20世纪30年代，全球发生了经济危机，使整个西方世界陷入瘫痪，打破了放任自由市场的神话。在旧理论无法给予解释，也不能提出有效政策的背景下，凯恩斯主义顺势而生，它主张有效需求理论，提出了与萨伊论断相反的观点——需求决定供给，认为光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能实现经济的供求均衡，在有效需求不足下，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因此，必须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决定着厂商的生产供给，政府应当通过政策刺激需求。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有效需求一般由投资、消费决定，但是消费具有递减规律。凯恩斯提出边际消费倾向减少的论断，即当一个社会变得比较富裕时，边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而储蓄反而会增加，于是造成短期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生产过剩，这是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因此，应当通过国家干预化解生产过剩。凯恩斯主张政府采取需求管理政策，通过政府举债支出，加大公共投资，实行减税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诱导私人增加支出。

凯恩斯主义有效解决了生产要素过剩问题，但也带来副作用。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

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新增投资只能解决短期低端生产过剩问题，长期来看，反而会加剧低端生产过剩。随着人们收入的提升，对物品供给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依靠增加投资这种外延式的刺激总需求方式，只能取得总需求与总供给暂时的平衡，对供给侧企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调整供给结构。

### 三、市场恢复供给，政府有限干预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普遍出现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得凯恩斯主义一筹莫展。供给学派由此登上历史舞台，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费尔德斯坦，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使政府开支日益增加，造成较高的财政赤字。为弥补财政赤字，采取依靠增税和增加货币发行，结果严重挫伤私人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



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和紧缩的货币政策。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是供给，而供给的不断扩张则必须有一个高效率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实现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为此，要解决好边际税率和通货膨胀率两个问题。较高的累进所得税制和通货膨胀将潜在储蓄者推到更高的税收等级，减少了储蓄量，使经济中资本供给出现严重不足。而边际税率的居高不下，又损害了投资者的积极性和提高生产技术的兴趣。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和减少货币发行。

供给学派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那些新产品、新工艺、运输方法、产业组织新形式等都是创新活动。企业在追求高效率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供给，这种供给不再是被动地适应消费者的既有需求，而是能够激发消费者尚未清晰的消费欲望。从这个

意义上讲，供给学派主张“供给创造需求，供给始终处于中心地位”。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供给和生产率背后的创新，只有创新性的供给，才会创造出新的需求，推动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供给学派倡导经济自由，反对政府对经济不必要、不适当的干预。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让企业自主经营，就能使私人经济的运行更有效率。政府干预行为是非生产性的。政府制定过多的限制性规章条例，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妨碍了供给的增长和创新。因此，应该减少政府对企业的限制，恢复企业自主经营，激发企业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

供给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认为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是微观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但是，供给学派本身理论存在自身矛盾的一面，如推行紧缩货币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反而抵消减税的作用，没能促进企业投资。

### 四、结语

回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历史演变，不难发现当中存在两对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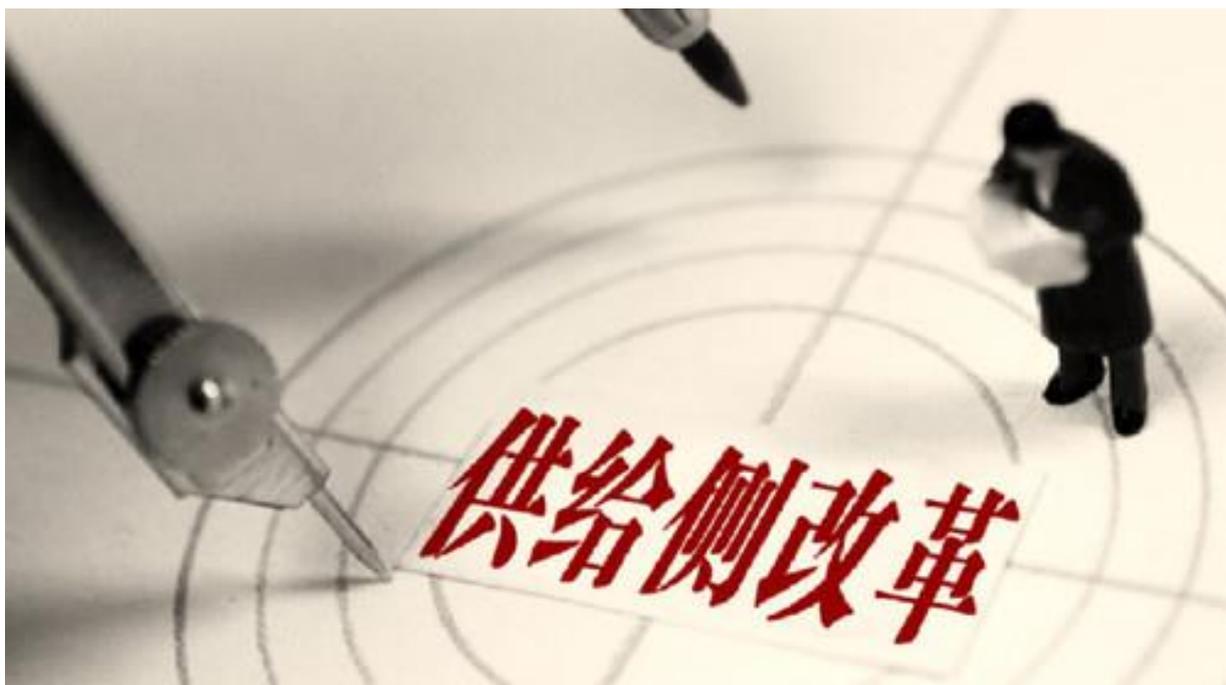
第一，供给与需求关系。从最古典经济学认为供求决定需求，到凯恩斯主义主张需求决定供给，再到供给学派提出长期看供给决定需求，短期看需求反作用于供给观点。可视供给和需求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分析工具。只是不同政治经济学家分析的切入点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是，无论是从供给还是需求角度分析，政治经济学家都在力图揭示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例如，消费递减规律、投资乘数原理、高率税抑制投资、通货膨胀降低储蓄率、创新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等，进而指明市场存在的缺陷，为政府干预政策指明方向。

第二，政府与市场关系。政治经济学家



们基本认同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市场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然而市场机制本身并非完美无瑕，它也存在固有缺陷，这使得政府干预市场成为必要。但是，在不同阶段市场机制所暴露出的具体缺陷不同，例如，需求不足，供给低效，此时相应的政府干预政策在不同阶段也会截然不同。当然，政府干预也存在错误干预、过度干预的可能。例如，过高的税收、过分的规制、过多的货币发行、过高的福利开支……从而导致市场机制再次失灵。

政府与市场关系反过来也会制约供给与需求关系，使市场不断形成供求失衡—供求平衡—供求再失衡—供求再平衡……的循环往复过程。以上两对关系，供给与需求关系是基础，市场和政府关系是核心。以上基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理论的历史演变，为我国十三五期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可参考的分析视角。



## 真实世界中的“货币战争”

### ——读 Jonathan Kirshner 著作 *Currency and Coercion*

李晨阳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 2009 年 7 月人民币国际化大幕正式拉开，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国际货币问题日趋为国内各界所瞩目，有关国际货币体系与制度及其变迁的政治经济逻辑的相关论述与分析也越来越多。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在其著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写道：“每一种国际货币制度都有赖于特定的政治秩序，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涉及各国的利益，各国就会设法影响该体系的性质，使得该体系为自己服务”。<sup>1</sup>显然，仅仅聚焦于宏大视角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变迁已无法满足我们对国家如何利用货币设法影响他国乃至整个国际体系了解的需要，而畅销书与稗官野史式的叙述与推理又难免会使本已雾里看花的世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幸运的是，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教授于 1997 年出版的《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Currency and coerc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恰恰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本书正是致力于对国家之间货币权力“作为一种施加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工具”运用的理论与实践以及“货币问题的国际政治后果”进行详尽的考察。

在本书中，科什纳教授分三个部分展现了货币权力——我们或多或少在各类文献中有所接触但是却难以名状的一个学术概念以及政策工具。首先，科什纳教授在第一部分搭建了一个建立在经济权术（economic statecraft）与国际货币关系交叉面上的货币权力运用的理论框架。国际货币权力的依照

其运用方式被分为货币操控（currency manipulation）、货币依赖（monetary dependence）与体系破坏（systematic disruption）三大类别，并在与援助、贸易和金融三种权力工具进行比较的同时，对货币权力的性质、限度以及效用进行了阐述。

第二部分也是叙述分析最为精彩的部分。科什纳教授依据货币权力运行的三种方式：货币操控、货币依赖与体系破坏，分别选取若干国家运用货币权力来达到非经济目标的案例，阐释历史上货币权力的具体实践与运行机制。从科什纳教授的叙述中，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殚精竭虑巩固并扩大侵华成果的日本，还是力图取代英法增加在中东影响的美国，无论是利用邻国榨取战争资源的德国，还是通过货币区勉力维持在殖民地影响的英国，货币权力都成为达到自身目的的重要工具，尽管由于使用时机、外部环境以及实施国与目标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等原因效果不尽相同。更有甚者，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类似的货币权力工具来达到类似的目的：两次世界大战间“二十年和平”中的法国通过囤积黄金威胁当时的金汇兑本位制来增强自身在政治议题上尤其是德国战争赔款问题上的议价能力，而二战之后的法国依旧使用以美元兑换黄金的手段来发挥自身的战略影响力来极力平衡美国在欧洲的力量，尽管 1968 年的“五月风暴”使得法国人的努力付之东流。

继何为货币权力、如何使用货币权力的讨论之后，在本书的第三部分，科什纳教授集中关注了货币权力的潜力与可行性，对货币权力的运用机会以及货币权力与当今国际关系的联系。无论是货币操控、货币依赖还

<sup>1</sup>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3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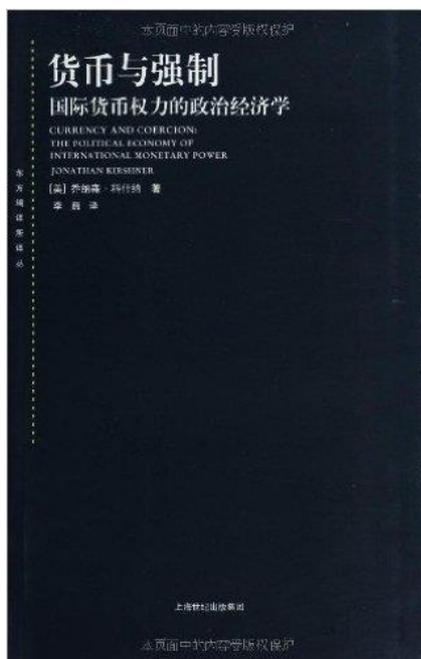


是体系破坏，货币权力的理论能否转化为现实的政策工具以及相应的政策工具究竟能否达成既定的目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时机是否恰当，而对时机的判断同时会受到政策制定者主观意志、政策工具的种类数量以及可观外部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本书英文原版出版时，冷战结束刚刚过去六年时间，科什纳教授也在书的最后对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新的特点与货币权力运用进行了篇幅不长但却同样引人深思的着墨。

通读整本著作，货币从来就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意义上的事物或者说是概念，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货币作为权力工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位常常位于镁光灯下暗处的演员的存在。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正是因为如此，对外的货币权力运用相较于贸易、金融与援助而言受到国内政治与偏好结构的制约也相对较小（例如，在很多国家贸易法案要立法机构进行批准，而货币政策几乎无

需考虑立法机构的掣肘），因而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更具备灵活性与自主性。

诚然，货币权力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与非公开性，但是我们关于货币权力的研究与讨论不应落入“货币战争”阴谋论的怪圈当中。鸳鸯绣取凭君看，亦把金针度与人。科什纳教授的这本著作不仅凭借可信的史料为我们展示了真实世界中的“货币战争”及其背后的学理基础，使得我们对我们曾经熟悉的历史又有了全新角度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地提供了一套分析真实世界中的“货币战争”的理论框架，使我们能够更精确地审视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是却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货币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在本书的一开始，科什纳教授基于国际关系的现实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说，包括国际货币关系较之于其他经济关系等级更为森严、货币权力实施国相对较为有限等。在这些假说的基础上，货币操控、货币依赖与体系破坏三种货币权力的基本类型及其不同的实施模式得以展现。



## 比较政治学家的人生经验

### ——读《比较政治学中的热情、技艺与方法》

宋明思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杰拉尔多·蒙克（Gerardo L. Munck）和布朗大学的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中的热情、技艺与方法》（*Passion, Craft, 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为读者展现了政治学者在学术之外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从2001年开始，作者用了两年时间在不同地点采访了15位20世纪学术成果极为优异的比较政治学者，他们是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罗伯特·贝茨（Robert H Bates）、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大卫·莱廷（David D Laitin）、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胡安·林茨（Juan Linz）、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及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这些学者的人生和学术轨迹、在学术上敏锐的直觉及饱满的热情都被作者的生花妙笔展现得淋漓尽致，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为广大读者爬梳了在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背景下，比较政治学这一领域在研究主题和方法上的发展脉络。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两位作者首先回顾了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转向。与欧洲的规范性质的研究路径不同，起源于北美的比较政治学以提出对现实世界的经验假设和验证这些假设为研究重点。与此同时，这个领域的发展一直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及心理学的强烈影响。众所周知的行

为主义革命就是政治学借鉴经济学的成果，将非国家行为者作为研究对象的第一次尝试。而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及越南战争等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后行为主义时期的比较政治学越来越关注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和动态，例如社会革命（Skocpol, 1979）和文明冲突（Huntington, 1996）等研究主题。而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政治学也出现了百花齐放及相互融合的趋势，从单一案例研究到比较案例研究，从统计分析到形式模型，极大地丰富了研究者的工具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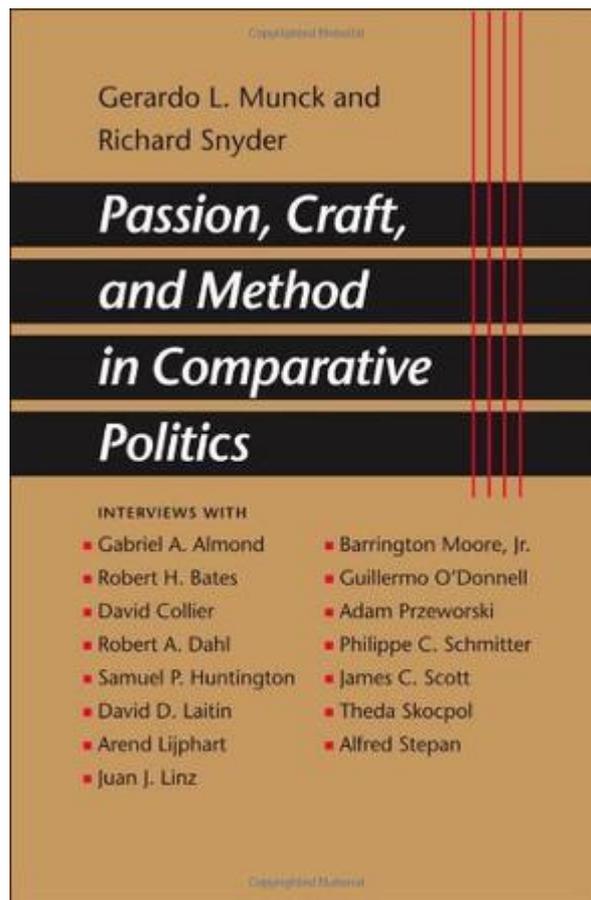
如果说本书的第一部分对大家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了，那么访谈录的第二部分一定会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作者与学者的对话中，透漏了大量学者在生活及研究生涯中不为人知的细节。例如斯考切波提到，她在哈佛读书时，每到巴林顿摩尔的课，她都需要先喝一杯红酒才敢去上课，想必很多学生，即使未必有同斯考切波一样的习惯，但那种面对大牛学者的紧张与兴奋的感觉，读到这段时也会感同身受吧。又如研究民主问题的知名学者亚当·普沃斯基，在解释他为何长期关注拉美地区的民主化时谈到：“因为签证问题，我既回不了波兰，又无法留在美国，因为极其偶然的原因，我来到了智力（P462）。”还有学者谈到了直觉和灵感在进行研究设计中的作用，大卫·莱廷谈到即使在没读过方法论的专著之前，如何进行案例选择这个问题就如同血液一般流淌在他的心里（P616）。总之，通过娓娓道来的逸闻趣事，这本书展现了隐藏在如雷贯耳的大名背后那些知名学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在生活中的鲜活画卷。



在谈到比较政治学这一领域的未来时，作者认为，比较政治领域最大的挑战在于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正在慢慢磨灭学生对真实世界的热情（P11）。由于高度标准化和程式化的培养过程，现在的政治学研究生与上个世纪有很大不同，学术考核要求他们专注于某些狭窄领域的细小问题，因此他们不敢挑战权威，亦步亦趋的跟随着导师和前辈的学术脚步，而这也成为了今天学术难有关键突破的重要原因。正如摩尔所说：“终身教职是伟大的事，它让你能够随心所欲的开拓自己的研究兴趣，然而追求教职的过程却限制了学者的学术创造能力（P94）”。而作者

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 15 位学者的访谈，通过对他们人生经历的回顾，通过对他们如何寻找研究问题的探讨，重燃广大学子对比较政治学的兴趣。

总之，不管你是否对比较政治学这个研究领域有兴趣，不管你是否同意作者和访谈对象的观点，不管你是否愿意从事学术工作，都会被书中那些学者“以学术为志业”的自我定位与勤奋进取所打动，都会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这是一本虽然很厚，但读起来绝对不会让人生厌，反而会爱不释手、心有戚戚的著作。



# 新旧

丁叮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这篇文章的意起，要从一段见闻讲起。

寒假的时候，从上海站坐车回家，进站验票口。因是淡季，人并不多，验票口后的两位安检员在聊着些什么。望过去，两张年轻的面庞，挂着也许专属于年轻人的那种青春的笑意。验票口中工作的，是一张张相似的面孔。等走进了细听之下，发觉是对 EVA 设定的探讨。是的，也许是久而不查荷花长，觉时碧色已满塘，现时站在社会一线中的，已经悄然变成了我们的同龄人。

这种新鲜感很快被更强烈的熟悉感取代了：验票员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接过了我依次放好递送过去的证件和车票，扫描之后，轻快熟练地将票证扔了出来。那车票——那刚刚在充满着现代化气息的自动取票机上取到的车票，飞到了地上。窗口中我质疑的眼神望向的，依旧是那张青春的，面无表情一言不发的面庞。旁边的一个验票口，似乎传来了规定如此，有问题找领导去云云的对话。我拾起车票走进车站，恍惚间怀疑自己刚刚是不是真的听到过人类补完计划和朗基努斯之枪。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崔卫平

这句话曾经一度颇为流行，推敲字词，其含义不外乎人人内修其身则天下治也。而这句话中反复提到的“你”字，则更像是对青年人所说。这种论调久已有之，认为随着新生一代的成长，社会中坚力量完成更迭，旧有的种种沉疴陋习即可随着这种代际的更迭逐步解决，乃至有民智启民风纯的可能。一辈新人换旧人，则大道之行可期。但现实的情况，未必如此简单。

新旧的更迭，甚至新旧本身的定义，远非三两语可以言说明白。现在一切的旧，本就是之前的新，而被寄予过同样殷切，甚至

虔诚的希冀。

那是 1968 年，动荡年代中一段逼仄的岁月。20 岁的食指写下了那首不朽的诗歌，《相信未来》。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彼时的食指自己也曾未褪却稚气，一个无法思考不可理喻的世界反而加速了他的成熟。如同所有被无力改变现实的挫败感折磨的人一样，他选择孩子，这个也许是世上最新最新的名词，来传递温暖寄托希望，做一个自己也未必敢相信的关于未来的梦。而如今，堪堪五十载已过，世事变迁新旧如何心有何感，恐怕也只有食指自己知道。

小说家言，木石易朽，最坚硬的东西，可能就是世殊事异之后仍旧留存的那一碗稀粥。一碗粥，喝之前是想吃奶油面包的儿子，慢慢的，就成了不可一日无此君的爷爷。由此观之，真真是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悲夫。

孩子之所以被认为是新的代表，如同百年前饮冰室主人反复呼喊的少年中国一样，红日初升而光无尘，河出伏流而水无杂。一片赤子的拳拳之心，是老旧社会中人们再难回返的过去，是人们夜深人静时偶然记起的曾经的渴望。因此，人们便自然将美好的想象寄托于未来那个自己过去的影子之上。但同时，如同《乡土中国》中谈到的那样，社会本身业已形成的种种条框也会努力尝试行使教化的权力，将一个个新鲜的生命打磨得符合规矩，使得整个体系能够继续运转下去——至少免于立刻的崩溃。而处于这种新旧交织中的一个孩子，则陷入了一种宿命般的痛苦之中：他们要选择，要在不同的价值观纠结中，选择出愿意遵从的道路。老旧的社会对于新人充满了吸引力，因其可以提供物质的满足，可以提供符合其意的誉名，可以提供委身于主流的安全感。有些孩子在其



中呆的久了，自然而然便以其为正途，年轻的生命恍然间便垂垂老矣。有些人虽感到苦闷难过，却舍不下光鲜的种种，也只得如船在水中顺行而行。也有的人，被日复一日的琐碎庸碌的工作消磨掉了思考的热情与能力，连这问题都未曾察觉。于是乎，早已积重难返的老旧社会中的故人，甚至那些尚在青春的孩子自己，既无比热切地希望一辈新人能够做出与之前人们不一样的事情，却又希望最好还是在既有的轨道上平稳运行。这种困苦会令到人们思考挣扎，直到放弃挣扎，期望下一批孩子们。我们比西西弗斯唯一幸运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可以期待，下一次，嗯，重复了无数遍的那下一次，石头可以不掉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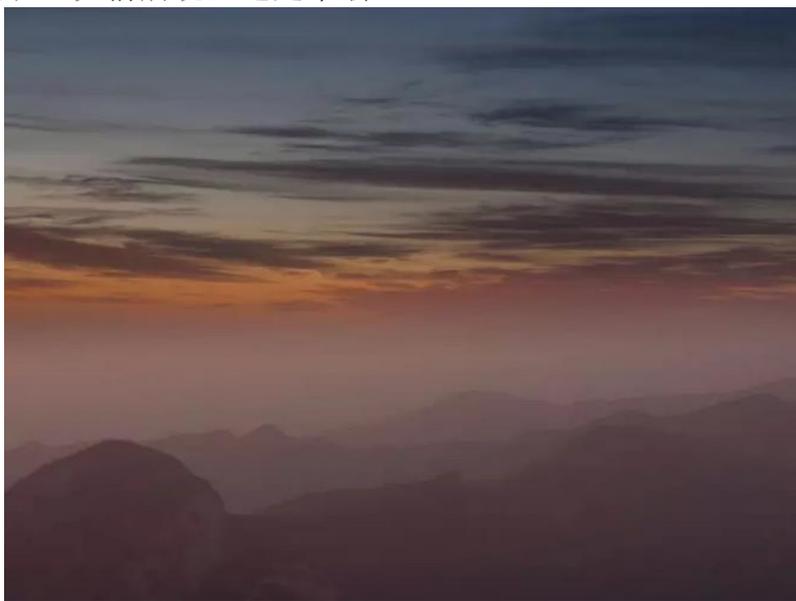
诚然，时光之矢开弓之后永无回头可能，新陈代谢也是亘古不变之理，现时的一切都是经由过往而来，无数光阴和其中人们的辛劳的堆叠总归垫起了文明向上的高度。比起之前种种，今日确乎多有进境，谁也无法否认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感慨，无数次的希望总是步了前世的后尘时，也总是能够发现，在被老旧形塑的同时，老旧本身，似乎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老旧了。而这，便给了我们再一次希望，以及再一次失望的理由。两面交织，一个吊诡的莫比乌斯环。

那么，新人欲行新事，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兼之在这样一个晋虽新邦，其命维旧的时代，能做些什么呢？如前所说，这是个宏

大且远无定论的问题，但仍有些事情是明白可为的。而新人想自立于旧世，想于老旧有所改变，首要便在于自我独立思考。这思考不仅在于去改变，也在于做何种的改变。新人有慷慨意气，不安于老旧，有造新世界之愿本是好事，但当无冕之王已然改姓“尚黑”之时，多有别有用心之辈处处营造出一个正确合理的世界。于是乎，星辰大海的前路上多有见知识的荒原以及一个又一个不存在的页面。各种词汇的意义，价值的宣扬，都不仅仅是无意识的传播而是有意识的引导。诸般言论观点纷至沓来。正是因为此，青年想要改变的这种进取却又容易被人所利用，如何取舍进退有方，更是新人需要多思的问题。新人难为，易从于老旧，也易走向极端。然正因如此，明知难为而为之，方更显新人之责。

面对纷纷扰扰的话语体系与价值观念，面对等级分明的条框限制，能秉持自己的一份唯实重据，不以标签度人的思考，方能不致昏。笃定自己的一份有所坚守，不盲从于众的行止，方可不为恶。

写至此处，再读崔老师之语，多了几分体认之感。一国者，泱泱之民聚而成也，民如何则国如何。新旧之交替虽绝不因新人现而自然生之，然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新人为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勉之。



## 亲爱的，愿我在你身旁

潘倩倩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做行程计划的时候才得知，原来布达佩斯还是个颇有名气的“好吃”的城市，尤其是各类肉食。于是乎美美地在谷歌地图上标记了好几处，预备着“按图索骥”。

在第一家餐馆里坐定，要了一份招牌的土豆牛肉汤，一份烤猪肉配紫甘蓝。一切就绪，这才慢悠悠地喝着茶，打量着周遭。餐厅的生意很是兴隆，颇大的店堂里座无虚席。在欧洲的许多老城里都可以看到有着不同肤色、讲着不同语言的游客，这里也不例外。我的邻座是一对来自韩国的母女，女儿的年纪和我相仿，母亲坐在斜对着我的位置，是个中年阿姨，有着一头大波浪的齐肩短发。我听不懂那软糯的韩语，可依然被她们的谈话吸引。那相对而坐闲话家常的场面，那于平稳中时不时又有细微高扬或拉长的语气，都是这样似曾相识。那个韩国姑娘说了句“偶妈”（妈妈），就像韩剧里的女主角那样，低低的声调拖着长鼻音，无端地让我觉得她平日在家中定是受到了十分的宠溺。

我想起了我和我的母亲。在餐桌上、厨房里，在并肩散步的夜路上，我们也总是这样，气定神闲地说着话，小小的打趣、佯怒、娇嗔，一来一往之间不觉已经做好菜吃完饭，或者穿过了城市里几条五光十色的街道，间或有的大段沉默都是那样轻松自在。可现在，与我相对而视的是我的黑色大衣，餐厅的侍者好心地帮我搭在对面座位的椅背上。因为它上面的几道花边装饰，母亲总是开玩笑地叫它“紫菜大衣”。我愣怔地望着眼前的这团绵软的黑色，脑海里试图搜寻出我母亲说这话时那俏皮的口吻。

在我看来，我母亲对我的教养期待是“桃夭式”的——“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温柔贤淑的小女人和一份专属于她的幸福静好。我认可这波澜不惊的美丽，也向往这如蜜糖般甘饴的甜蜜，可我终归又是个读过几本书、有着些许懵懂想法的人，这样的预设之于我，似乎缺了几分跌宕起伏的精彩，一

颗心就像振翅欲飞的鸽子，迫不及待地想向远方一探究竟。几年前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母亲坚持要我填报离家车程只有一个多小时的一所名校，可我最终选择的校园却是在一个坐飞机都要两个小时以上才能到达的城市，不顾她在那些日子里的泪水涟涟。她有着太多的担心，气候饮食是否能够习惯？辛苦病痛时可能自己周全？还有，如果我在远方遇到了那个“他”，她是不是从此只能在相距千里的地方守候？在上大学以前，我不曾离家，也笃定地知道如果选择远方的校园注定录取不上那些所谓“好专业”，可我就是想去不一样的地方看看，想去听南腔北调，想去看雪国冰封，想知道不同地方的人们都在怎样地生活。对于让母亲伤心这件事，我是愧疚的，但也稍许有些不以为然。最简单的初心恰恰是最大的无畏，对于世界的渴望超过了这负疚，也超过了很多对于未知的忧虑。

父母对于子女的远行总归有些矛盾的心态。他们一面希望你足够的空间，让你实现自我，一面又担心你会受伤痛苦，想着把你拉进自己的羽翼下。我深知我母亲对我的不舍和担忧，但她依然会说，“你能飞多远就飞多远吧，我们支持你”。我记得三毛写过，当她告诉父母自己想出国去游学时，父母来来回回说的几句话就是“这样没有用的草包，出去了以后还不给人吃掉”。然而，陈爸爸和陈妈妈到底还是放行了，三毛写下了他们在机场里的嘱咐和泪水，以及她来不及出口的询问。龙应台在《目送》里说，有一天我们都会意识到父母子女一场意味着你今生今世不断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一端，看着他慢慢地消失不见，而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这世间有千万种爱都是为了在一起，而只有父母的爱生来似乎就注定了分离。他们陪伴你牙牙学语，小心翼翼又无比惊喜地看着你摇摇晃晃地迈开第一个脚步，在漫长的光阴中，你也就这



样带着他们对你的赠与，一点点走出那温暖的臂弯，走进他们无尽的注视和牵挂里。你要去拥抱自己的世界，要去看不一样的风景，要去为你爱的人创造出一个港湾。这是你注定的成长，也是你对于亲子之情最美的回应，你在证明他们的爱开花结果、生息延续。

小美高考的那天早上，母亲突然间打电话给我，说小美肚子疼，她想去找熟识的医生开些药拿到考场去。听闻此言，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小美不过是紧张过度，并没有什么紧急的病症。我宽慰着她，可听着她那忧心忡忡的口气，到底还是没有多说下去，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母亲无助得像个孩子。她曾经是我的那样坚强的后盾和依赖，我小的时候极度怕羞，家里来了客人，只敢抱着她，躲在她的背后向前张望；还有一次一觉醒来发现她不在，躺在床上一直哭到她买菜回来，听她温言软语地哄我，帮我把哭湿的衣服换掉，这大概是我可以想起来的最早的

一次记忆了。我沐浴在爱的阳光中，欣喜地看着它所到之处蓓蕾绽放，感恩着温暖与力量。但我也会想象着自己一个人书笔走天涯，想象着可以做一些事情使自己幸免于循规蹈矩的日常，偶尔还会思考是不是爱也会成为一种羁绊？我不知道有这些想法是不是因为自己年少轻狂、精力充沛？或者是因为还在象牙塔里未经打磨而无知无畏？抑或这本来就是我的性格使然？我的心中没有答案。

当那个韩国阿姨转向我时，我向她报以了微笑，她也笑着回应我，那是一张粉黛无施的脸，眼角处堆着细细的皱纹。然而，我很快就羞赧地低下头去，害怕她对我说话，害怕她窥视出我内心深处的千千思绪——我到底还是当年那个怕羞的小姑娘。我多么希望此时我的母亲就在身旁，我暗暗对自己说下一次要带上母亲一起旅行。我们不是海角孤星，再远方的路，都要有亲爱的人相伴。



# 一人一狗

方圆圆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每次旅行都是一次和已有生活的比较。归来后总是在想，那座城市怎么样，和巴黎比呢？

遗憾的是，之前的几次出行归来，我还是更喜欢巴黎。巴黎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精致的糕点，有一层又一层的味道。它可以是优雅的，像夜幕下闪耀的埃菲尔铁塔；可以很温柔，像塞纳河的波光里流淌的誓言情语；它可以是深邃的，像梵高自画像里的蓝灰色背景，尽管画面充满流动的漩涡，依然能感受到不安的背后有一股深远的力量在平衡着。它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在街边、在桥上、在地铁里、在你能走过的每一个广场，可以听见悠扬的、勾起所有人乡愁的手风琴声。总之，巴黎太美好了。

直到，从慕尼黑回来。我跟笑笑说，我喜欢慕尼黑，甚于巴黎。

“是不是因为德国帅哥多呀？”

“哈，有这个因素”我跟点点一同表示下了飞机就不淡定了，这是一个连狗都帅的地方。

但是，还是要一本正经地解释，“可能因为跟德国的气场更合吧。巴黎是很好，但是总有一种飘在云端的感觉，太艺术，太浪漫，太深刻，不像德国给我的真实感，更加现代，更加务实，更加有生活的气息。如果我能选择，我会选择在慕尼黑”。

想想我和点点在慕尼黑待了4天，这真是一次节奏极慢的旅行。

我们去了市中心，看了几乎每一个西欧城市必游的广场、市政厅和教堂；我们去了青山环绕的天鹅堡，据说它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孤独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临终也没能住进他自己打造的童话世界；我们去寻找地道的美食，因为错过了啤酒节，只好以纯正的德国啤酒聊以安慰，事实证明啤酒的度数竟有点高，微醺的我还拿着地图带着点点寻路。以及，其实我们念叨了一路的猪肘并不是那么好吃，太高的期待没有被满足总会有

些小失望；我们还去了科技馆，去了宝马博物馆，是的，被德国制造洗脑了，从理念、工业设计、打磨到成品，我跟点点感慨要改行学汽车，难怪德国制造成为一种口碑，临走前，为了带回一件正宗的德国制造，囊中羞涩的我们一人去买了一支钢笔，自我调侃道我们是读书人。

可是，这些都不是慕尼黑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

最惬意的时光是在一个明媚的下午，躺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草地上。蓝天像打了腊，云影一片片从枯树丫的缝隙中飘过，秋末冬初的阳光有种特殊的耀眼，明晃晃地，照得人并不睡的着，只好眯着眼。耳边放着卡农的钢琴曲，啤酒的醉意还没有完全褪去，脑袋里懵懵地，看当地人的生活。

不远处的座椅上有一对夫妇。斑驳的树影落在身上，他们相互依偎着，也许在讲着家长里短，也许在商量怎么教育淘气的孩子，细语微言并不听得清楚，只是觉得非常温馨。

草坡下有几个男孩子在争抢足球。绸缎般的草坪，力道刚刚好的阳光，一场小小的足球赛正在进行着，远处的比分板并不十分看的清楚，只是觉得能无忧无虑地奔跑，非常开心。

一个头发已白的老爷爷骑着自行车，车后，跟着一只秋田犬。红灯处，老人停下，看看身边的那只狗，取出口袋中的糖果，这犬一跃而起，而后又安静得立在主人身边，摇头摆尾甚为得意，主人也是会心一笑。随着交通灯的换色，他们在夕阳的余晖下愈行愈远。一人一狗的生活，孤独么？他们相互陪伴，并彼此相处得挺乐呵。那一幕，只觉得温情脉脉。没有面目可憎的驯化，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唯有彼此陪伴，一同行走在静静流淌的时光里。

突然发现，这才应该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我们就是需要换个不熟悉的地方来生活，吃饭、睡觉、发呆、融入当地人，仅此而已。



旅行手册里那些令人向往的圣地与夺人眼球的推荐语，并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朴实宁静的湘西，吴侬软语的水乡，甚至浪漫的巴黎，经过口口相传，即使不虚假，也是高于生活的本真。我去过很多地方，遗憾的是可能由于过度商业化或是过度包装，并没有体会到这些形容词所描绘的感受，只是觉得，也还行，然后去点亮地图上一个未曾踏足的地标。

以前觉得，旅行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去游览几个景点，多去了解足下未知的土地，现在倒觉得像当地人一样在公园里发发呆、晒晒太阳，也挺好。对自己宽容一些，行程放缓，期待放低，少看几个景点

也就算了。如果有幸认识有趣的人、遇到难忘的事，跳出平日里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享受了平素体验不到的美好时光，顺道思考一下人生，也蛮好。

回程的火车上想了想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现在的我能想到的幸福生活应该是一个简单的家、一个不必多言就能懂的人、一只听话的狗，安静地生活，彼此默契，就像夕阳下的那位老人和他的秋田犬。

借用张晓风的文字，来形容我在慕尼黑的难忘时光：这是早冬的一个下午，巴伐利亚州的阳光舒迟而透明，流溢着一种久经忧患的让人的鼻酸的，古老而宁静的幸福。

世界还很大，一起去看看？



## 从 SJTU 到 UCSD

### ——我的美国政治学博士申请之路

人物小传：

蒋倩颖，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获得美国名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简称 UCSD）政治学博士全额奖学金，将于 2016 年秋季入学。

我的博士申请过程，与我过去的学术经历是分不开的。选择继续读博，源于我在本科与研究生阶段所积累的学术兴趣与和研究能力。

#### 本科经历回顾：学术兴趣的形成

在交大国务学院本科的学习中，我曾选修了黄琪轩老师开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而这门课程对我学术兴趣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记得第一节课黄老师就抛出了这么几个问题：经济全球化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吗？是什么在推动全球化？为什么西欧形成了高水平的区域一体化，而其他地区却没有？此间的震撼在于，我从来没有在黄老师发问前，把这些看起来是如此理所当然的现象当作问题！之后的几堂课上，黄老师引导我们用各种理论视角来分析这些问题。有趣的是，面对同一个问题，运用不同的理论范式与分析层次竟可能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这些对于那个刚进入大学，曾被“标准答案式”教学洗脑，而又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我而言，实在是太颠覆性又太具吸引力了。这门课程的学习不仅使我养成了问题意识，也让我体会到了挑战思维的乐趣。

到了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阶段，我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自主选题，将政治经济学中的经典议题“国际援助”作为对象展开研究。虽然在文献阅读与论点形成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感受到疲倦与挫折，但是一种“刨根问底”、找出“为什么”的热情总能激励我继续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当然，与老师以及同学们的探讨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无论是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的改进上，还是在逻辑框架和论点的修正上，他们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让我开拓思路，更进一步树立信心。

大四下半年，在经历了几次学术会议的历练之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对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热情。无论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政治经济学系年会（2013 年 9 月）、中国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2013 年 9 月），还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2013 年 11 月），会场内外与国内外学者一次次思维的碰撞与理念的交锋，都让我感到既紧张又激动。这些宝贵的参会经历不仅让我体验到了智识上的交流所带来的极大愉悦，更使我树立了学术研究的信心。

#### 研究生阶段：研究能力的培养

在研究生期间，我更加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事实上，在着手进行本科毕业论文之前，我并没有就如何正确地、科学地开展一项政治学研究进行过专门的训练。但正是因为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捉襟见肘，更让我体会到掌握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无论是在研一第一学期开设的“社会科学方法导论”中，在“上海交大——密歇根大学”暑期社会科学方法论培训班中，还是在一本本学术著作的阅读中，在一场场自己组织的读书会讨论中，在与黄老师的一次次的答疑中，我逐渐学会了如何准确抓住一个研究的“骨架”。社会科学走到今天，已然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规范与方法。而看一个研究，首先要抓的是“因变量”——作者要解释的事情是什么？这个被解释的对象在不同的案例里有什么区别？作者是怎么测量这些区别的？先搞懂了作者要解释什么，接下来才能弄明白作者是用什么因素——也就是“自变量”——来解释他（她）要解释的东西。顺着这样的思路去思考，这些“自变量”在不同的案例里有什么不同？在不同的时间



点上有什么不同？作者是如何测量这些不同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几个自变量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而更为关键的是，导致这些关系得以确立的具体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把握住了变量、关系、机制，才能说是把握住了一个研究的解释框架。在此基础上，再去细读作者讲的历史叙事，看概念框架和具体叙事是否契合，才能更好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

这样一来，我已经对“打开一个研究的正确方式”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这种能力的获取对我自己开展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研一下半年，我根据本科毕业设计修改的论文获得了2014年复旦大学“比较政治发展”高校学生学术论文三等奖，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学术论坛一等奖。

### 博士申请之路：不忘初心，不断尝试

在确认了自己有兴趣与能力从事学术事业之后，我的博士申请计划便水到渠成了。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它制度化的博士生培养体系拥有良好的口碑，而美国高校又有许多我心仪的教授与钦佩的前辈。因此，在美国念博士不仅能获得更全面、更严格的学术训练，同时又有更多的机会与“高人”们交流切磋，从而获得更大的智识上的成长。

但是，对于一个大陆学生而言，美国的博士申请是一项极为辛苦的体力活、脑力活与技术活。从考托福和GRE、择校、申请文书的写作、联系教授撰写推荐信、套磁，到最后递交申请，整个过程环环相扣却又相当漫长。在此我仅根据个人的经验谈谈我的感受。

除了一些硬指标如托福、GRE与GPA等，美国高校相当看重申请人与其博士项目是否匹配。录取委员会一般会通过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来考察申请人的研究兴趣与学术经历是否与该系强项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区域等匹配。而我之所以能够得到UCSD政治系录取委员会的青睐，也离不开这一点。UCSD政治系在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研究领域拥有强大的师资，这与我自

己的研究兴趣非常吻合。因此，在个人陈述中，我着重围绕这些研究兴趣展开，将其置于具体的经验现象和理论文献中进行阐述，不仅展示了自己过去的学术准备和研究积累，而且阐明了“贵校为什么适合我”这个重要的问题。

除了博士申请所要求的正式材料之外，“套磁”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非正式环节。但我想强调的是，邮件套磁的效果永远比不上当面套磁。而我能够拿到offer，也是因为抓住了当面套磁的机会。得益于中美高校日益频繁的学术交流，近年来许多美国大学的教授纷纷来中国参会或是授课。去年我便通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讲座、讲习班与培训班的机会，积极与来自美国顶尖大学的教授进行了学术研究与申请方面的交流，其中就有来自UCSD的三位政治系教授。提交完申请材料以后，我又和这些教授发了一轮跟进邮件，大多都得到了正面的回应，其中有一位教授特意就我的申请给录取委员写了邮件。

虽然美国政治学博士项目的录取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作为申请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抓住每一个机会不断尝试，尽自己所能，把事情做到最好。用做学术的态度去做申请，因为从决定读博到准备申请，整个过程本就是学术道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除了自身的努力，博士申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次“团队合作”。我的导师黄琪轩老师，以及我的两位推荐人——钟杨院长与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朱天飏教授，还有许多我院的老师，都在申请过程中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与支持。同时，来自同学与亲友的鼓励也有效地缓解了我紧张焦虑的情绪，使我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

如今，我即将挥别交大，挥别国务学院，前往美国继续深造。从SJTU到UCSD，今天的成绩离不开母校的培养与教育。未来我也定不负母校的期望与教诲，不论身在何处，尽自己所能，为母校争光添彩！最后祝愿各位不论在学术道路上还是在职场中都能实现心中理想，收获快乐与满足！

## 细节践于行，大道记于心

### ——辅导员经历给我的成长启示

#### 人物小传：

洪风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曾任国务学院学生办公室主任助理、2013 级硕士研究生班长、F0913001 班长、国务学院 2009-2013 级本科生党支部组织委员，获评上海市优秀毕业生、上海交通大学优秀辅导员、优秀学生党员、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

在交大度过了珍贵的六年半时光后，我终于将要正式走向社会。很荣幸自己在校期间学习和成绩能够得到认可，获评 2016 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勇气和动力。

在交大学习成长的经历中，两年时间的辅导员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且难忘的部分，它给了我很多的锻炼和启示。2009 年 10 月，顺利通过免试直升的我向学校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提交了担任兼职辅导员的申请，并有幸通过测评，获得了进入辅导员队伍的机会，开启了两年百感交杂、难以忘怀的岁月。

我的具体岗位是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学生办公室主任助理，和国务学院党委副书记谢玮老师、团委书记李锦红老师以及顾杰、沈崴奕共同组成了国务学院学生工作团队。这是一个阳光向上、互助友爱的团队，大家相互补台，相互学习，共同创造了一段有欢笑、有感动、有拼搏的多彩回忆。

我具体负责的是学生事务工作，在我眼中，这份工作虽然较为基础，但同样与学生的成长成才息息相关，充分体现出学生培养是一项兼具艺术性与专业性的工作。比如，奖助管理是事务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奖学金的评定方面，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对学生产生有效的激励和引导作用，同时确保评定工作体现公平、效率，保证各个环节的流畅和完整；在困难学生的帮扶方面，不仅仅通过助学金等物质支援帮助困难学生应对燃眉之急，还要通过勤工助学等措施帮助学生树立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和饮水思源的感恩意识。事务工作还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如学生保险、违纪处分、各类补助管理等，它涉及到每一位学生的切身

利益，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负责学生事务工作必须保持一颗细致的心，确保信息的输入和输出正确无误，为学院的学生工作提供有效的信息参考，同时需要牢记每一项工作的计划和节点，保持工作的条理性和紧迫性；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学生事务工作需要发挥引导学生的积极作用，引导创先争优，引导诚实守信，引导知恩图报。事务工作并不是简单的材料收集整理工作，它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思考，思考如何让学生向着更好的方向成长，如何帮助遭遇困难的学生，如何提醒学生明辨是非。

在两年的辅导员工作中，我也遇到过不少困难，比如学院在两个校区办学，因此经常出现为了一份材料或一场会议而来回奔波等情况。那段日子里，我曾在熹微的晨光中快速奔跑以赶上校车，也曾在加班结束后扶着栏杆慢慢地走下黑暗的老行政楼，也曾骑着自行车在学校的各个办公地点之间匆匆穿行……如今这些都已成为美好的回忆，虽然有苦有甜，但每次回味总会勾起心底的一份感动。在这里，我特别想感谢我的学工战友们，虽然也偶有抱怨出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为了更好地推进学生工作而共同奋斗、携手向前的信念。在我初入辅导员工作队伍之际，得到了谢老师、锦红、顾杰和崴奕的很多关心和指导，帮助我快速熟悉了学生工作，融入了学校的学工系统；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们也形成了良好的默契与配合，有效地完成了各项重要任务。同时，在我具体的工作开展中，也得到了思政室、学生事务中心、就业中心、团委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也向大家表示感谢，向每一位奋战在交大学生工作战线的思政老师、辅导员表示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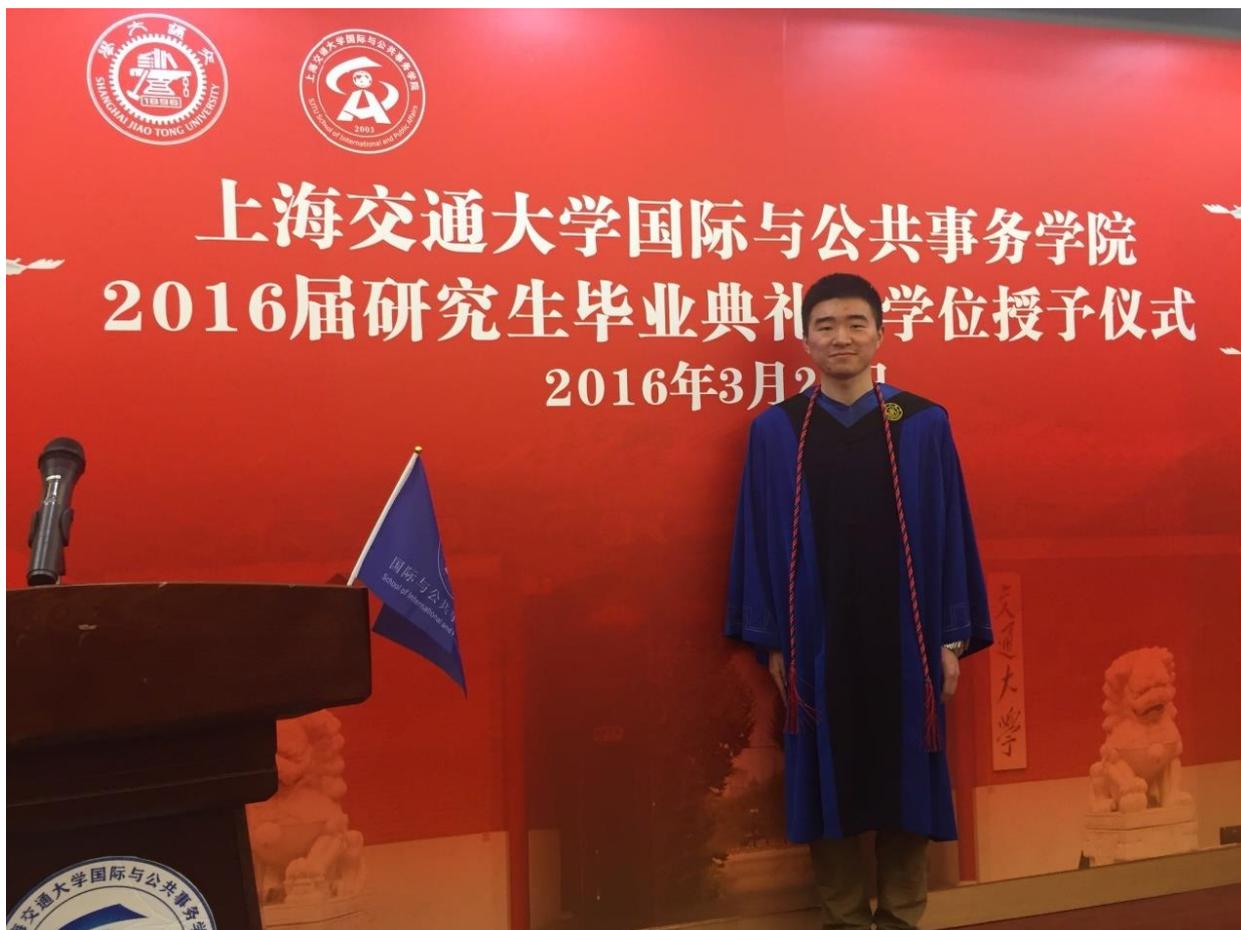


意。

虽然已经离开辅导员队伍，但这段经历教会了我很多，它告诉我“细节践于行，大道记于心”的重要性，对我未来的事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读研之后，我选择了人力资源管理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和未来的就业方向，跟随我的导师——刘帮成老师学习和研究。在我看来，辅导员工作就像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典型实践，特殊的是我们管理的是一群充满朝气和活力，同时也可能遭受迷茫和失落困扰的大学生群体。大学生们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因此拥有一支蓬勃向上的青年力量，我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未来才会更加光明。置身这个群体之中，同时又扮演着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辅导员的身份和职责给了我一种奇特的体验，让我能够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服务者和被服务者

的身份切换中，充分体验双方的感受，使我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和评判学生工作，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段宝贵经历，我才对人力资源管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成长成才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入的过程，很有幸在我的大学阶段，有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有一群优秀的榜样和楷模，还有那些关心帮助我的人，在我前进的道路上给了我重要的支持和引导，激励我向着成长成才的目标不断奋斗。即将走出校园之际，我将始终秉承“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校训，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勤勤恳恳，努力拼搏，充分发扬一名“交大人”的风采，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等更加宏伟远大的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受全球治理的中国力量

人物小传：

阎其凯，国务学院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现任国务学院研究生会主席。

在赴巴黎政治学院交换期间，他充分利用课堂内外提供的学术资源和实践机会，培养了责任意识、全球视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为他自己更好地对接社会发展需求奠定基础。此外，在法期间，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的实习生，亲身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对国际组织的运作有了初步的认识。

“永不言弃地去闯，行胜于言地去追”是他内心坚持的人生信条。

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各国青年要用欣赏、互鉴、共享的观点看待世界，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献瓦。2015年10月，我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巴黎政治学院交换项目的硕士生，有幸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实习，并以青年视角深入研究国际组织的运行机制和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这份宝贵的经历不仅促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有关气候变化、文明间对话、可持续发展教育等国际热点议题，更让我深刻感受到全球治理新格局下厚积薄发的中国力量和日益唱响的中国声音。这段经历时刻激励我为成为一名具有责任意识、敢于担当的大国青年而努力奋斗。

### “文化新常态”下的新课题： 保护文明多样性和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对话与调适

每次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那块石碑，我都会驻足解读许久。石碑上用各国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国际社会都希望通过保持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提高教育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消除暴力与偏见，促进和平与安全。作为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内极具影响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积极倡导文明间的对话，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与繁荣发展。

在旁听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文化委员会未来两年工作计划的辩论审议后，我强烈感受到，在如今“文明冲突”的时代

巨幕下，教科文组织领导各会员国致力于保护文化遗产、积极倡导文化多样性的不懈努力和执着追求。会后，我仔细思考了各会员国在大会上的观点立场，就文化发展议题与导师展开进一步探讨。

在信息快速传播、泛滥的今天，文化交流的速度明显超越深度。个体身份逐渐趋于多重化且不断发生切换与变化，文化的边界被打破，全球性的文化认同危机日渐扩散。作为人类精神创造性的一种表达，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这样一种“文化新常态”迫使我们继续思考全球文化治理如何既能兼顾文化多样性，又能在全球层面统筹构建文化共同体，实现同一性。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中所指出，任何社会在发展文化多样性时，都会面临两大挑战，一方面要凸显差异，即承认、尊重、弘扬文化特殊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又要整合共识，即引导各文化交流互鉴、强化认同、提炼并凝聚共同价值观。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冲突与暴力不是差异存在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文化交融规模空前的时代，寻求多元文化间的交汇点和平衡点，在保护多样性的基础上重塑文化共同体的价值信念，才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这种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不谋而合，都深刻阐明了交流对话、和谐共生对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大意义，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深邃智慧和博大胸怀。



## 全球教育治理的理性审视：多元行为体的深度参与和共同拓展

同样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期间，我见证了影响全球教育发展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在一次高级别会议上被正式采纳的历史性时刻，这一振奋人心的计划也让我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该行动框架是各国落实教育2030议程的行动指南，旨在动员所有利益相关群体共同为这个宏大的目标体系开展行动，从而确保所有个体都能获得全面、优质和公平的教育机会。通过审视《教育2030行动框架》所勾勒的教育领域的全球治理模式，我尝试对全球治理这一新兴课题的基本框架做出一些粗浅的判断。

首先，全球治理是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双向互动的内在要求。主权国家在国际组织所创建的国际体系中建立联系并采取行动，国际组织也只能在主权国家授权和支持的范围内制定国际规范，约束主权国家的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在大会上表示，《教育2030行动框架》所历经的探讨过程史无前例，这是世界教育治理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工程。这表明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只有通过对话与协商实现张力平衡，才能进一步谋求共同利益；其次，全球治理的主体将朝多中心化方向拓展，各主体参与程度将不断加深。在《教育2030行动框架》计划的磋商过程中，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各方利益都得到了充分的考虑。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难民署、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都是该计划的共同召集方。只有当多元行为体实现更广泛的参与，承担更重大的责任，才能对棘手复杂的全球性问题进行有效治理；最后，全球治理的有效实施离不开治理观念的更新和治理机制的创新。若按照既有的进度发展，到2030年，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无法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快变革传统的教育观念，尽快建立具有弹性和应对性的全球教育新体系来应对挑战。这正是该行动框架产生的初衷。

### 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升级点赞： 全球治理离不开中国智慧

经历30多年引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中国正不断与时俱进，积极融入全球治理进程，逐渐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应对全球性挑战上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努力为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完善全球治理机制贡献中国智慧。在与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交流过程中，我了解到，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正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教育、科学、文化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从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奖”，到携手中国民间博物馆举办“世界博物馆日”纪念活动；从在中国保定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到北京启动建设全球首个“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从中国非遗美食走进教科文组织总部，到杭州市政府举办“2015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世界正从教科文组织的变化中感受到沉甸甸的中国力量。对于世界和平发展而言，改革全球化治理需要中国经验；对于中国而言，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自身影响力。中国全面、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意味着中国将以自己的行动实践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繁荣。

回到实习本身，联合国国际化的办公体验让我充分认识到掌握好跨文化沟通技能的必要性。学会与世界各国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进行交流，这本身就可以视为文化间彼此对话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国际组织中不同肤色的成员都是本国文化的代言人，代表各自国家形象，这也对我在工作中的一言一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曾在晨间例会上主动发言介绍丝绸之路的产生和发展，曾在午餐时向部门同事讲解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曾在招待会上与国外交人员交流中国在开展遗产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工作之余，我凭借着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意识，时刻不忘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因为我为自己身上所流淌的中国基因而深感自豪。

习主席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青年论坛开幕所发的贺词中强调，落实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目标，建立一个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地球，是包括全球青年在内的每个人都要重视和担当的责任。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希望更多的交大青年放眼世界，把握机会，主动对接时代发展战略，为推动人类文

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成为全球治理新体系的有力推动者和积极引领者。

而我，也会砥砺前行、不断进取，为成为一名具有责任意识、敢于担当的大国青年而努力奋斗。





## 不忘初心，不负光阴

### 人物小传：

程雅青，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学指委思政室辅导员，励志讲坛指导老师，曾获上海交通大学2014-2015学年十大“三好学生标兵”、2015年度辅导员标兵。

### 深入基层，在社会实践中砥砺真知

本科四年，带着父母“好好学习，待人友善”的嘱咐，认真学习成为了我生活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因为深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所以我在汲取书本理论知识的同时，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深入基层、了解社会。

凭着热情与努力，我和同学们在大二即拿下了“大创”国家级项目，用两年时间前往湖北、湖南、重庆等地开展实践调研活动，希望为民间口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建言献策。在农民家中，在田间地头，在真正的社会里的每一次实践，都带给我很多思考。这些思考不仅仅关于社会现实问题，更多的还有我对自身能力的反思：怎样才能提出合理化建议？如何才能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人文关怀？带着这些反思，我在深入基层了解社会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有了这些经历过后，我愈发确信，是坚持参与志愿服务，让我在生活中保持了一颗懂得感恩的心；是不断参与社会实践，走在田间地头与村民进行沟通与交流，让我深刻意识到了身为学生的自己在能力上的不足，也因此督促着我不断进步。

### 用心做事，在学生工作中收获成长

如果说在本科阶段，我大多时候是作为一个个体，在一个人战斗、一个人闯荡，那么到了研究生阶段，因为加入了交大辅导员队伍，我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值得团队成员信赖的，能够带领团队一同战斗、一同闯荡的人。

作为校学指委思政室辅导员、校励志讲坛指导老师，一年来在励志讲坛共举办的28期讲座项目中，我接待过的嘉宾中不乏赵锡成、王博年、池永硕这样的商业成功人士，曹可凡、蒋丰、金培达这样的文化名流，

Thomas Felix Rosenbaum、Mark S. Schlissel、沈祖尧这样的名校校长，闻雪友、向隆万、吴世勇这样的为祖国科学文化事业奉献终身的学者，还有张国伟、宁泽涛这样的体坛风云人物世界冠军。在他们的身上，我不仅见证了名家风采，也因此明确了自己的努力方向。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现在这个被团队成员亲切称作“雅青姐”的我，一开始其实也曾面临着难以融入团队的窘境。但那时的我，既没有沮丧也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主动融入。

为了了解团队，我从办公室找出了50余张存档光盘及相关书籍，一期一期学习相关宣传品、主持稿和新闻稿，了解属于励志讲坛的风格，了解它辉煌过去。为了融入团队，我尽力参与每一个能够参与的环节，不断在徐汇闵行两个校区往返，珍惜每一次与团队沟通的机会。为了让自己成为能够被信任的人，我积极主动学习更多的硬性技能，并通过用心沟通交流，打开了励志讲坛团队成员们的心扉。现在，成员们遇到问题都愿意向我征求建议，这也让我体会到能够成长为一个被信任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如今，励志讲坛已走过十年征程，正处于二次创业阶段。在带领团队成员们对内制定会员制、成立校友会、结合互联网发展改变宣传策略的同时，对外我们也积极发挥学生自己的力量邀请嘉宾，传递我们想传递的价值，感动别人的同时也感动自己。我坚信，只要大家团结一心、不懈努力，经历磨砺定能铸成大器，为励志讲坛第二个十年书写更为精彩的开篇。

### 饮水思源，在读书学习中探求责任

在积极参与学生工作的同时，我知道自

己依然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学习科研仍是我的本职。因此，我积极参与导师相关科研项目，每日坚持阅读，一步一脚印地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

由于导师研究方向偏媒体传播，我时常需要阅读整理大量外媒资料。如在做金砖国家身份认同感研究时，我就曾阅读翻译上千条外媒报道，并对其进行分类整理、数据统计和内容分析。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与导师合作的论文在我研究生二年级上学期即

在 C 刊发表，部分研究报告亦收录入相关专业书籍。

要认真做事，用心做人，要有担当有责任，以及有相信自己能够做好的自信，要知道每一段经历都是一种储蓄，这些都是我在学在交大的路途中所学到的。在未来，我会继续脚踏实地、用平和的心态不断向前，不忘初心，不负光阴，不断挑战自我与激励自我！





## 捕捉光影，御梦前行

### 人物小传：

姜子禹，中共预备党员，国务学院本科三年级。现任交大摄影协会首席通讯团团长。

在集体中，他是班长、当过院学生会副主席、评过校优秀团干部，尽心完成一项项职责；拿起相机，他是校园文化舞台上的一名实力派，出入于各类晚会、典礼现场精准地做好影像记录，同时也热爱捕捉绚丽风光。

他喜欢自称“摄影狮”，因为他相信，想要获得打动人心的影像，就得像狮子追逐猎物一样，踏实刻苦地去拥抱生活中的一个个细枝末节。

### 梦想和责任并存

早在踏入交大的校园之前，我就担任过上海实验中学高三毕业典礼的总导演；对于摄影、摄像这一类的技术支持工作，我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而在入学第一天，作为本科新生联合班长，我更是捧起了单反相机，记录下学院的开学典礼。以此为开端，大一这年，我挑起了院学生会活动影像记录的工作，并加入了励志讲坛学生组委会、拍摄了包括白岩松这般重量级嘉宾在内主讲的数期项目。

在工作当中我暗暗立下决心，有一天也要与新闻中心的专业老师们并肩作战、报道全校性的重大活动；当然，这意味着需要肩负起一担重过一担的责任，将自己磨砺地更强。

于我而言，军训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当时我的摄影技术已经初绽光芒，因而被选入营政工队伍，开始了为期两周多的“战地记者”之旅。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每日上百张的“片海战术”下，我的一张作品被团政工组选中，在上院的展示窗里张贴了一学期。这一“战果”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 把握机遇，勇敢攀登

大二那年，我成为了国院学生会副主席。除了尽职尽责完成日常活动的组织策划之外，我依然放不下在技术支持方面的发展的热忱之心。五院迎新晚会的筹备周期里，我果决地揽下了大部分的摄影摄像事务；“退休”前夕，我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连夜制作了学生会的年度总结视频。伴随着自身技术的日臻日善，我有幸加入了摄影协会的核心团队，

接手首席通讯团，以此为新的起点，开启了学生工作中又一精彩的乐章。

彼时，2014级学生军训团政工组正在组建，而摄影协会恰是选拔通道之一。凭借着前一年军训积累下的经验和成绩，我毅然报名，并成为了当届年龄最小的参训教师。军训期间，我负责团一级新闻的供图，以及每日沙场文武榜照片板块的评分。尽管当时组内有几位技术不凡的政工干事可供派遣，但出于对摄影工作的热忱，我不舍放过拍摄每一个重要场面的良机——夜间拉练、实弹射击、中期汇报、阅兵仪式，一场场全团参与的活动我悉数到岗。

大一时许下的梦想，终于在一年后发芽。回首再看这中间的成长历程，每一次的成长，都源自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攀登。

### 情怀与志趣的升华

摄影协会的理事团队是各类摄影爱好者的集聚地，有人擅长风光拍摄，也有人是专业大牛，而像我一般，以“新闻拍摄”见长的同学却是“小众”。一句“不就是按几下快门的事”背后，却是不为人知晓的努力——或是军训拉练时骑着自行车折返于队首和队尾一路追拍，或是背着两台相机在迎新晚会的舞台前集中精力驻守两个多小时，或是在校运会上为了拍摄4x100接力而在20秒内穿越操场对角线……

尽管这条路上总是充斥着崎岖坎坷，尽管我的技术也还在日臻日善的阶段，但我相信，坚定的信念是将摄影打造成彰显自我价值的一块招牌。进入大三以来，除了日常的活动拍摄和培训主讲外，我在校园里拍摄的

作品相继登上校网首页、120周年校庆大会背景屏、《光影交大》画册等重量级场合，恍然间我成为了校园文化圈的活跃达人。

在我看来，摄影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记录，更是一种二次创作：无论拍摄什么题材，但凡优良的作品，共同的先决条件是对被摄物本身的理解。如果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是“致知”，那摄影一定是很好的“格物”方式。正是在把三维世界凝固到二维影像的过程中，我，乃至每一个摄影人，都学会了去拥

抱生活中各种动人片段。我热爱交大这片土壤，在这方天地里有太多太多值得被定格的一瞬间。我享受着这种不断落下快门的感觉，永不停歇，正是因为内心涌动的无法言表的感动与热爱。

借助摄影这项技能，我尽心尽责地为集体服务，同时也把它当作描绘自己绚烂个性的画布。青春的脚步纷繁而倥偬，我想我会用精心的等待，去迎接迷人光影的到来。





## 公共管理前沿理论梳理

### 1、测量社会问责制对公共服务、治理与公民权力的影响

作者: Derick W. Brinkerhoff (RTI International)

Anna Wetterberg (RTI International)

出处: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期数: MAR-APR, 2016

摘要:

公民对政府官员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追责(即社会问责制)作为改善公共绩效的手段被普遍使用于国际捐助项目中,并且得到了广泛推广。然而,社会问责制发挥效用的影响因素仍备受争论。已有的大多数研究都过于强调需求方(公民社会和公民)的因素,而忽视了同样重要的供给方(国家结构和程序)和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特征。本文通过调查发展中国家的四个项目来研究这些背景因素是如何影响社会问责制的目标和效果的。供给方因素能显著提高社会责任制在服务提供和政府绩效方面(尤其是在分权程度和公民参与自由方卖弄)的效用。公民拥有自由空间、聚集和表达诉求以及参与服务提供绩效和问题考核的能力和意愿至关重要。

### 2、小城镇的政策制定者

作者: Rhonda RiherdTrautman (Marti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出处: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期数: MAR-APR, 2016

摘要:

小城镇的地方政府面临着独特的政策制定问题。本文归纳了这些问题并探索这些问题为何存在以及它们的独特性。此外,本文还通过一些实例从前任管理者、当地立法者以及学术界的角度来提出对策。最后,本文阐述了由于小城镇政府所面临的独特环境,传统的公共政策实施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问题。

### 3、提高财政联邦制下的绩效: 地方政治领导力和行政能力

作者: Jessica N. Terman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Richard C. Feiock(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出处: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期数: (2015)25(4):1059-1080

摘要:

本文研究了地方选举官员的政治影响力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行政能力一起对财政联邦制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支持者的差异性和地方官员对联邦资助能源项目的直接参与会对执行过程周期产生影响。市长对资金申请过程的直接参与会促进公共项目的及时或提早实施,而市议会的直接参与则会演唱施行时间。此外,市长或者议会成员提供的政策支持而非直接参与,则会最大程度上促进公共项目的及时或者提早实施。

### 4、领导力和公共雇员的绩效表现: 管理者—雇员关系的质量与特征的影响

作者: Shahidul Hassan(Ohio State University);

Deneen M. Hatmaker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期数: (2015) 25(4): 1127-1155

摘要:

一些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探索了管理者的领导力对公共雇员的工作绩效的影响。本文运

用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导力理论——领导-成员交换理论（LMX）来研究管理者——雇员关系对雇员的职业表现和额外表现。本文还探究了管理者和雇员的性别差异以及二者间关系的持久度是作用于领导—成员交换理论对雇员工作绩效的影响的。本文数据来源于对一个大型州政府机构中的477名雇员和161名管理者的调查。我们发现当雇员的工作绩效与领导—成员交换理论的解释力成正相关，而雇员与管理者间的性别差异以及二者间关系越久则会削弱这种正相关关系。本文可以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下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我们还为公共部门的管理者提供如何与雇员建立良好有效的关系提供了实践上的建议。

## 5、新常态下行业协会关系网络转型研究

作者：梁鑫华，徐晓林，栾丽霞（华中科技大学）

出处：中国行政管理

期数：2016年第4期

摘要：

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建立与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由于处理社会场域切换过于困难，造成对行业协会关系网络认识偏差和各学科资源难以协调等研究困境，不可避免地影响关系网络转型的步伐，无法适应新常态的要求。行业协会研究从结构讨论到行动探索的转型，预示着新常态下的行业协会与政府和会员的关系是包括多主体、多元关系、多样行为和复杂结构综合网络。为此，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行业协会关系网络转型的研究势在必行。

## 6、流动人口居住状况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分析——政治现实还是社会剥夺？

作者：朱荟（南开大学）；苏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出处：中国行政管理

期数：2016年4期

摘要：

本文尝试以政治现实模型和社会剥夺模型这两种国外主流理论为框架，分析流动人口居住状况对政府信任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基于居住绩效的政治现实模型对流动人口政府信任具有显著而稳定的解释效力，而建立在参照群体间居住比较基础上的社会剥夺模型则对流动人口政府信任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由此，流动人口居住状况影响政府信任的核心机制在于对政府执政绩效的评价。



## 政治学前沿理论梳理

### 1、利益集团的支持对白宫候选人竞选的私人捐赠款会产生影响吗？

#### **Do Interest Group Endorsements Cue Individual Contributions to House Candidates?**

作者：Anne E. Baker (Miami University)

文献出处：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期数：2016, Vol. 44(2)

摘要：

非在职的候选人目前面临一个难度上升的选举战役，即需要获得足够充足的资金来和在职的白宫候选人进行有效竞争，或者是在白宫的开放职位竞争中具有竞争力。利益集团的支持被认为在选举成功中起到了作用，但是利益集团的支持是否会对非在职白宫候选人能够得到私人的捐赠产生影响并成为非在职人员成功当选的要素，这一点还是未知的。非在职候选人想要拥有充足的选举资金，因此他们对私人捐赠和主要利益集团的支持存在较大程度的依赖，证实两者之间的明晰关系。运用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006年到2012年捐赠数据，与利益集团支持的制表相配对，进行一系列的回归和匹配分析，作者发现利益集团的支持在整个选举周期中能够提高对候选人的私人捐赠数量。这个结果更加证实了利益集团的支持对非在职候选人进行竞选是有影响的结论，同时也证明了利益团体想要影响白宫选举的意愿效应。

### 2、政府的支持对于民众对待穆斯林移民的态度的影响，一组国家对比的新印证

#### **How State Support of Religion Shapes Attitudes toward Muslim Immigrants: New Evidence From a Sub-National Comparison**

作者：Marc Helbling (University of Bamberg & WZB Berlin Social Science Center)

Richard Traunmüller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文献出处：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期数：2016, Vol. 49(3)

摘要：

这篇文章认为是国家通过管理宗教的形式在民众形成对穆斯林移民的态度中起到了一个相当大的作用。欧洲的民主政体远离世俗，宗教管理是不能简化抽取成价值条例或是宪法条文的，要接受新的宗教少数派不仅仅牵涉到改变现存的条例，而且需要放弃长期形成的传统和日常的习惯，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公民能够把宗教新移民党当做是他们生活方式的威胁，通过他们具体的行动和要求来表达他们的敌意。我们通过将新设计的调查项目和26个瑞士县宗教管理原始数据进行整合，来支持我们的论点。我们的数据发现反驳了现存的理论，对在欧洲民主出现挑战，现代移民社会的质量和在民主政体中的宗教作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3、在和平建设中的资讯与通讯技术：影响，机遇与挑战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peace building: Implic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作者：Ioannis Tellidis (Kyung Hee University)

Stefanie Kappler (Durham University)

文献出处：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期数：2016, Vol. 51(1)

摘要：

尽管大量的研究在探索用于破坏性目的（恐怖主义，犯罪，战争宣传）的资讯与通讯技术，在另一方面，资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对传统的作用很小，但是新的社会媒体，可以为转变和冲突的预防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篇文章认为资讯和通讯技术是一种工具，因此接受

多层次和多维度的转变和对冲突的预防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文章想要探索的是：a信息和通讯技术是否可以增强边缘化的角色来超越缔造和平和国家建构的过程，以用来领导一个本地主导，更加具有代表性的冲突转变；b资讯和通讯技术可以培养更多形式的和平；c资讯和通讯技术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捐赠者选举的平台来提升他们的日程和阻止抵抗。

#### 4、威权政体下的地方选举：从精英理论的视角看俄国市长的选举

##### **Local Election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 Elite-Based Theory with Evidence from Russian Mayoral Elections**

作者: Ora John Reuter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ilwaukee)

Noah Buckley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Alexandra Shubenkova (Columbia University)

Guzel Gariful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文献出处: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期数: 2016, Vol. 49(5)

摘要:

为什么威权政体允许在一些地方进行选举但是其他地方不可以？通过聚焦在进行次国家的选举的决定，我们认为独裁者是用地方选举来满足有权势的次国家精英的诉求，来缓和矛盾。当次国家精英控制了重大的政治资源，例如地方政治机器的运行，统治者需要把这些精英吸纳进来，以便进行有效的统治。选举时一个吸纳精英的有效工具，因为他们能够给精英提供自主权和机会去培植他们自己的力量。我们验证这个观点通过分析变量，即2001年到2012年采用市长选举的俄罗斯207个最大的城市，来验证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发现显示在城市中俄罗斯的市长选举更能够长期维持并且当选的市长能够处于强政治机器之上的地位。我们的发现也表明次国家的选举事实上是为长期的独裁进行服务的，次国家选举能够帮助精英保持对独裁者的忠诚和把拥有强政治资源的精英吸收进统治集团为这个政体服务。

#### 5、克服投票的困境：方便投票在残疾人选民中的应用

##### **Overcoming Voting Obstacles: the Use of Convenience Voting by Voters With Disabilities**

作者: Peter Mill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ierra Powe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文献出处: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期数: 2016, Vol. 44(1)

摘要:

我们考察美国残疾人在现场投票是在一个什么水平，或者残疾选民在与正常投票者相关的方便投票改革中获得了多少益处。美国协助投票法案（2002）认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投票地点的可达性，对于残疾选民，特别是那些在视觉残疾人。我们从在跨越8次选举的11月投票和补充人口调查中建立了2个社会比较对象的操作概念化。一个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显示残疾选民明显有更小的可能性去投票，但是更可能去参与用邮件的方式进行投票。早期的个人亲自投票改革对残疾选民的投票行为已经产生了一个边际效应。匹配的模型揭示了采用无故的缺席的投票，永久缺席的投票，或者对两者都进行改革来，通过制作邮箱形式的选票的投票的可能性。

#### 6、不平等的领土：国土和冲突

##### **Unequal Ground: Homelands and Conflict**

作者: Nadav G. Shelef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文献出处: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期数: 2016, Vol. 70 (1)



摘要:

虽然这是一个普遍达成的共识即国际领土冲突是常见的且特别具有破坏性，但是对于什么样的领土争端会导致这些结果仍然未达成共识。理解国际冲突中的领土规则需要补充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对于领土的价值的理解，在同一个建构主义理论（主导国家主义和地理的研究）的背景下。认识到本国的领土在推动国际冲突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因为它强调特定领土的作用和在领土之上建立一个主权。本文提出一个关于国土安全的成系统，可推广的操作化概念，这和建构主义中的国家主义相一致，可以将建构主义中对于领土规则的理解放入领土冲突的定量研究中，使两者成为一体。这个测量被用来检验主观定义的国家领土损失相对于非国家领土损失增加了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划分国土有可能导致冲突这个结论被建立在国家界限被划分之前，在特定领土内种族身份认同已形成的基础上的第二个新的关于国家领土地位的新测量所证实。

## 速览

### “十三五”政府价格管理机制改革思路研究开题报告会顺利召开

2015年5月27日下午，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点课题《“十三五”政府价格管理机制改革思路研究》开题报告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顺利举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市物价局局长顾洪辉、上海市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施耀恬、上海市价格协会会长沈念东、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管理处处长李荃、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教授权衡、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滕世华、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曾军平、上海市城投水务集团副董事长陈明杰、上海市城投水务集团财务总监杨伯伟、上海市燃气集团总经理助理李颖、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管理处副处长黄健等出席了本次报告会。

### 国务学院 2015 年研究生国际暑期学校圆满结营

5月28日下午，“公共政策与治理:当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比较”2015年研究生国际暑期学校结营仪式在徐汇校区工程馆108顺利举行。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彭勃教授主持仪式，美国三一大学 Stephen Field 教授，Donald Clark 教授、Mary Stefl 教授出席仪式。暑期学校为不同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学员们搭建起了沟通交流的桥梁，使他们能够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增进理解、尊重和宽容。

###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比较政治学：方法与议题”研讨会成功召开

6月6日，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比较政治学：方法与议题”研讨会成功召开在新建楼3005室顺利举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桑玉成教授莅临会议并作开幕致辞。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钟杨教授作开幕讲话和总结发言。

我院比较政治系林冈教授、陈尧教授等出席会议。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到会发言。学者们分别就“比较政治的方法与理论”、“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研究”和“民主转型中的制度因素”四个专题进行交流和讨论。

### 研究生徐汇区社会管理实践基地召开项目鉴定会隆重举行

2015年6月11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会徐汇区社会管理实践基地“和谐城区建设中区域战略发展研究”2014年项目鉴定会暨2015年课题实践启动仪式在徐汇校区新建楼3005会议室隆重召开。上海市公务员局顾问、原市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处长、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徐锦林，徐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公务员局局长何爱兴，上海交通大学团委书记方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钟杨、党委书记曹友谊、副院长彭勃以及来自徐汇区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和交大的课题指导老师、参与课题实践学生七十余人参加大会。





## “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研讨会成功举行

由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主办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研讨会于6月12-13日成功举行，来自中国大陆、美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二十几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 Harry Harding, Brantly Womack, Gerald Curtis, David Zweig, Roger Cliff, David Arase, 郝雨凡、冷则刚、刘学成、任晓、朱峰、庄建中、林冈和钟杨。与会者就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内涵、这一政策对中美关系以及东亚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城市公共外交与“一带一路”国家驻沪总领事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6月24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在徐汇校区成功举办城市公共外交与“一带一路”国家驻沪总领事高峰论坛。来自埃及、土耳其、乌克兰、意大利、巴基斯坦、韩国、德国、哈萨克斯坦等国的10余位驻沪总领事和副总领事与会并发言。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和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郭新立分别致开幕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钟杨主持论坛。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美国问题研究所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参加论坛。与会专家学者与各总领事积极互动，围绕文化交融、自由贸易、公共外交等议题展开交流。

## “上海交大一密歇根大学”暑期社会科学方法论培训班顺利开班



7月1日上午，由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上海交大一密歇根大学”暑期社会科学方法论培训班顺利在徐汇校区新建楼2006报告厅开班，国务学院院长钟杨教授主持开班仪式并向学员讲授第一课“社会科学研究与中国研究”。参加这次培训班的有来自校内外的150余位师生。本次培训班将邀请美国密歇根大学 ICPSR 授课教授，麻省大学教授 Philip Brenner、堪萨斯大学 John Kennedy 教授、杜克大学 Melanie Manion 教授和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Mary Gallagher 教授等为学员讲授关于“抽样调查的基本方法”、“田野调查”、“问卷设计与访谈”等课程。

## “中国实证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

7月8日至9日，由国务学院和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实证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在新建楼2006隆重举行，国务学院院长钟杨教授和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Mary Gallagher 教授分别作开幕致辞。来自杜克大学（Melanie Manion 教授）、密歇根大学（Mary Gallagher 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Peter Lorentzen 教授）、芝加哥大学（杨大利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Bruce Dickson 教授）、剑桥大学（Adam Yuet Chau 教授）、香港大学（Kai Quek 博士）等高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到会并作主题发言。

## 我院环太研究中心和日本研究中心承办“中美日关系国际研讨会”

2015年11月21日，我校与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第七届“中美日关系国际研讨会”，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中美日关系与海上安全”。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各地的学者和外交官共聚一堂，就当前的中美日三国关系和海洋安全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上各方外交官分析了中美日战略调整对海洋安全的影响，并就各方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了一定的共识。《新民晚报》等媒体对于本次会议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报道。

## 上海交大成功举办 2015 首届大学生城市治理案例挑战赛

2015年10月23日至24日，首届大学生城市治理案例挑战大赛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隆重拉开帷幕。本次大赛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承办，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澳门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等两岸四地8所知名学府的12支代表队参赛，百余名优秀学子齐聚交大。

##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周边关系”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5年10月31日，由我院和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主办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中国周边关系”研讨会在徐汇校区新建楼3005会议室拉开帷幕。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吴建南教授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中，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纷纷发言，金应忠教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简短的总结和评述。本次研讨会围绕“一带一路”这一具有高度现实意

义的主题展开，报告十分精彩，分析入木三分，会议气氛热烈，取得圆满成功。

## 《中国社会组织评估发展报(2015)》蓝皮书成功发布

2015年12月25日上午，《中国社会组织评估发展报告(2015)》蓝皮书发布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成功举行。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并得到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的支持。校党委副书记胡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上海民政局副局长、社团局局长李政等领导嘉宾出席本次会议并致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主任、蓝皮书主编徐家良介绍了蓝皮书概况。扬子晚报、经济时报等多家媒体报纸参加并报道了本次会议。





## 国务代表团出访澳、菲五所高校并同莫纳什大学签署双学位协议

3月22日至28日，国务学院院长钟杨教授一行出访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先后访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墨尔本大学、莫纳什大学和菲律宾德拉萨拉大学五所高校。钟杨院长分别与莫纳什大学文学院签署硕士双学位协议，并和德拉萨拉大学文学院签署院际合作备忘录和交换生协议。

## 上海海交大成功举办首届上海公共管理（MPA）论坛

11月28至29日，首届上海公共管理（MPA）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举行。会议由上海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承办。共有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理工和上海交通大学等长三角和上海地区十五家MPA培养院校的师生八十余人出席了此次论坛。



国务学院“老年打工族”作品荣获第十四届挑战杯文科作品社会组一等奖（全国高校共74件作品），是交大在挑战杯竞赛的征程中文科作品最高奖项，弥补了交大捧杯没有文科作品的遗憾，开创了交大文科作品在挑战杯竞赛的新历史。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到访国务学院同师生座谈新著《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并做客上海交大通识教育“名家讲堂”第57讲阐释“大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郑永年教授做客上海交大名家讲堂第52讲，作了题为“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学术报告。



上海交大成功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意见讨论会

